沙特伊朗在北京破冰 18
拆解经济复苏动能 32
供地制度优化 58
运营商全员卖云 64
美日荷博弈对华出口管制 70
新冠后的甲流 84

财新周刊

Caixin Weekly



硅谷银行危机：起点还是终点

光速倒闭何以发生？
全额兑付存款解除此次风险之后，
是否会有更大危机？

P.38

2023年 第11期 3月20日出版
总第1047期
邮发代号：32－235
ISSN 2096-1251
定价：人民币40元 港币60元 www.caixin.com

当地时间 2023 年 3 月 10 日，美国加州圣克拉拉市，一名客户站在关闭的硅谷银行总部外。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最新封面报道｜硅谷银行危机：起点还是终点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3月20日第11期

光速倒闭何以发生？全额兑付存款解除此次风险之后，是否会有更大危机？

文丨财新周刊 王石玉 王力为 夏怡宁 井豫涵 张而弛

从公布增发方案到宣告倒闭，美国硅谷银行（Silicon Valley Bank，SVB）只用了48小时。

短短48小时中，硅谷银行的股价从260美元"腰斩"至106美元，储户挤兑420亿美元。最终，这家总资产逾2100亿美元的银行，以账面结余现金流—9.8亿美元被临时关停。

当地时间2023年3月10日（星期五）上午，加州政府部门正式关闭硅谷银行，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入场处置风险，账户不超过25万美元的储户存款将受到保护。由此，硅谷银行成为15年来最大的银行倒闭案。

成立于1983年的硅谷银行极具特色。在过去十多年中，它利用与风投机构的紧密联系，为获得融资的初创企业提供贷款、理财等服务，积累了良好的口碑。根据硅谷银行官网信息，在所有美国风投支持的科技和健康领域的企业中，近一半是硅谷银行的客户。由于近一年多美国开启了加息周期，硅谷银行的久期管理出现严重缺陷，导致资产质量虽好，但流动性管理严重失衡；且因多为企业客户，硅谷银行超过90%的存款并没有加入美国存款保险。

硅谷银行的"光速"倒闭引发冲击波：服务加密货币行业的主要银行、资产规模约1100亿美元的签名银行（Signature Bank）亦很快被FDIC接手处置；多家风投机构和初创企业担心25万美元以上的存款"打水漂"；美国多家区域性中小银行的股票被投资者抛售，反映美国地区银行股价表现的KBW银行指数（KBW Bank Index）在3月6日至15日的八个工作日中跌去26%。



当地时间2023年3月15日，美国纽约的一家签名银行分行。图：Angus Mordant/视觉中国

加上3月8日宣布"自愿清算"的另一家服务加密货币行业的银行——银门银行（Silvergate Bank），仅五日内，就有三家美国银行倒闭。一时之间，山雨欲来，传说十几年一度的美国金融危机难道真的又要来临了吗？



当地时间2023年2月5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银门银行大楼。图：Ariana Drehsler/视觉中国

经历了周末两天的紧急调查与磋商，赶在3月13日（星期一）开市之前，美联储、美国财政部与FDIC决定迅速“介入”：FDIC承诺将全额兑付两家被接管银行全部储户的所有存款；同时，美联储设立一项新的银行定期融资计划（Bank Term Funding Program，BTFP），向符合条件的存款机构提供为期一年的借款，以补充流动性。

硅谷银行的海外子公司迅速与其脱钩，以切断风险传播。3月13日下午，英国汇丰银行以1英镑代价，收购硅谷银行英国子公司SVB UK Limited。英国财政大臣杰里米·亨特（Jeremy Hunt）披露，英国政府和英国央行促成了此项交易，并强调英国纳税人无需为硅谷银行倒闭事件埋单。

3月14日，恐慌情绪降温，美股银行板块止跌反弹；在硅谷银行倒闭后的三个交易日内跌去72.9%的第一共和国银行（First Republic Bank），当天回升了27%。

短期来看，第一块摇摇欲坠的多米诺骨牌被及时扶稳，但还很难说考验就此结束。3月15日，市场担忧情绪从美国转向欧洲，近几年负面消息不断的瑞士信贷在公告“财务报告程序存在重大缺陷”之后被抛售，在瑞士交易所上市的瑞士信贷跌超25%；瑞士信贷美股盘中一度跌超24%。

3月14日，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的创始人达利欧（Ray Dalio）公开表示：“硅谷银行的倒闭是‘煤矿里的金丝雀’，将在风险投资领域产生连锁反应，甚至远远超出风险投资领域。”达利欧认为，不同的周期会看到不同的泡沫，2008年是房地产，而这一次是那些“无法承受高利率和紧缩货币政策冲击”的私募股权公司和商业房地产公司；他并将硅谷银行的倒闭称为“短期债务周期中非常经典的泡沫破裂”。

“两家较小的银行在过去一周内倒闭。现在对损害范围有多大下结论，为时过早。”3月15日，贝莱德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CEO）劳伦斯·芬克（Larry Fink）在致投资者的年度信函中评论称，监管部门迄今为止反应迅速，果断的行动避免了风险的传染，但市场心理仍处于极度紧张状态。



当地时间2023年3月7日，美国华盛顿特区，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出席国会参议院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听证会时称，美联储未来加息幅度可能超出此前预期。突然爆发的金融风险事件，令美联储专注于控制通胀的货币政策陷入两难。图：Andrew Harnik/视觉中国

美联储的政策更是众矢之的。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欧美经历了长达14年低利率乃至零利率宽松环境；2020年新冠疫情以来，货币政策进一步大放水；然后，在过去短短一年中，为应对通胀而快速紧缩，美联储升息450个基点，欧洲央行也累计升息350个基点。

“美联储过快地逆转了持续14年的宽松货币政策。”FDIC前主席Sheila Bair对财新指出，当利率必须上升以对抗通货膨胀时，金融资产的价值就会下降，风险暴露。她甚至认为，美联储现在应该暂停进一步加息，以便有时间评估其对金融体系的影响；监管机构需要审查，所有银行在证券投资组合到期前被迫出售时，承受市场损失的资本能力。

但更多意见认为，从宏观政策的角度，美联储既定的加息进程不应该受到单个事件的影响，以免造成预期混乱乃至更多金融风险；应该同步加强的是金融稳定措施与工具。

从挤兑到全额兑付

“钱都可以自由取出来了。”3月13日晚，一家在硅谷银行有存款的国内初创企业CEO告诉财新。

几天来，这些初创公司和它们的投资人处于煎熬中。当地时间3月8日（星期三），硅谷银行披露的两则信息——为合计17.5亿美元的新发股寻找买家，最近出售价值约210亿美元的可售债券资产（AFS）的变现交易大约带来18亿美元的税后损失——引发了硅谷银行股价大跌和储户挤兑。

不少储户在星期五尝试取款但没有成功。在当地时间3月10日（星期五）上午，FDIC入场之初，硅谷银行绝大部分存款人都收到了未投保资金剩余金额的通知，这令他们慌了神。这些存款人多为创投机构和初创公司，存款要用于日常流动资金、发放员工工资等。

在美国的银行体系中，小企业与中小银行是相互选择的结果。一位中国香港的美资银行人士告诉财新，银行账户的管理费通常跟资金量成正比，大银行对公司客户的企业规模、资金量和资金使用周期都有要求，比如账上超过5000万美元等，而小企业账上普遍只有数百万美元。硅谷银行就是抓住了5000万美元以下的市场，收益率、灵活度和服务都比较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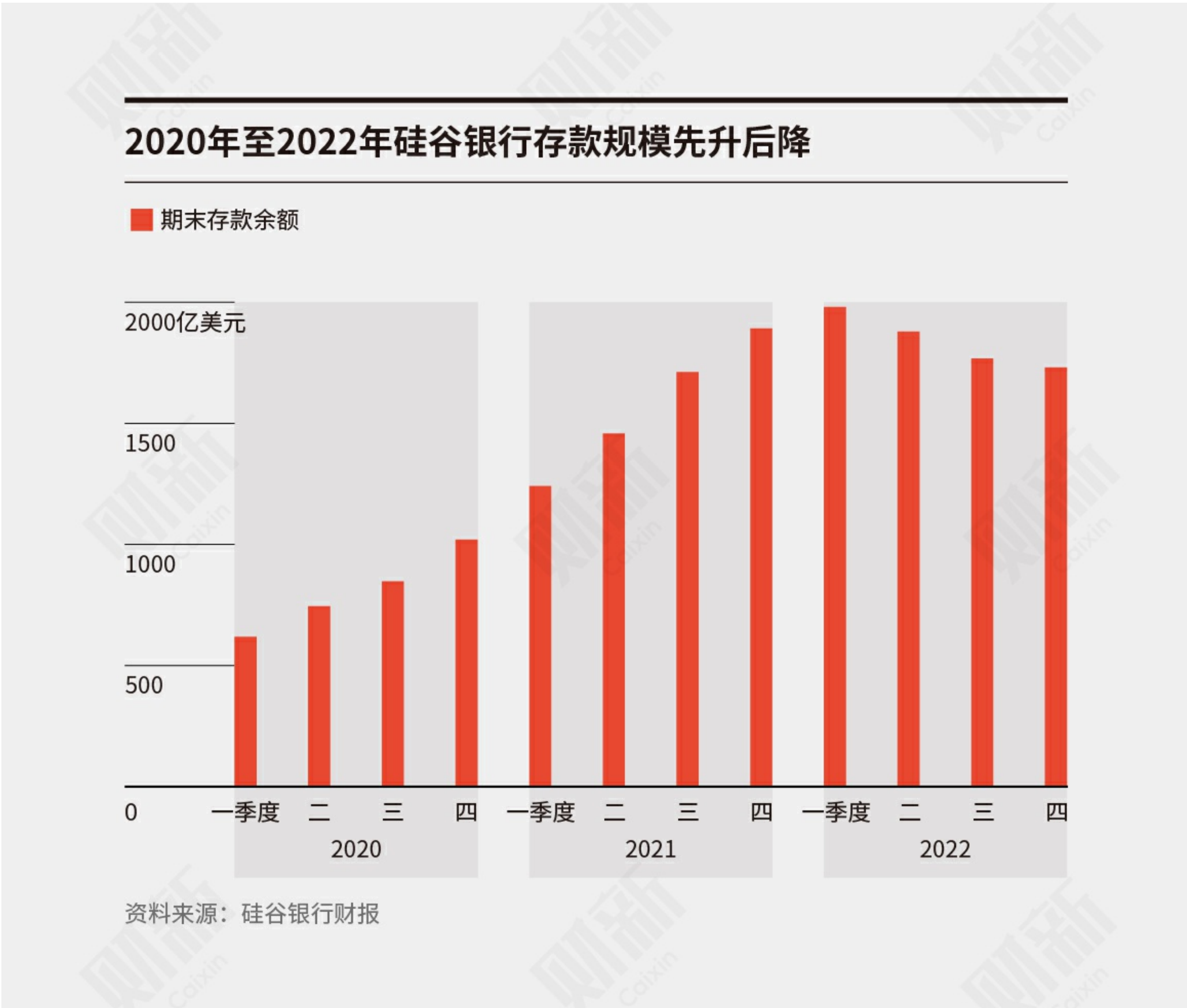
“硅谷银行在服务创新公司上确实相当有竞争力。”一位国内头部创投机构人士告诉财新，在这个领域也不是没有其他竞争者，汇丰银行早在2016年就开始通过服务于大型“独角兽”公司向下发展客户，但相对而言，硅谷银行更为灵活与激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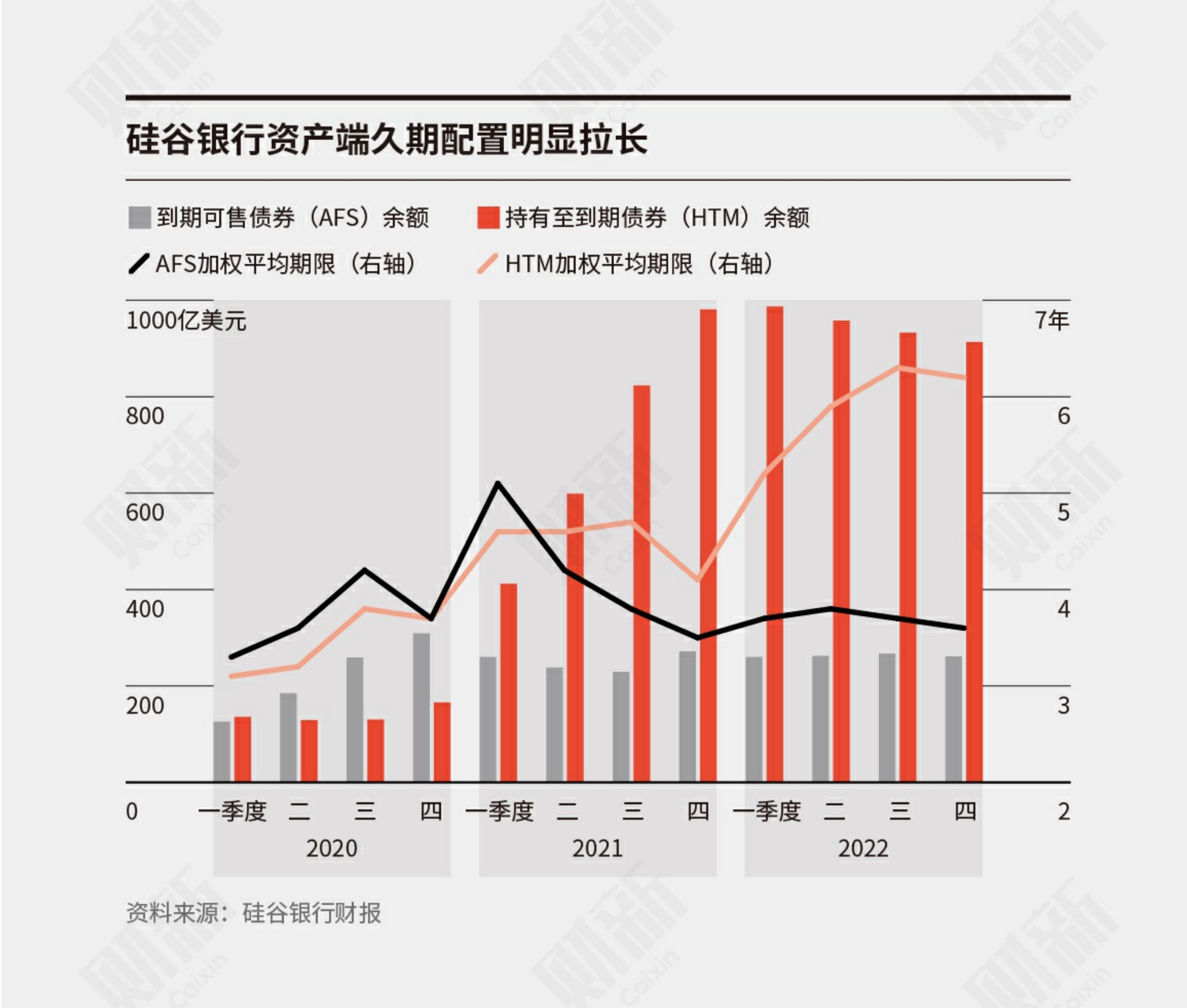
比如，售卖亚洲预制菜的美国初创企业Omsom成立于2020年，其融到的所有资金都存在硅谷银行。根据硅谷银行的2022年年报，亚洲客户的存款占存款总额的7%，约120亿美元，较2021年明显下降，但与2020年基本持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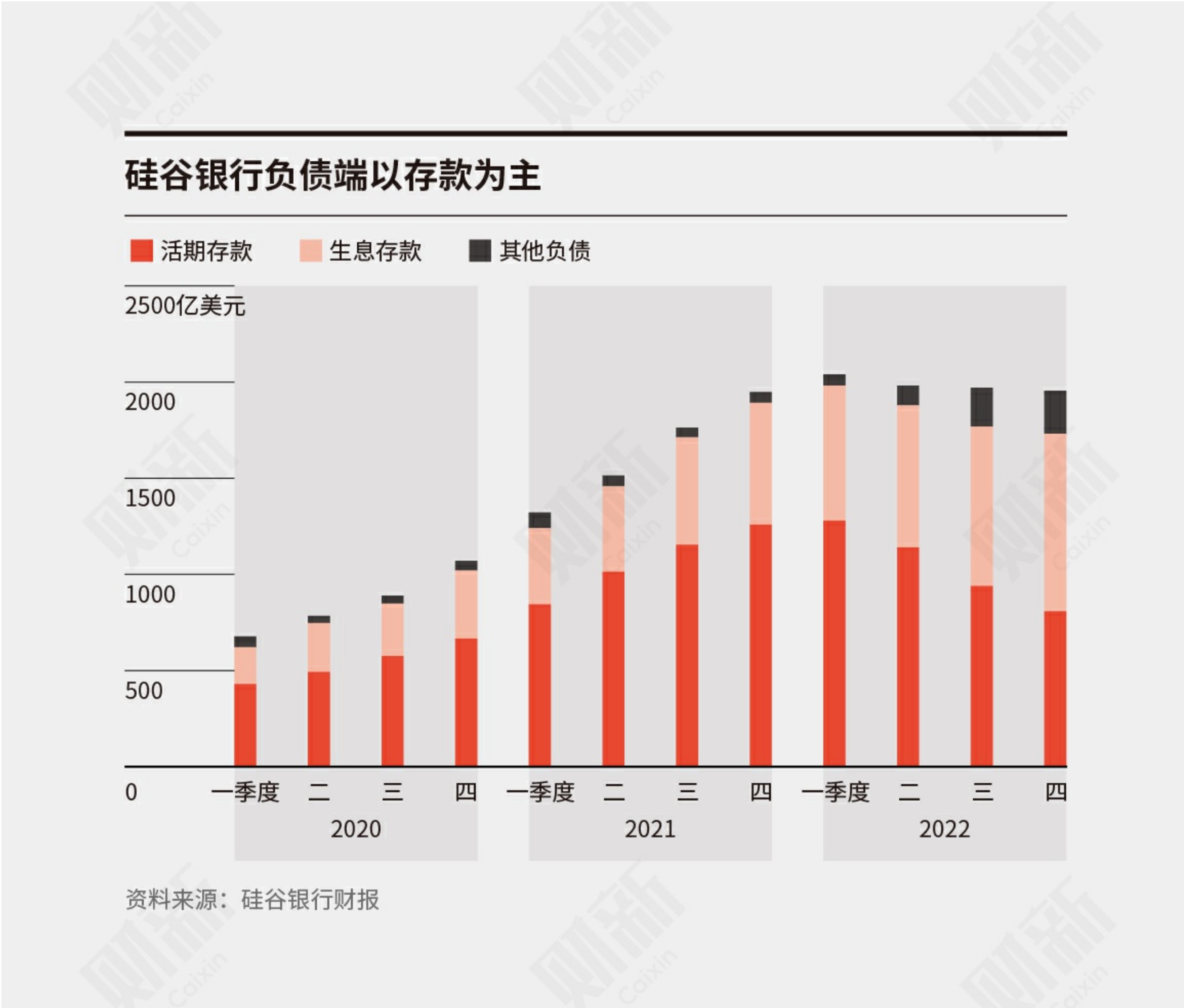
在硅谷银行存款的初创企业中，也不乏中国公司的身影。对中国企业来说，使用硅谷银行还有一个特殊原因。一家国内软件企业CEO告诉财新，在海外银行中，硅谷银行对使用VIE（协议控制）架构的中国公司最友好，不仅设有开曼群岛支行，业务也最熟悉。在VIE架构中，中国企业募资在国外，而收入和利润在国内，境外募资实体与境内运营实体之间通过合同控制，双方资金往来又受到中国外汇管理政策影响，导致很多国际大银行认为风险较大，不愿意为中国初创企业开户。

不过，上述国内头部创投机构人士指出，过去几年，受中美关系影响，很多中国公司减少了海外业务的规模，美元资金回流，客观上减轻了这次风波对中国企业的影响。

除了初创企业，很多投资机构也喜欢使用硅谷银行。一位中国律师告诉财新，大银行一般会要求风投机构常年在账上有数千万美元资金，很多中小型风投机构只有在投资初创企业时，才会让出资的普通合伙人将钱打到账上，再转给初创公司，日常留在账户里只有数十万美元，很多大银行便不愿意为之开户。




硅谷银行资产端久期配置明显拉长
到期可售债券（AFS）余额
持有至到期债券（HTM）余额
AFS加权平均期限（右轴）
HTM加权平均期限（右轴）
1000亿美元
800
600
400
200
0
7年
6
5
4
3
2
一季度
二
三
四
2020
2021
2022
资料来源：硅谷银行财报



硅谷银行负债端以存款为主
活期存款
生息存款
其他负债
2500亿美元
2000
1500
1000
500
0
一季度
二
三
四
一季度
二
三
四
一季度
二
三
四
2020
2021
2022
资料来源：硅谷银行财报



风投机构在硅谷银行的资金，既有存款，也有托管资金。市场尽调服务公司Castle Hill披露整理了受硅谷银行托管的5655只私募基金。据财新统计，其中中国的私募基金合计49只（6只规模为零的未计入），规模总计约170亿美元，包括红点风投、方源资本、源丰基金、红杉资本、嘉御资本、光大瑞华等公司的基金。

正因为此，硅谷银行倒闭的消息在创投圈引起极大震动。3月11日，美国风险投资公司General Catalyst的CEO哈曼特·塔内贾（Hemant Taneja）组织了一次全球风投的联署，称如果硅谷银行被收购并获得适当资本，参与签名的风投公司将继续支持硅谷银行，并鼓励被投公司恢复与硅谷银行的关系。截至美国时间3月12日下午，参与联署的风投公司从最初的13家增加至590家，包括红杉资本、光速创投、高通风投等。

3月12日，孵化器Y Combinator的CEO陈嘉兴（Garry Tan）也发出一份面向美国政府的请愿书，称Y Combinator支持的初创企业中，约三分之一使用硅谷银行或只在硅谷银行有账户，这些公司有可能在未来30天内因耗尽现金流而倒闭，导致超10万名员工失业，呼吁美国政府采取行动。

这些呼吁看来颇有成效。当地时间3月12日晚，FDIC发布公告称，美国财长耶伦批准了相关措施，以保证FDIC完成对硅谷银行的处置将“完全保护全部储户”，改变了两天前“储户仅可取回受保额度内存款”的立场。

“3月13日早上起，储户可以提取账户里的所有钱。”FDIC在最新的公告中表示，除了硅谷银行的储户，签名银行的储户也将得到存款的全额兑付。

随着硅谷银行允许转账，企业客户们迅速将存款转到美国银行、花旗银行、富国银行（Wells Fargo）等更大规模的银行。“渣打、汇丰、花旗这几天都在疯狂开户。”前述中国香港的美资银行人士表示，为了抢客户，开户门槛也下降了。

“我们观察到很多公司取出钱之后，有几种情况：爬坡期的公司会分散资金，放在不同银行；但一些生意还在很早期的企业，对硅谷银行的服务有依赖性。如果硅谷银行不做了，不排除会有其他银行继续来做，因为需求是真实存在的。”一家投资早期科技和消费公司的国内风投人士向财新表示。

救助措施引争议

“全额兑付存款”并不是一般情况下FDIC的处置模式。

FDIC是美国联邦政府用以处置银行风险的一个独立机构，成立至今已有90年，资金主要来自银行和其他存款机构为了存款保险而向FDIC支付的保费，在2008年发端的那轮金融危机期间，曾平稳关闭、处置了4000多家小银行的风险，维护了基本的金融稳定。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存款人在单家银行的受保存款限额为10万美元；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为了保障储户权益和金融稳定而上调至目前的25万美元。

对于这次FDIC对硅谷银行和签名银行的全部存款承诺全额兑付，市场看法不一，甚至两极分化。

城堡投资（Citadel）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肯·格里芬（Ken Griffin）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批评了全额兑付的救助方式：“政府让所有储户‘全身而退’是金融纪律的损失。”

彼得森研究所研究员、法国经济学家Nicolas Véron则直言“愤怒”：“FDIC这次决定对储户存款提供无限担保，是对原先体系的重大改变，无异于用‘狼牙棒打苍蝇’。”

“当然，市场肯定还是会有一些波动。一些区域型的、中小银行的股价大跌是很正常的，因为市场预期接下来对它们的监管会收紧。”Véron认为，“但主要的危机已经过去了。”

从FDIC的公告看，对两家银行“完全保护全部储户”，是基于美国财政部、美联储和FDIC批准这属于“系统性风险例外”（systemic risk exception）情形。3月16日，耶伦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解释说，之所以批准“系统性风险例外”，主要是“担心这种情况可能传染”，“导致未保险存款占比也比较高的其他银行也面临挤兑”。

根据1991年生效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促进法》（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Improvement Act，FDICIA），将银行定义为“（倒闭）有系统性风险”需经美国财政部和总统的批准，并且FDICIA还要求FDIC确定问题银行处置方案时，必须选择“成本最低”的方案。

被接管前，硅谷银行的总资产逾2100亿美元，签名银行总资产为逾1000亿美元，在美国监管部门的银行分类中均属第四类。从资产规模而言，说存在系统性风险似乎言过其实。

Sheila Bair指出，硅谷银行和签名银行的总资产一共只有逾3000亿美元，对总资产23万亿美元的美国银行体系来说，微乎其微。监管部门将两家中型银行认定为“系统性风险”，表明它们认为系统很脆弱。

“政府在沟通时需要非常小心，以免自己的过度反应导致它想要避免的存款挤兑发生。”Sheila Bair提醒说，“如果市场据此认为1000亿美元是新的‘系统性重要’阈值，那么社区银行肯定会面临未保险存款出逃的局面——流向1000亿美元以上的银行。恐惧本身就会引发挤兑。”

在Sheila Bair看来，更合理的做法是暂时为所有未投保的存款账户提供支持，并向银行收取存保费来弥补损失的费用。她还介绍了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担任FDIC主席时的处置经验：针对破产金融机构支付薪资和其他运营支出的需要，制订了一个“未保险交易账户”计划；这是为了保护社区银行，否则它们的未受保护的客户就会流失到摩根大通和富国银行等银行巨头，“当时这个做法成功结束了社区银行的挤兑”。

一位国际评级机构信用评级负责人也对财新表示：“严格来说，这两家银行的规模都没有到‘大而不能倒’的地步，援助主要是考虑稳定市场情绪。”

部分观点认为，美国监管部门向硅谷银行和签名银行“伸出援手”，是为了防止硅谷银行成为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这两家银行‘爆雷’的时间点确实太不好了。2022年下半年起美联储大步加息以后，市场都觉得要出事了，都在看是谁。本来市场信心就很脆弱，忽然来这么一下，整个就崩溃了。”这位评级机构信用评级负责人续指。



当地时间2008年10月28日，美国纽约，排队的求职者。国际金融论坛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祝宪认为，美国政府与监管部门迅速介入，是吸取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教训，及时纾困。图：Mario Tama/视觉中国

国际金融论坛（IFF）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世界银行前副行长祝宪认为，美国政府与监管部门迅速介入，"这是吸取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教训，及时纾困"。

"硅谷银行的失败具有系统性传染风险。它的倒闭已经在创始人和管理团队心中灌输了恐惧，让他们为剩余现金寻找更安全的避风港，这可能会引发其他小银行的挤兑。"陈嘉兴警告。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认为，美国政府救助硅谷银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客户集中于风投机构和科创企业，而科技创新对美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很重要，短期而言对美国股票市场也很重要。

"美国这次特别注意不拿纳税人的钱去救，这和上次金融危机时联邦政府直接纾困还是不同的。"祝宪指出，"这次处置硅谷银行和签名银行的钱应该是优先由FDIC来出，这笔钱还是从银行业来的。"

瑞银大中华金融研究主管颜湄之表示，如果需要FDIC出资，未来参保银行的保费或将提高，银行可能通过提升贷款利率把这些保费成本传导给借款人，"这也相当于提高利率，间接起到加息和帮助美联储通胀降温的作用"。

鲁政委认为，硅谷银行被接管之后，所有资产负债转移到了过桥银行，银行还在正常运营，理论上如果过一段时间银行恢复正常，其实是可以拿银行的盈利来补窟窿的。

3月14日，由FDIC指派的硅谷银行过桥银行SVB.NA的新任首席执行官Tim Mayopoulos向客户发出电子邮件呼吁，希望此前提取存款的客户将部分资金转回该行，帮助硅谷银行重建储蓄根基。塔内贾与数家风投机构亦呼吁，初创企业可以将50%的资金留在或转入被接管的硅谷银行。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指出，如果FDIC能够和潜在买家最终谈妥硅谷银行和签名银行的收购承接，储户及其存款自然转移，FDIC只是先行垫付，就不存在所谓的"刚兑"。"硅谷银行的品牌效应、客户资源其实都很值钱，不排除被溢价收购。"

资产负债严重错配

"这是一个典型的资产负债错配。"芬克一针见血。

从财报看，在2020年以来应对疫情冲击的美联储大宽松中，硅谷银行的资产负债规模极速扩张。

在负债端，疫情后两年的货币宽松环境下，科创公司融资热火朝天，导致大笔存款涌入硅谷银行，其负债总额从近650亿美元增至近2000亿美元，增长了2倍，而且大量的是不计息的活期存款，2020年一季度至2022年一季度该行活期存款一度超过总负债的60%；而在资产端，该行配置了大量持有至到期债券（HTM），且从2021年四季度开

始久期明显拉长。

“这个扩张速度本身就不正常。”曾刚指出，一方面，硅谷银行吸引到的企业存款利率敏感性高，一旦加息，肯定要寻找收益更高的投资项目；另一方面，这些企业存款规模通常都超过了FDIC的25万美元的存款保险上限，不受保险的大部分存款风险敏感性很强。财报显示，硅谷银行25万美元以下的存款仅占3%；签名银行的占比略高，也仅有6%。

更致命的是，这些存款的同质性极强。美联储前高级经济学家胡捷分析称，硅谷银行的储户相似性问题隐藏很深，乍一看，科技企业千奇百怪，有的做软件，有的做硬件，有的做火箭，但实际上有个共同特点——对于融资环境高度敏感，“正是这个统一性导致了这次灾难”。

面临大量涌入的存款，硅谷银行并没有足够的贷款项目可以及时投放，只能投入金融市场。以2022年为例，硅谷银行资产中的55%都是证券资产，贷款不足20%。财报显示，2020年一季度末至2022年四季度末，硅谷银行持有债券余额从260亿美元增至近1200亿美元。

细分来看，硅谷银行持有的证券资产分为可售债券（AFS）和HTM。2022年末，HTM资产大约是AFS资产的4倍；HTM资产的未兑现亏损高达151亿美元，是2021年末的15倍。

鲁政委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欧美央行进入长期低利率乃至零利率、负利率时期，金融机构普遍存在两个预期，一是未来不用担心通胀、加息；二是债券投资应该拉长久期。

但在上海交通大学经济系教授钱军辉看来，“期限错配本身不是问题，所有银行都依赖期限错配赚取‘期限转化’所得的息差。硅谷银行的问题是风险管理缺失。

银行选择资产时应考量流动性风险、违约风险和利率风险三方面。“在三个风险维度上，硅谷银行顾及了前两个，国债与MBS的流动性风险与违约风险都非常低；如果美联储维持稳定的利率环境，实际上利率风险也不存在。”胡捷指出，“它们本可以选择利率期货或者利率掉期进行对冲利率风险，这是商业银行的常规操作，美国市场上相关产品非常完善。显然硅谷银行或者没有做，或者做得不到位。”

钱军辉同样认为：“中小银行应更好地对冲利率风险，不能贸然赌利率走势。”前述国际评级机构信用评级负责人亦指出：“这种利率风险应该提前管理。按理说，2022年下半年加息节奏那么快，银行应该有所准备，这是基本技能。”

胡捷分析称，硅谷银行未管理好利率风险可能的原因包括：低估了科创公司融资形势的恶化程度，从而低估了存款流失的速度；低估了美联储加息的持续时间，认为科创公司融资环境会在较短时间改善；对于储户心理的脆弱性估计不足。

“即便今天，我还是认为硅谷银行在细分领域是做得非常优秀的银行。出问题的不是它的核心业务，恰恰是因为它偏离了核心业务。”曾刚解释说，自2019年以后硅谷银行吸储超过原先的近3倍，完全超出了自身的资产负债管理能力。

直至硅谷银行3月8日发布增发股票公告当天，穆迪才将硅谷银行的发行人评级从A3降至Baa1，展望从“稳定”调至“负面”。穆迪在报告中指出，除了硅谷银行资产负债表反映出的盈利能力下滑和流动性风险，“降级的另一个驱动因素是治理能力”——资金和盈利状况在短时间内发生的重大变化，表明其财务战略和风险管理的风险容忍度高于穆迪此前预测。

事实上，在2022年的大半时间内，硅谷银行首席风险官缺位。3月14日，美联储已宣布对硅谷银行缺乏风控开展调查。

硅谷银行出现的资产负债严重错配问题，在美国中小银行中颇具代表性。在同一周内跟硅谷银行一起倒下的签名银行与银门银行，特色是主要服务加密货币行业。曾刚指出：“过去两年加密货币很热，资金来源增长很快，所以这几家银行有特殊与相似之处——核心存款来源不稳定；一旦要了这些存款，就会导致资产端配债偏离核心业务。”

此外，美联储的数据显示，2022年以来，美国商业银行的可售债券未兑现损益由盈转亏，且浮亏逐步扩大。

据国金证券统计，目前美国前百大商业银行HTM的损失，占权益资本最高的可达171.5%，前五大商业银行摩根大通、美国银行（BoA）、花旗银行、富国银行和美国银行公司（US Bancorp）的HTM损失占权益资本之比分别为12.1%、47.7%、15.2%、25.4%和18.3%。

为了“消除存款机构急抛证券资产的压力”，美联储宣布设立BTFP计划，向符合条件的存款机构提供为期一年的借款；借款的利率为一年期隔夜指数掉期利率加10个基点，目前约在5%上下，略高于联邦基准利率；美国国债、机构债务和MBS等资产均可作为抵押品，并将按面值进行估值，不打折。

颜湄之指出，BTFP对银行业来说，比FDIC的全额兑付更加重要，这种方式可以有效解决银行的流动性问题。

追责与强化监管

两家银行被FDIC接管之后，主事人迅速换血。

硅谷银行被接管当天，原首席执行官Gregory W.Becker被辞退，学法律出身的Tim Mayopoulos接受FDIC的任命，成为FDIC为硅谷银行设立的过桥银行SVB.NA的CEO。签名银行的过桥银行Signature Bridge Bank，也已由另一家银行Fifth Third Bankcorp的前首席执行官Greg Carmichael入主。

3月12日，美国证监会（SEC）主席加里·金斯勒（Gary Gensler）在一份声明中表示，SEC特别关注市场稳定性的监测，将识别市场波动期间任何威胁到投资者的不当行为，并提起诉讼。

3月13日，硅谷银行的股东代表对该行及前首席执行官、首席财务官向加州圣何塞联邦法院提起集体诉讼，诉告银行在美联储加息开始后“存在虚假或误导性披露”，对风险的告知不充分，导致持股人利益受损。次日，签名银行的股东们也对该行及前首席执行官、首席金融官以“欺诈性公告”（fraudulently proclaiming）为由提起了集体诉讼。

此外，美联储监管副主席Michael S.Barr也正在审查对硅谷银行的监管举措，结果将于5月1日前公开发布。“我们要保持虚心，仔细彻底地审查我们是如何监管这家银行的，之后又能从这次的教训中学到什么。”Barr指出。

兴业证券宏观团队海外负责人卓泓认为，此次危机之后，美联储可能将重新加强针对中小银行的管理，可能的监管改进方向包括，“要求降低中小银行金融投资类资产比重、要求中小银行将未实现损益列入核心一级资本净额，避免出现银行资本充足率虚高等情况”。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于2010年通过《多德—弗兰克法案》（下称《法案》），对金融监管体系进行改革，包括对银行资本充足率提高审核要求。根据《法案》165条要求，2014年美联储按照银行的资本结构、风险类别、复杂程度、金融活动、规模等与风险相关的指标，将资产500亿美元以上的银行分为五类，要求资产超过500亿美元的银行必须每年参加美联储的年度压力测试，即“全面资产分析与审查”（CCAR）。

美国将银行按照监管严格程度分成五类

类别			I类	II类	III类	IV类	V类
分类标准			美国境内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	总资产≥7000亿美元，或跨境业务≥750亿美元	总资产≥2500亿美元，或非银资产、加权短期批发融资、表外敞口等≥750亿美元	总资产≥1000亿美元且不属于前三类银行	总资产≥500亿美元且不属于前四类银行
监管要求	资本要求		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长期贷款				
监管要求	资本要求	压力测试	每年进行公司内部与监管部门压力测试，并提交资本计划书	每年进行公司内部与监管部门压力测试，并提交资本计划书	公司内部每两年进行一次压力测试；每年监管部门进行压力测试并提交资本计划书	每两年进行一次监管部门压力测试，每年提交资本计划书	
监管要求	资本要求	风险资本	GSIB附加资本；逆周期缓冲资本、累计其他综合损益（AOCI）必须计算资本影响等	逆周期缓冲资本、AOCI必须计算资本影响等	逆周期缓冲资本、AOCI可选择不计算资本影响	AOCI可选择不计算资本影响	AOCI可选择不计算资本影响
监管要求		杠杆资本	加强补充杠杆率要求	补充杠杆率要求	补充杠杆率要求	有杠杆资本	有杠杆资本
监管要求	流动性要求	标准要求	每日保持100%流动性覆盖率（LCR）和净稳定资金比率（NSFR）	每日保持100%LCR和NSFR	若加权短期批发性融资＜750亿美元，按照85%的LCR和NSFR标准执行	若加权短期批发性融资＜500亿美元，没有LCR要求；反之LCR和NSFR按照原标准的70%执行	
监管要求	流动性要求	汇报	每天提交监管报表	每天提交监管报表	若加权短期批发性融资＜750亿美元，则每月提交监管报表	每月提交监管报表	
监管要求	流动性要求	内控	每月进行流动性压力测试、进行流动性风险管理	每月进行流动性压力测试、进行流动性风险管理	每月进行流动性压力测试、进行流动性风险管理	每季度进行流动性压力测试、进行适当（tailored）的流动性风险管理	
典型代表			摩根大通、富国银行、美国银行、高盛集团、花旗银行、摩根士丹利等	北方信托公司	PNC金融服务集团、Capital One、US Bancorp等	硅谷银行、美国运通等	NY Community Bank等

资料来源：美联储

但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法案》在2018年经历了一次重要修订，对小型的、不复杂的、未跨国运行的银行机构施行简化甚至放宽的监管要求，对资产规模在2500亿美元以下的银行放松了“强化审慎标准”（EPS）的大部分要求。而近期“爆雷”的三家银行均没有到达压力测试的标准。据悉，硅谷银行前首席执行官Greg Becker曾是提高压力测试门槛的倡导者。

此外，EPS原本要求含普通股的核心一级充足率（CET1）达到4.5%，同时一级资本充足率达到6%，也就是目前巴塞尔协议要求的最低下限；而且要求未兑现的损益应计入CET1。但在EPS的适用范围缩小至2500亿美元资产以上的银行后，这些监管要求对中小银行也明显放宽。

标准放宽后，2018年的硅谷银行属于总资产500亿至1000亿美元的第五类银行，不需要接受相应的监管压力测试，同时也不需要每年向监管机构提交相应的资本规划。2021年硅谷银行从第五类银行升级为总资产1000亿至2500亿美元的第四类银行，同样不需要自行进行资本压力测试，但是监管机构每两年对其开展一次监管压力测试。硅谷银行的最早一次CCAR压力测试定于2024年开展。

“压力测试中，有一条就是应对美联储加息的情况。”胡捷表示，但是新规意味着，彼时还是第五类银行的硅谷银行在2018年中断了压力测试，而在其资产急剧扩张至倒闭前，尚未等到监管机构对第四类银行的压力测试。

Véron分析称，特朗普政府去监管、美联储同期监管失责也是硅谷银行等中小银行出现危机的重要原因。旧金山联储是硅谷银行的前线监管者，但是主要监管职责仍在美联储。硅谷银行风控能力欠缺、不对冲大量敞口，都是监管机构应该预警的。

硅谷银行的问题浮出水面后，芬克预计银行所面临的资本标准会更加严格。华泰证券宏观研究报告也指出，硅谷银行的风险暴露可能导致美联储增加合意准备金。在前述听证会上，耶伦表示，未来美国监管部门应该考虑针对未保险存款的流动性要求。

德邦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芦哲指出，美国小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占总资产比重较大银行下降更快；截至2023年3月，美国大型商业银行的准备金占比为9.81%，小型银行则为6.49%。

此外，华泰证券宏观研究报告指出，疫情后美国的银行所持有的国债等证券资产占比上升至历史高位附近，考虑账面损失，银行当前的资本充足率可能存在虚高。

目前，在计算风险加权资产时，美国国债被视为"零风险"资产，也就是理论上银行不必为国债准备任何的"缓冲资金"。

"监管者需要重新考虑现行资本和流动性规则下，将政府证券视为基本无风险的做法。"Sheila Bair提示，"当利率上升时，它们绝不是无风险的。"

激进加息之果？

除了银行自身风控缺位和监管失责，多位分析人士将此轮美国中小银行风险的源头指向货币政策的过快逆转。

"40多年来节奏最快的一轮美联储加息，在金融系统上留下裂痕，就必然会引发其他事件。"芬克在致投资者的信中指出。

颜淯之认为，本质上美联储有很大责任。美联储放水时间太长，也没有预料到结构性的通胀不易被加息扭转：一方面美国去全球化，另一方面疫情后大量发钱、劳动力退出情况下劳动力短缺、供给受限，加剧通胀。"美联储误判之后就快速加息，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

上海交通大学金融系副教授李楠认为，加息会加速之前形成的资产泡沫（如科技企业、加密货币、房地产市场等）的破裂，因此硅谷银行的倒闭只是美国金融市场形势恶化的一个标志，美国出现衰退的概率在逐渐上升。

硅谷银行的客户，主要集中在风投企业以及科技、生命健康行业的初创企业。银门银行和签名银行则在近年来借助加密货币行业的东风，迅速成为"加密货币友好银行"，为加密货币行业的企业提供金融服务。

这些恰恰是近年来具有超强超额收益的行业，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一直未遇逆风。自2011年起，硅谷银行的净资产收益率（ROE）几乎一直保持在10%以上，2018年后一度升至20%以上；签名银行的ROE也基本保持在10%以上，虽然2018年曾跌到8%以下，但很快又反弹到10%以上，在2022年末时ROE超过16%，为2010年以来高点。

"这些行业的特点就是大起大落，行业周期远强过宏观周期，涨得狠，跌得也狠。"前述国际评级机构信用评级负责人表示。

2020年全球暴发新冠疫情后，超强周期行业所面临的环境也在悄然改变，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因素之一，就是疫情期间美国采取的大规模直接刺激政策。此举除了后来推升通胀、为日后的超级加息周期埋下伏笔，也导致市场中"热钱"增加，企业手头现金增多，最终回流银行。

但高度依赖容易泡沫化的周期性行业，逆转风险也很大。虽然最终导致"溃堤"的是硅谷银行股价崩盘当日420亿美元的集中挤兑，但该行的储户自美联储加息以来就已经开始"抽水"。2022年一季度末，硅谷银行的存款余额达到1980余亿美元，随后三个季度合计回落250亿美元至2022年末的1730亿美元。签名银行的存款在2022年合计被"抽水"也达180亿美元。

"硅谷银行本质上是一家创新业务做得很好的银行，但在传统银行业务领域翻车了。"前述评级机构信用评级负责人坦言，"其实疫情这种变量出来之后，就该警惕了。当聚焦的行业进入下行期，正好又赶上利率走势不适合自己的投资方向，应该充分认识到风险。"

达利欧则认为，此次美国银行业动荡是短期债务周期泡沫破裂阶段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事件"，通胀和信贷增长放缓会催化负债收缩。"这家银行倒闭或许就是'煤矿里的金丝雀'，在风投领域产生连锁反应。"

3月14日，穆迪宣布将整个美国的银行系统评级展望从"稳定"降至"负面"，因为在硅谷银行等两家银行遭挤兑倒闭后，银行系统的"运营环境迅猛恶化"，尽管有超常规举措出台，但存在大量未实现证券损失的银行，以及拥有非零售和未投保美国储户的银行还有风险。

"现在只能说是最脆弱的地方破了，还不能说问题都已经解决，而且这还不仅仅是美国的问题。"鲁政委指出，"2008年之后欧美金融市场长期流行着零利率、拉长久期的故事，所有的金融机构都是如此，最近一年利率陡

然上升，必然导致损失无法分担，而且保险公司的资产负债久期错配比银行更多。基于这个逻辑，我认为这才是'冰山一角'。"

美联储的困境

突然爆发的金融风险事件，令美联储专注于控制通胀的货币政策陷入两难。自2022年3月以来，美联储在不足一年的时间里将联邦基金利率提高了450个基点，至4.50%—4.75%区间。即便如此快速的加息，以名义利率减去通胀读数之后，得到的实际利率仍旧处于负值区间。

2023年初，除去美国房地产市场增长明显放缓，很难观察到快速加息还给美国经济带来哪些副作用。劳动力市场供需仍偏紧，多项1月经济数据超预期上涨，使得华尔街一度已经开始交易美国经济"不着陆"的预期。

硅谷银行的"爆雷"显然改变了这一切。在此之前，由于劳动力市场尚未降温，美联储可以专注抗击通胀。如今随着维持金融市场稳定的权重骤升，让美联储的任务难度陡增。

而现在美联储官员已进入3月22日利率决议前的缄默期，无法及时给市场提供指引。于是，华尔街通过交易呈现出了美联储将在3月暂停加息的可能性——芝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美联储在3月暂停加息和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一度几乎各半（45%∶55%）。

暂停还是继续加息？加多还是加少？对当前的美联储而言，都是两难。继续加息会加重银行资产端的压力。但若是暂停加息，不仅会影响央行的公信力，甚至会被市场解读为危机升级的信号，进一步加剧市场动荡。

值此抉择之际，欧洲央行先于美联储公布3月议息决议。在如期加息50个基点的同时，欧洲央行表示其政策工具齐备，可以在必要时为欧元区金融体系提供流动性支持，且由于能源价格下跌调低了2023年欧元区的通胀预期。议息决议宣布后，欧洲股市小幅震荡，多个主要股指拉升转涨。

从数据上看，美国整体通胀已有所降温。在高基数影响下，美国CPI（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同比读数可能在此后几个月间出现改善，但美联储对宣布取得抗通胀的胜利仍持谨慎态度。

"我们将对发出认为比赛获胜的信号（持谨慎态度），因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2月议息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虽然商品领域已出现通胀减缓（disinflation）的信号，但后续还要关注非住房核心通胀的变化。

核心通胀，尤其是鲍威尔提示市场关注的非住房核心通胀，是由服务和劳动力价格支撑的通胀，仍具有一定的黏性。截至3月11日当周，美国初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低于市场预期，这表明劳动力市场仍然强劲，或增大工资通胀的压力。

但行百里者半九十，最后这一段路程因为市场复杂的博弈和情绪传导，必将异常艰难。鲁政委认为，硅谷银行冲击波不会让美联储加息的步伐停下来，但是可能会让鲍威尔回到正常的加息幅度内。

其实，连续四次加息75个基点后，美联储已放缓加息步伐。它在近几个月的货币政策声明中也明示，在决定后续加息幅度时，将考虑紧缩货币政策的累积效应，货币政策影响经济活动和通胀的滞后性，以及经济和金融的发展情况。

金融市场绝非线性发展，后续加息的边际影响会更大。特别是在经过长期低利率环境后，市场的行为方式和风控意识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硅谷银行危机就说明，并非所有金融机构的管理层都可以明智管理当前的市场风险。

不过，在美联储的历史里，加息带来的金融风险并不是新挑战。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时任美联储主席沃尔克大幅加息以抗通胀，不仅导致美国经济衰退，也引发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但沃尔克坚持加息，为此后美国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而且，危机本身就可以令市场进入收缩状态，加速对需求端的抑制，进而帮助控制通胀。美国前财长萨默斯指出，当前需要判断的是美联储接下来还要收紧多少；在银行对外部环境感到紧张时，通常会减少借贷，这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美联储想要的收紧金融环境的效果。

包括美联储在内的美国金融监管机构还有很多工具，可以用来维持金融稳定。3月9日至3月15日的一周中，美联储通过贴现窗口向银行借款激增至1528.5亿美元，远高于前一周45.8亿美元的水平，也打破了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创下的1107.4亿美元的纪录；同时，银行还从美联储新设立的BTFP中借出119.4亿美元。一系列的支持措施，使得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在过去一周扩大约3000亿美元，几乎抹平了过去四个月为缩表所做的努力。

需要注意的是，美联储此次加息本就有缩表行动配合，重新扩表的可能性，或会对冲掉美联储抗击通胀的努力。如何拿捏分寸，秉持初心，才是对美联储的终极考验。

"金融稳定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宏观政策出现严重错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奥巴马政府首席经济顾问弗曼（Jason Furman）指出，"美联储暂停加息会导致后续有更快或更多的加息，也可能会造成市场预期与未来政策行动

间出现严重的脱节，这些都可能会加剧金融风险。”

屈运栩、王晶对此文亦有贡献

更多报道详见：【专题】硅谷银行危机

版面编辑：刘潇

社论 | 吃改革饭走开放路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3月20日第11期

中国之所以能在过去45年克服困难、披荆斩棘，靠的就是"吃改革饭，走开放路"

作为全国两会的一大亮点，3月13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首场记者会。新任总理简明阐述了施政思路，回应了若干当前热点问题，基调稳健务实而又态度鲜明。他提出"吃改革饭，走开放路"，可谓掷地有声，令人充满期待。

李强重申，政府工作的宗旨就是为民造福，扎扎实实办好每一件民生实事。这绝不意味着事务主义；恰恰相反，欲真正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具备完整系统的指导思想和行之有效的方法论；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这就需要更加态度鲜明地高举改革开放的大旗。正如李强所说，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我们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进程中，还是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在深化改革开放中不断增强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改革开放45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不过，中国的发展还不平衡、不充分。李强坦承，我们的发展更多地只是解决"有没有"的问题，下一步需要更加重视解决"好不好"的问题，特别是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等。

这些问题既是紧迫难题，又是长远挑战，欲求得圆满解决，惟有依靠改革开放。本次记者会15次提及"改革"、15次提及"开放"，涵盖高质量发展、农村振兴、稳外资、政府自身建设等诸多领域。其中，尤以民营经济发展引人关注。

民营经济发展是当前中国经济的难点和痛点。记者会对此没有回避，"去年有段时间，社会上有一些不正确的议论，使一些民营企业家内心感到忧虑。"他表示，"两个毫不动摇"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是长久之策，过去没有变，以后更不会变。他的态度是明确的。

理念植根于实践。李强曾先后在浙江、江苏、上海等地工作过。这些地方都是民营经济重镇，浙江尤为典型。民营经济怎样使这个"七山一水二分田"之地民富省强，生动展现了民营经济一旦放开手脚、轻装前进，会释放出多么巨大的威力，证明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何等明智的抉择。

李强特别提到江浙等地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乡镇企业时的"四千"精神，即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应该说，这些精神本就蕴藏在民众之中，它们能不能释放，取决于体制与政策。如果体制合理、政策对头，这种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创业精神就能够焕发出来，而且路可少走、话可少说、心可少费、苦可少吃；反之，企业家则会吃许多无谓的苦，"四千"精神就会被消磨和压抑。这就需要政策制定者真切了解民营企业家们眼下的忧虑究竟有哪些。"在新起点上大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平等对待各类所有制企业，依法保护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促进各类经营主体公平竞争，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李强的这些表述击中了要害。

改革开放的45年，是中国拥抱全球化的历史。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壮大，也为各国来华企业创造了历史机遇。李强表示，"对外开放是我们的基本国策。无论外部形势怎么变，我们都将坚定不移向前推进。"他还承诺，"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环境会越来越好、服务会越来越优。"他提到，今年，中国将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进一步扩大开放。2022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积极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高标准经贸协议，主动对照相关规则、规制、管理、标准，深化国内相关领域改革"。公众急切期盼看到进展。无论未来能否顺利加入这两个协定，中国都应先行改革完善相关制度，以达到其要求。

谈及开放，中美关系是绕不过去的。李强说，中美两国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都从对方的发展中受益。"中美可以合作、也应该合作。中美合作大有可为。围堵、打压对谁都没有好处。"据中方统计，2022年，中美贸易额近760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这表明，中美关系中的"浮云"不应遮挡中国对外开放的"望眼"。

记者会甫一开始，李强便坦承，"说到困难，大家都有困难，今年我们的困难也不会少。但是，大家想一想，哪个时候、哪一年没有困难呢？我们从来都是在克服困难中不断实现新发展的。"克服困难需要决心与勇气，更需完善的体制与明智的政策。根本而言，中国之所以能在过去45年克服困难、披荆斩棘，靠的就是"吃改革饭，走开放路"。当今决策层，与全国人民一道，都是这一历史变迁的见证者，也理当成为捍卫者和推进者，需要用行动消除国外一些媒体所谓"中国改革开放时代已经终结"的误解或曲解。中国的明天，就系于如何把这碗饭做得更美、这条路拓得更宽。▫

相关报道：社论之二丨再谈"吃改革饭 走开放路"

（本文为即将于2023年03月20日出版的《财新周刊》第11期社评**）**

更多报道详见：【专题】2023全国两会报道

社论之二｜再谈“吃改革饭走开放路”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3月20日第11期

民营经济心无忧惧、一心谋发展之时，就是中国经济充满活力的时期

在3月13日国务院新总理的首场记者会上，李强总理在提出“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的同时，还直指：去年有段时间，社会上有一些不正确的议论，“使一些民营企业家内心感到忧虑”的不正常状况；他重申“两个毫不动摇”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是长久之策，过去没有变，以后更不会变！

这番表述令人欣慰，也启人深思：“不正确议论”为什么长期存在，而且能够不时“等闲平地起波澜”？

改革饭、开放路，并非现成饭、平坦路。45年风雨历程，阻力一直都在，争议也从未止歇。针对民营企业的褒贬，更是贯穿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堪称检测不同时段改革开放顺利与否的体温计。应该承认，虽然中央的态度没有变，相关错误言论却持续泛滥。

在健康的现代社会，有不同声音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关键是要以事实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无视、曲解甚至否定中央大政方针，针对一些民营企业，无中生有，小题大作，拨弄是非，成了一些论客的立身之本、谋财之道。有些人走得更远，近狎邪僻，完全视民企为异己力量，否定市场经济，甚至将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归咎为民营经济壮大乃至改革开放。民营企业则不敢言、不敢怒，更无法通过法律等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长此以往，即便中央一再释放“定心丸”，这些“不正确言论”对于企业家的信心和预期也会构成沉重打击。这正是眼下中国经济的棘手难题。

对此，不少有识之士忧心忡忡。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为了进一步营造对民营经济友善的发展环境，民进中央建议开展若干有社会影响力的纠偏工作，为民营经济及民营企业家“正名”，对部分故意歪曲、恶意抹黑的不实声音适时予以行政及法律惩处，并向社会公开裁定结果。我们为这份建议叫好，相信有关部门会依法依规处置那些不实声音。

然而，如果只是作为个案来处置，有关部门会左支右绌，这些言论的拥趸还会感到丝丝悲情。必须消除其存在的社会土壤，才能从根本上打消民营企业家的忧虑，使中国经济尽快恢复活力，走上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不正确言论”存在的社会土壤是什么？原因极其复杂，简言之，是中国发展还不平衡、不充分；是民众在住房、就业、收入、教育、就医、生态环境等问题上的种种不顺心；是虽经中央大力治理却仍存在的官员贪腐现象，官员与企业家之间“亲清关系”尚待形成。这些问题都是改革“深水区”有待解决的问题，然而，在一些摇唇鼓舌之辈煽动下，这些问题反而成了改革开放带来的恶果，民营企业也便成了替罪羊。

因此，消除“不正确言论”的社会土壤，关键在于按照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等既定部署深化全方位改革。须着力推进法治国家建设，促进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竞争。 在政策制定上，坚决避免针对民营企业出台收缩性政策。

要理直气壮地宣讲改革开放的成就，充分肯定民营企业的功绩，真正把民营企业家看作“自己人”。在涉及民企的问题上，无法避免、也根本没有必要逃避争论；压制争论、万籁俱寂不是好办法。“最好把真理比作燧石，——它受到的敲打越厉害，发射出的光辉就越灿烂。”

为此，需要原原本本地讲清楚改革开放的由来，特别是民营经济发展的来龙去脉。大讲改革开放史、大讲民营经济发展史，对于“早岁哪知世事艰”的当代年轻人尤为重要，他们最易受“不正确言论”的媚惑。此外，还要在理论上消除不彻底性和方枘圆凿之处，须知那些“不正确言论”除了虚构历史、歪曲现实，还会从这些地方寻找其“理论依据”。

如前所述，争论不足惧，关键是要给不同观点创造公平表达的机会，且这种机会需要有制度保障。令人惊讶的倒是，近些年来，涉企“不正确言论”畅行无阻，赚足流量，而谠言正论反而相当微弱。在此情形下，“营造清朗网络空间”就十分必要。2022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实下来，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这就需要强大的舆论力量为民营企业打榜站台，为支持民营企业健康的声音创造有利条件。在涉企言论问题上，也应坚持“四个意识”，警惕“两面人”。

总之，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离不开对民营企业的呵护。对民企呵护，并不意味着制造反向的所有制歧视。所有企业都必须依法经营。对某些民营企业存在的问题，自当依据法治原则治理，而不应动辄扣帽子、打棍子，必欲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斗倒批臭而后快。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处于灰溜溜状态，吃亏的是中国经济，受损的是亿万民众的福祉。45年的改革开放史一再证明，民营经济能够心无忧惧、一心谋发展之时，就是中国经济充满活力的时期。呵护民营企业，就从创造有利的舆论条件，去伪存真、激浊扬清，让民营企业真正放下心理包袱开始吧。▫

相关报道： 社论丨吃改革饭 走开放路

（本文为即将于2023年03月20日出版的《财新周刊》第11期社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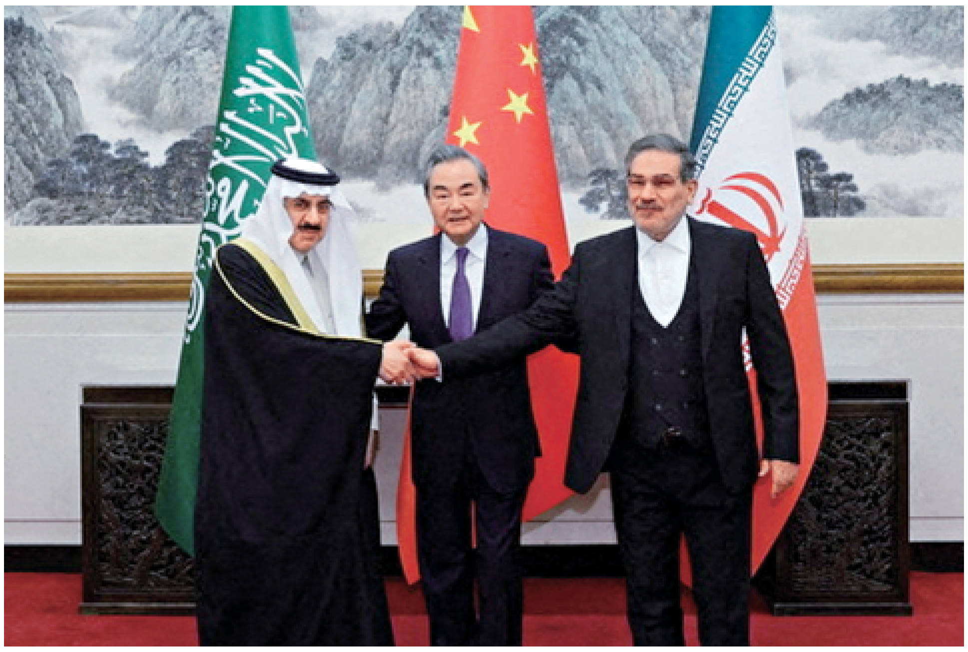
更多报道详见：【专题】2023全国两会报道

版面编辑：吴秋晗

最新财新周刊 | 沙特伊朗在北京破冰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3月20日第11期

中东两大宿敌走向和解背后，中国参与地区热点问题的积极主动姿态引人瞩目



202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主持沙特和伊朗对话闭幕式。沙特国务大臣兼国家安全顾问艾班（左）、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沙姆哈尼（右）出席。同日，沙伊达成北京协议，中沙伊三方签署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沙伊双方同意恢复外交关系。图：中国外交部官网

文丨财新周刊 王自励

经历了7年的全面断交和长达40余年的地缘政治争夺后，2023年3月10日，中东海湾地区的两大宿敌——沙特阿拉伯王国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终于握手言和，同意着手恢复两国自2016年初中断的外交关系。令外界瞩目和颇感讶异的是，传出这一震动中东乃至全球消息的地点，不在任何一个中东国家的首都，而是地理上与这片动荡土地相对遥远的中国首都——北京。

“这是对话的胜利、和平的胜利。”3月10日当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主持沙特和伊朗北京对话闭幕式后如此表示。王毅评价道，沙伊改善关系为实现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打开了道路，也为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国家间矛盾分歧树立了典范。“作为两国可以信赖的朋友，中方愿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

在事先未对外披露的情况下，3月6日至10日，沙特和伊朗的政府代表团在中方主持下，于北京进行了为期5天的秘密会谈，其间达成了沙伊启动复交的协议。

根据会后中国、沙特、伊朗三方发表的联合声明，沙伊双方同意在不超过两个月的时间内，重开驻在对方国家的使馆和代表机构，并安排互派大使。双方还承诺，激活两国在2001年4月17日签署的安全合作协议，以及在1998年5月27日签署的经济、贸易、投资、技术、科学、文化、体育和青年领域的合作协议。

沙特和伊朗还通过协议确认，将“尊重各国主权，不干涉别国内政”。

沙伊双方同意，应由两国外长举行后续会晤，以落实恢复建交的安排，并探讨加强双边关系的方法。

在曾任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和中国原驻沙特、原驻埃及大使吴思科看来，沙特和伊朗此次在北京宣布达成协议，“看似突然，实则是水到渠成”。他向财新指出，经过数十年的地区动荡和相互冲撞，沙特和伊朗都有缓和彼此关系、集中力量谋求自身发展的需求。再加上伊拉克、阿曼等地区国家此前已为沙伊恢复接触作出了长期的努力，中国在推动中东国家和谈方面也提出了许多建设性主张，并持之以恒地进行了劝和促谈的工作。吴思科认为，正是中国外交的久久为功以及多方形成的合力，促成了沙伊复交这一“令人惊喜的成果”。

在世界大部分地区仍困扰于俄乌冲突阴霾之际，沙特和伊朗这两个中东的主要竞争对手能暂时达成和解，无疑朝地区及全球的和平、稳定、繁荣迈出了积极的一大步。不过，若想真正扭转沙伊之间剑拔弩张的关系，让缓和的势头一直持续下去，沙特和伊朗仍需克服诸多挑战——包括也门冲突、伊朗核问题及两国在黎巴嫩、伊拉克等国的代理人活动等。沙伊双方能否弥合分歧和增进互信，仍待进一步观察。

此轮沙伊和解进程背后，中国扮演的角色尤为引人注目。在传统上主要由美国、俄罗斯主导的中东政治舞台，一直身居幕后、被视为“低调调停者”的中国，此次以更积极主动的斡旋姿态走到台前，成功促成了两个积怨已久的地区主要国家改善关系；亦展示出中国参与地区热点问题解决的积极性，以及日益提升的外交自信和国际说服力。

这一超乎绝大多数人预期的地缘政治突破或也预示着：一个联盟—对手关系时衡现实而不断变化，以及各国外交行动逐渐脱离霸权影响、更显独立自主的新中东，正在浮出水面。

沙伊交恶已久

同处波斯湾沿岸的沙特和伊朗，一个是逊尼派穆斯林的“老大哥”，一个则自称“什叶派共主”。两国的矛盾虽根深蒂固，却也并非生来死敌。

美苏冷战时期，沙特与巴列维王朝统治下的伊朗，都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抗衡苏联势力的盟友。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沙伊关系相对温和，并保持着较为良好的合作。两国都是1960年成立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创始成员。

双方关系的转折点发生在1979年。当时，由什叶派宗教领袖霍梅尼领导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巴列维国王的君主政权，在伊朗建立起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国。作为逊尼派大国的沙特担心伊朗向周边输出什叶派革命思想，沙伊关系开始趋于紧张。

1980年9月，与沙特同为逊尼派的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向伊朗发动了旨在夺取两伊争议性领土、持续了八年之久的两伊战争。沙特虽然未直接卷入冲突，却暗中向伊拉克萨达姆政权提供财政、后勤等方面的支持。

也是在惨烈的两伊战争正炙之时，伊朗在波斯湾地区的阿拉伯邻国们意识到：有必要组织起经济和军事力量，共同保持对敌对势力的优势。

1981年5月，以沙特为首，成员还包括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阿曼、巴林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下称“海合会”）应运而生。

围绕穆斯林朝觐问题，沙特和伊朗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曾经历过一次断交。

1987年7月，来自伊朗的朝觐者在位于沙特境内的伊斯兰教圣城麦加与沙特安全部队发生冲突，造成约402名朝圣者丧生，其中275人是伊朗公民。事件发生后，伊朗抗议者袭击并占领了位于德黑兰的沙特驻伊朗大使馆，并对科威特驻伊朗大使馆纵火，导致一名沙特外交官死亡。在双方冲突的不断升级下，沙特在1988年宣布与伊朗断绝外交关系，伊朗则对前往麦加的朝觐活动予以抵制。

直到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后，海合会国家开始反思与伊朗的关系；伊朗也在时任温和派总统拉夫桑贾尼的领导，和霍梅尼去世后接任伊朗最高领袖的哈梅内伊的支持下，转向更加务实的外交政策。随之沙特和伊朗1991年3月宣布恢复外交关系，开启和解进程。

1997年，以宽容、开明著称的政治家哈塔米当选伊朗总统，并对外宣称将致力于修复伊朗与海湾阿拉伯邻国的关系。同年年底，时任沙特王储的阿卜杜拉代表国王法赫德率团到访伊朗，出席了在德黑兰举行的伊斯兰合作组织首脑会议。

正是在哈塔米任内，沙伊两国于1998年达成了一项经济、贸易、投资、技术、科学、文化、体育和青年领域的合作协议。随后，1999年5月，哈塔米回访沙特，成为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首位到访沙特的伊朗总统。两国继而又在2001年签署了一项安全合作协议。

然而好景不长。2001年、2003年，美国相继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破坏了中东地区的力量平衡，令沙特和伊朗的矛盾再度上升。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覆灭，客观上为伊朗清除了东西两侧的宿敌。伊朗战略环境的改善及其崛起势头，则又引起沙特的警觉和忧虑。

当美国于2003年准备入侵伊拉克时，伊朗几乎在同月便开始进行铀浓缩活动。2005年当选的伊朗时任总统、被视为强硬派代表的内贾德更高调宣布，他将进一步推进伊朗的核计划，并在外交政策上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2009年，当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将从伊拉克撤军时，人们已经看到了一个完全有能力制造出核武器的伊朗。同时，在伊拉克战后重建的过程中，深受伊朗影响的伊拉克什叶派，成为伊拉克政府内的主导力量，令伊朗得以在伊拉克的安全部门和各派政治力量中建立起广泛的影响力。

相形之下，对21世纪头十年的阿拉伯世界而言，外部地缘环境不断恶化的同时，内部发展也屡遇颠簸。

2011年，被称作“阿拉伯之春”的群众抗议浪潮爆发后，沙特与伊朗之间的地区竞争呈加剧态势。

尽管沙特阿拉伯王国的政权，在这场地区性政治风暴中得以较为平稳地度过，还出兵协助了巴林这一海湾区域内的另一王权国家平息了国内的骚动，但随着美国从奥巴马政府时期开始从中东逐渐收缩力量，美国与伊朗围绕核问题推进缓和与谈判，感到自身利益日益遭到威胁的沙特，也开始愈发频繁地在中东域内的纠纷和冲突布局，并伸展自身力量，同伊朗陷入持续的明争暗斗。



当地时间2016年1月3日，伊朗德黑兰，民众在沙特驻伊朗使馆外示威，抗议沙特处决知名什叶派教士尼米尔。图：Atta Kenare/视觉中国

2016年新年伊始，沙特内政部宣布处决了47名犯有“恐怖主义”罪行的囚犯，其中包括知名的什叶派教士尼米尔。

消息一出，多名抗议者聚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的沙特驻伊朗使馆外示威，并向沙特使馆投掷石块和燃烧弹，打砸使馆门窗并纵火焚烧使馆部分楼体。

这一使馆遭袭事件，令本就紧张的沙伊对峙更加白热化。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当时表示，沙特处决尼米尔的决定将让其面临“神圣报复”。

几番互相指责之后，沙特外交部在2016年1月3日宣布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并驱逐了伊朗的外交人员。

代理人战争盛行

处死尼米尔之举，是逊尼派主导的沙特近年来第一次处决什叶派的宗教领袖。从某种程度上，此举也折射出当时沙特对于自身在地区地位的危机感。

自那之后，沙特和伊朗的长期“冷战”对峙，就一直主导中东的地缘秩序变化。

沙特和伊朗这中东两强之间不断扩大的裂痕，也让也门、叙利亚等地的战乱，染上了沙伊两国“代理人战争”的色彩。

在2011年巴林的什叶派民众掀起反政府抗议之后，同为海湾王权国家的沙特派出部队，帮助巴林王国政府平息了示威活动，并指责伊朗介入巴林局势煽动骚乱。

另一方面，在同样于2011年爆发并延烧至今的叙利亚内战中，以沙特为代表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却为叙利亚境内的反政府武装提供了资金、顾问、后勤、军事培训等方面的支持。伊朗则在军事和经济上，支持什叶派的叙利亚阿萨德政府。

在2011年席卷西亚北非的政治风暴中，阿拉伯半岛上惟一的非君主制国家也门，也陷于动荡。

三年后，受伊朗支持的什叶派胡塞武装夺取了也门首都萨那的控制权，迫使逊尼派的也门总统哈迪流亡沙特避难。为防止伊朗通过自己的南部邻国扩大势力，2015年3月，沙特领导海湾多国发起代号“果断风暴”的军事行动，正式介入也门内战，以打击势力渐盛的胡塞武装。

也门战局仍在延烧之际，2017年6月，沙特又主导了中东多国对另一海湾国家卡塔尔的“断交”和临时性的交通

封锁行动，以敲打与伊朗关系较为靠近的卡塔尔。

当时，沙特指责卡塔尔长期以来同情庇护区域内各国的反对派势力，还支持跨国性的宗教性政治组织"穆斯林兄弟会"介入他国内政。

2019年9月，受到美国与伊朗摩擦的波及，沙特境内的多处重要基础设施——包括机场、发电厂、海水淡化厂和油田、输油管道等，都遭到了邻国也门境内、受伊朗扶植的胡塞武装袭击。当时，袭击还一度造成沙特原油产量大减，全球原油市场随之剧烈震荡。这也使得本就剑拔弩张的沙伊关系，险些逼近武装冲突的边缘。

但似乎也正是这次沙特石油设施的遇袭，成为沙伊双方走向谈判桌的契机。

就在沙伊关系骤然紧绷的2019年10月，伊朗政府发言人阿里·拉比埃突然对外声称，伊朗政府"收到了来自沙特首都利雅得的、通过另一个国家领导人间接传递的信息"。

尽管这一消息随后遭到了沙特官方的否认，但沙特外交事务国务大臣朱拜尔当时亦在推特上表示："沙特的立场一直是寻求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几乎同时，时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拉里贾尼也在受访时表态称，德黑兰"欢迎与沙特阿拉伯进行任何谈判，以解决地区问题"。后来在沙伊对话中发挥了关键斡旋作用的伊拉克时任总理阿卜杜勒马赫迪，当时向媒体透露，巴格达正在努力促成德黑兰和利雅得之间的谈判。他还称："虽然发动一场战争很容易，但阻止一场战争却很难。"

宿敌走向和解

在地缘纷扰缠斗不休的中东地区，包括沙特和伊朗在内，近年来不少域内国家都在寻求从政治冲突和对立中摆脱出来，将精力更多地投入本国经济民生的发展。

在也门战场上，尽管交战各方在联合国等斡旋下达成的、冲突以来持续最久的停火协议，在2022年10月到期后未能得到进一步延长。

但据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在2023年1月下旬通报，当前也门的整体局势仍大体上保持稳定，前线的部署未出现任何重大升级或变化。自2015年起出兵介入也门战局的沙特，也已开始与受伊朗扶植的胡塞武装进行直接谈判，以寻求尽快结束冲突。

在叙利亚境内，随着伊朗和俄罗斯支持的阿萨德政府收回并控制着大部分领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也已基本告一段落。虽然当前叙利亚的政治谈判之路尚未启动，但在2023年2月初叙西北部遭遇强地震之际，沙特、阿联酋等曾在叙利亚内战初期支持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的阿拉伯邻国，也纷纷向阿萨德政府施以援手。以震后重建为契机，叙利亚在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外交孤立局面有望得到缓解。

2021年开年不久，在沙特境内举行的海合会首脑会议上，沙特等国宣布与同为海合会成员，但此前一直遭邻国经济封锁和孤立的卡塔尔达成和解，双方结束了持续三年半的外交对峙状态。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期间，沙特王储穆罕默德还身着印有卡塔尔国旗图案的围巾，亲自出席了开幕式，并与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坐在相邻的位置上一同观看开幕赛，尽显前嫌已释的宣传姿态。



当地时间2022年11月20日，卡塔尔多哈，世界杯开幕式招待会上的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左）、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中）和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图：Murat Kula/视觉中国

2022年4月底，沙特王储则在沙特海滨城市吉达接待了五年来首次访问沙特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使得因2018年沙特籍异见记者卡舒吉在伊斯坦布尔的沙特领馆内遭杀害后，长期陷入挫折的土沙关系，终于开启了改善的进程。

此外，在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促成下，以犹太人为主体的中东国家以色列，也在2020年相继与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建交。2022年8月，以色列又与此前关系紧张的土耳其全面恢复了外交关系。

这一波中东区域掀起的“缓和潮”中，沙特和伊朗恢复直接接触的过程，则推进得更加谨慎和低调。

对这两个中东主要产油国来说，常年的恶斗已消耗了无数人力、物力、财力，双方都有寻求缓和、休养生息的需求和动力。

自2017年开始总揽沙特内外大权的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正在国内推进多个雄心勃勃的现代化转型项目。

通过恢复与伊朗的关系，沙特希望能改善所处的周边安全环境，减少自身遭到美国—伊朗关系恶化及伊朗—以色列矛盾升级带来的附带伤害和风险。

此外，2019年9月沙特石油设施遭袭后，美国相对冷淡的反应也让沙特意识到，必须在外交上增强自主性，努力使安全和军事伙伴关系更加多元化，而非一味依赖美国。

对于在西方制裁压力下，经济民生愈发困顿和动荡的伊朗，缓和与阿拉伯邻国之间的矛盾，被视为抵抗美国及其盟友以色列造成的军事恫吓的有效方式。

与同为OPEC成员的沙特改善关系，也将推动沙伊两国在控制油价和通胀等方面展开充分合作。对内外处境都显严峻的伊朗来说，打破当前在地区和全球面临的外交孤立局面，更有助于进一步撬动更多经济上的利益。

早在2021年4月，沙特和伊朗就在伊拉克境内不动声色地展开了直接谈判。

在2021年8月的就职仪式上，刚当选为伊朗总统的莱希表示，伊朗新政府的外交重点是改善与地区国家的关系：“我向该地区所有国家，特别是邻国伸出友谊和兄弟情谊之手。”当时，这一声明被广泛认为是伊朗希望改善与沙特之间的关系。

此后的一年时间里，沙特和伊朗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共举行了五轮密集的会谈。到2022年下半年，双方距离达成恢复建交的协议已十分接近，还派出了技术官员组成的代表团研究重开大使馆的问题。与此同时，沙特和伊朗还在另一海湾国家阿曼的斡旋下，围绕如何结束也门危机展开了持续对话。

然而，自2021年底伊拉克选出新一届国民议会以来，由于不同政治派别分歧严重，伊拉克的新总统和新总理迟迟无法产生，伊拉克陷入了长达一年的政治僵局。德黑兰的政治新闻记者Saeed Azimi撰文指出，随后在2022年10月就任伊拉克新一任总理的苏达尼，对伊拉克在沙特与伊朗之间继续扮演调解人的角色兴趣不大，苏达尼本人也未能像他的前任——出身伊拉克情报部门的卡迪米那样，获得沙特方面的信任。

另一方面，2022年9月以来，因伊朗库尔德族的年轻女性马萨·阿米尼遭“宗教警察”逮捕后于看守所内身亡而掀起的抗议风暴，也在伊朗境内不断蔓延发酵，造成伊朗社会一度陷入不稳。

这期间，伊朗当局指责沙特利用其资助的波斯语卫星新闻频道“伊朗国际电视台”（Iran International），在伊朗境内煽动青年人参与反政府的抗议活动，尽管该媒体一直声称自己是独立运作。这一事态发展，也令沙特和伊朗之间好不容易有所进展的和解谈判，在最后关头又遭遇滞阻。

中国角色浮现

时间来到2023年。1月17日，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在瑞士小镇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表示，沙特和其他海湾国家决定专注于自身经济和发展，是“向伊朗和该地区其他国家发出的一个强烈信号：有一条超越传统争论和争端的道路，可以走向共同繁荣”。费萨尔当时还称：“我认为，我们越是能在地区建立合作意识、越是能一起工作，我们就越能不仅为我们的人民，而且为我们的周边和其他地区带来繁荣。”

在此不久前的2022年岁末，沙特刚在国内迎来了时隔六年再次踏上中东之旅，对沙特展开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习近平还与近20位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共同出席了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中阿峰会）、首届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中海峰会）。

当时，习近平在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的会晤中表示，中方把发展对沙特关系置于外交全局尤其是中东外交的优先方向，愿同沙方增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协调。穆罕默德则表示，沙方愿同中方就重大地区热点问题密切对话合作，为维护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实现地区共同安全作出贡献。

尽管在中沙双方的官方通报中，并未提及沙伊矛盾这一具体的“地区热点问题”，但据《华尔街日报》披露，在2022年末利雅得举行的峰会上，中方提出了海湾阿拉伯国家应与伊朗缓和关系的提议，并得到了海合会国家的支持。

随后在2023年初，沙特外长在达沃斯年会上对伊朗发出积极信号后，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伊朗随即派出了首席核谈判代表巴盖里（Ali Bagheri Kani）访问北京。该报援引不具名的海湾国家官员的说法称，巴盖里当时提出，希望中方能在伊朗与其他大国的核谈判中扮演更重要角色，并为伊朗解决国内的货币危机提供支持。作为交换，伊朗同意不对与沙特启动恢复外交关系的谈判设置任何前提条件。

2023年2月14日至16日，伊朗总统莱希踏上了其任职以来的首次访华之旅。当时，陪同莱希来华的不仅有新上任的伊朗央行行长，以及伊朗在经济、石油、外交、贸易、交通、城镇发展、农业等领域的六位内阁成员，伊朗首席核谈判代表巴盖里也在随行官员之列。

后来在3月间率团到北京，与沙方对话的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沙姆哈尼，则在沙伊达成协议后受访时表示，今年2月份莱希对中国的这次访问，“有助于为伊朗与沙特之间的谈判推进创造机会”。

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孙德刚向财新指出，在调和沙特和伊朗的矛盾方面，中国具有独特优势。中国与沙特和伊朗都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沙、中伊之间长期保持着良好的互利合作。中国还是沙特和伊朗的最大贸易伙伴国和主要原油买家，与两国的贸易依存度是其他国家难以取代的。

在孙德刚看来，自2021年起进行了数轮的沙伊政治对话，此次能在北京取得重大突破，凸显了中国的“独特政治地位和外交感染力、影响力、塑造力”。面对中东国家之间的矛盾，中国提出的新安全理念主张通过合作促进安全，通过对话解决冲突，“这也是西方国家以意识形态划分和‘选边站’的外交路径所无法比拟的”。

另据沙特外交部的声明介绍，此次北京会谈，是“响应习近平主席关于中国支持沙特和伊朗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的倡议”而举行的。

王毅也在会谈后介绍称，习近平主席“从一开始就对沙伊对话予以了明确支持”。孙德刚据此指出，从2022年末在沙特举行的“三环峰会”，到2023年2月伊朗总统莱希访华，再到此次沙伊北京会谈，“中国领导人的政治引领作用尤为关键”。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丁隆向财新指出，此次中国、沙特、伊朗三方在北京发布会谈成果的最大特点，就是三方联合声明的文本没有采用英文，而是采用了阿拉伯语、波斯语和中文，“这体现出三个国家的自主性”。

在丁隆看来，由沙特、伊朗两国达成的恢复外交关系的协议，最终是由中国、沙特、伊朗三方联合签署的声明发布，这不仅凸显了中方关键的斡旋地位，也体现了中方作为担保人的角色。“这说明，下一步沙伊之间还有什么分歧，或是后续谈判出现什么问题，中方还是会继续参与斡旋。”

另一方面，此次北京会谈的成果文件仍是原则性、框架性的，表明沙伊之间的具体分歧尚未完全得到解决。丁隆认为，在此情况下，中方愿意作为联合声明的签署方之一，为沙伊谈判提供保障作用，体现了一种大国担当。“也就是说，不是把双方请到北京来谈判、签个协议就结束了。沙伊之间的矛盾非常复杂，未来如果有一些反复也

很正常。”

此前，在巴以和平进程、伊核谈判、叙利亚问题等中东热点问题上，中国均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政治支持，提出了诸多富有建设性的主张。但相比美国、俄罗斯等在中东长期博弈的传统大国，中方在中东地区矛盾上的调停角色一直显得较为低调。

此次中国为何更积极主动地介入调解沙伊之间的矛盾？接受财新采访的专家都提到，这一方面是因为，中东是中国的重要能源通道所在地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支点地带，帮助中东实现和平与稳定符合中方利益；另一方面，中东国家也正在日益将中国当作一个世界级大国看待，对中国扮演更重要的外交角色抱有期待。

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和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都将外交重心放在欧洲。近年来，美俄等传统域外大国对于中东事务的关注度正逐渐减弱，为中东提供安全公共产品的能力和意愿也在下降。客观上，这也为中国在中东事务中进一步发挥影响力提供了空间。

但丁隆强调：“中国绝不是要去填补美国留下的所谓空白，因为中美在中东的运作方式完全不同。”中国与中东的所有国家都保持着友好关系，中国同中东国家之间没有历史旧账，容易得到中东各国的信任。在经贸交往上，中国也一直保持着中东国家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中国在中东的作用的确在增加，但这种作用是有利于地区稳定与和平的，因为中国不会搞‘选边站’”。

曾任中国中东问题特使、拥有丰富外交经验的吴思科观察到，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近年来中东国家与中国发展关系的意愿越来越强烈，中国与中东两个古老文明之间在实现经济复兴、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方面，有着共同的诉求。

他指出，美国仍在中东保有强大的军事存在和力量投入，在这一方面中国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取代美国。但另一方面，中东国家将中国看成一种“和平的力量，稳定的力量，可信赖的力量”。“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力量增强，中东各国的日子会更好过一些，因为它们在大国之间的行动将更加从容，不必受制于某一方。”

沙特智库费萨尔国王伊斯兰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约瑟夫·艾伯特·克奇安（Joseph Albert Kéchichian）则对财新表示，中国若想在中东地区塑造自身角色，确保长期稳定的存在，就必须“全面参与”中东事务，投资于“以沙特为首的关键地区国家”。

在他看来，作为阿拉伯世界的领头羊和全球最大的产油国，未来沙特必将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愈发重要的作用，“世界各国都会接受这一事实”。

在中国的中东角色日益凸显的情况下，与沙特关系亲密的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角色又将如何演变？克奇安认为，美方将致力于进一步加强与该地区的联系，其外交手段会变得更加灵活。

地区辐射影响

观察者普遍认为，沙特和伊朗的和解协议若能得到充分落实，将有利于巩固也门内战中达成的脆弱停火；提振黎巴嫩遭受重创的经济；推动长期受沙伊代理人战争影响的伊拉克、叙利亚等国实现稳定和发展。

尽管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沙特和伊朗长期积累的矛盾得到了完全解决，但协议本身也将有助于遏阻沙伊间的“间接战”“冷战”升级为“热战”的概率。

美国智库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所（AGSIW）的伊朗问题专家阿尔福内赫（Ali Alfoneh）向财新指出，中国、沙特、伊朗三方发布的联合声明特意提及“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抽象原则，这可能显示出，沙伊双方愿意在谈判达成的条件下，限制它们在地区的代理人活动。

但他担忧，这份和解协议得到维护的前景仍然脆弱。包括沙伊双方在地区扶植的代理人在内，“每一个在这份协议面前利益恐受损的相关方，都有强烈的动机破坏它”。

此外，长期敌视伊朗的以色列，以及欲拉拢沙特、以色列等国共同对抗伊朗的美国，都可能成为沙特同伊朗修复关系进程中的干扰因素。

阿尔福内赫认为：“最后的问题将归结于：德黑兰和利雅得是否有足够的政治意愿，抵制以色列可能的挑衅，并约束自己的代理人和宣传机构，以避免意外事件的发生。”

综合《华尔街日报》等国际和中东媒体披露的沙伊谈判内幕，为了达成恢复建交的协议，沙特承诺“不向寻求破坏伊朗稳定的媒体提供资金”“不资助被伊朗认定为恐怖分子的组织”。

作为回报，伊朗则承诺“确保其盟友组织不从伊拉克等国境内，发动侵犯沙特领土的袭击”等。此外，据称两国都表示，愿意“尽一切可能推动解决地区冲突，特别是也门境内的冲突”。

在也门当地，受到沙特支持、由逊尼派人士掌权并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以及主要盘踞于也门北部各省、得到伊朗支持的反政府什叶派武装势力胡塞武装，均对沙伊3月10日达成的和解协议表达了措辞谨慎的欢迎态

度。

此前，在沙特领导的海湾联军于也门境内节节失利、内部分歧凸显的情势下，沙特最亲近的盟友阿联酋已退出在也门的军事行动。近年来，沙特也开始与被视为伊朗"代理人"的胡塞武装举行幕后谈判，以期摆脱这场2014年发酵至今、酿成也门国内巨大人道主义灾难的冲突泥潭。

外界期待，沙伊改善关系将能推动沙特与胡塞武装尽快谈出成果，从而为也门内战的主要交战方——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之间开启真正意义上的和谈、实现也门国内的政治和解铺平道路。

就在沙特和伊朗着手修复关系之际，美国正试图促成沙特与以色列达成一项双边关系正常化的协议。许多观察者认为，沙特和伊朗关系缓和，与沙特同以色列关系的靠近，并不一定会彼此冲突。毕竟，已同以色列宣布建交的阿联酋，也在近年与伊朗达成和解。

不过，在巴勒斯坦实现建国之前，作为逊尼派穆斯林精神高地和伊斯兰教两大圣地守护者的沙特，若要真的迈出"与以色列建交"的一步，其面临的政治风险和代价也会相对高昂。



当地时间2016年1月20日，沙特利雅得，沙特国王萨勒曼出席中沙延布炼厂投产启动仪式。图：Fayez Nureldine/视觉中国

在沙伊宣布和解后，其对中东内部矛盾缓和的带动效应已经开始显现。3月10日沙伊复交的消息传出后，曾在2016年跟随沙特对伊朗断交的马尔代夫，已第一时间宣布将恢复与伊朗的外交关系。

丁隆认为，在此前沙特的另一盟友阿联酋已在2022年9月与伊朗关系"解冻"的情况下，接下来巴林、苏丹等其他在2016年追随沙特对伊朗断交的国家，也有望跟进恢复同伊朗的外交关系。在此基础上，伊朗同整个海湾阿拉伯世界关系的整体改善，也将进一步提上日程。

孙德刚指出，以沙特和伊朗复交为契机，进一步推动伊朗同海湾阿拉伯国家整体关系的改善，正是中国在中东外交的下一步着力方向。

但他也提醒说，中东向来是全球冲突最集中的地区之一，解决地区矛盾不可能一蹴而就。在他看来，中国介入中东冲突事务应"走一步看一步"，慢慢积累和总结经验。同时，中国也要积极利用联合国机制，并与其他的大国展开沟通协作，把中东冲突解决作为开展大国协调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部分。

吴思科回忆称，此前在担任中东问题特使时，他经常对中东各国讲这样一句话："邻居是不能选择的，但是我们可以选择邻居之间的相处之道。"

他表示，中国向来以睦邻之道在中东国家之间劝和促谈，中方也一贯支持中东国家坚持战略自主，摆脱外部干涉，把中东的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我们不可能越俎代庖，但可以发挥积极促进作用。未来，中国也将在中东继续贡献这样的建设性力量。"

版面编辑：吴秋晗

最新财新周刊 | 为死刑犯做“法援”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3月20日第11期

最高法院复核是死刑案件确保公正的最后关卡。为保障死刑被告人最后的辩护权，除了律师主动援助， 2022年，国家也建立死刑复核法律援助制度



为防范冤假错案，死刑案件在二审终审制之上规定了复核制度。改革开放初期，部分死刑案件的复核权曾下放给高级法院行使，直至2007年，死刑复核权全面收归最高法院。

文丨财新周刊 覃建行，谭海燕（实习）

2月8日，北京君树律师事务所（下称“君树所”）主任谢通祥收到了最高法院一份裁定书和送达回证：最高法院于2022年9月22日作出裁定，因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核准安徽省高级法院维持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王想想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裁定，将案件发回安徽省高院重审。

王想想是安徽宿州人，生于1989年8月，检方指控他在2015年9月7日驾车高速冲向一处深水塘，试图与车上的两名高利贷债主同归于尽，结果导致两债主溺亡，而他顺利逃生，涉嫌犯故意杀人罪，一审二审均被判处死刑后，报请最高法院核准。

谢通祥是该案死刑复核阶段的辩护律师之一。他说，从2019年1月向最高法院提交委托手续算起，到2023年2月收到结果，前后四年之久。2月份他与安徽省高院和看守所联系时得知，王想想已经被去除脚镣。对已经历过死刑终审的王想想而言，这意味着身份的转变——从死刑犯重新变为犯罪嫌疑人。

“一审如果被告人判了死刑，就得把脚镣给戴上，只要是没有撤销，就得始终戴着，大多数被告人都摘不下来，直到被执行死刑。”谢通祥说。

死刑直接剥夺犯罪人的生命，人死不能复生，是最为严厉的刑罚。中国实行二审终审制，为防范冤假错案、保障人权，死刑案件在二审终审制之上又规定了复核制度。改革开放之初，部分死刑案件的复核权曾下放给高级法院行使，直至2007年，死刑复核权全面收归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初期，律师能否介入死刑复核案件并不明确。直至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增加规定，最高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应当讯问被告人，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这为律师参与死刑复核案件提供了制度依据，一些律师开始以委托代理方式免费办案，像王想想案这样为死刑犯提供法律公益服务已不再鲜见。

近年来，保障死刑犯的辩护权问题愈发受到关注。2016年全国“两会”上，时任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在工作报告中提到，要健全死刑复核法律援助制度。这项制度在2021年《法律援助法》制定时得以引入：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属于申请法律援助的死刑复核案件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担任辩护人。

《法律援助法》于2022年元旦生效。此后，应被告人申请，一批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辩护律师开始参与死刑复核案件，由政府财政提供办案经费。死刑复核案件的法律援助，至今已全面展开一年有余。

对死刑复核而言，无论是委托代理的公益服务，抑或国家法律援助，都是在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最高法院副院长李勇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辩护律师有效参与死刑复核程序，有助于最高法院在死刑复核阶段准确认定案件事实，牢牢把住事实证据关，确保案件事实认定“零差错”，有效防范冤错案件。

平衡控辩、找出疑点

王想想案发生在安徽省宿州市马鞍山现代产业园区。据安徽省高院二审查明，2014年初至2015年9月，王想想因经营混凝土搅拌站，多次向胡某、张某某等人高利借巨额钱款。因未如期归还，自2014年10月起，胡某多次向王想想索要欠款及违约金，并提出让王想想转让公司91%股权给他，同时安排一人担任王想想的司机监视其行踪，致王想想心生怨恨。

法院称，2015年9月7日晚，王想想驾驶胡某的白色保时捷越野车，从搅拌站将胡、张二人送回市区，行驶至现代产业园区汴南村附近时，王想想驾车从洪河路向北转到一田间小路上驶向自己曾游泳的深水塘，并加速至每小时约120至125公里的速度冲向水塘。车落水后，王想想从开启的驾驶位车窗钻出并游上岸，胡、张二人溺水死亡。

安徽省高院认为，王想想构成故意杀人，其因怨恨胡某，不顾及同车张某某生死，犯罪情节极其恶劣，后果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依法应严惩。2018年7月，该院作出终审裁定，维持宿州市中级法院对王想想的重审一审死刑判决。此前，安徽省高院曾以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撤销宿州中院的第一次死刑判决，将案件发回重审。

自2007年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后，中国立法机关从2011年开始，又通过多个《刑法》修正案，大幅削减了死刑罪名。来自实务界的数据和经验表明，相比2007年之前，如今中国每年判处死刑的案件已大幅下降，随着办案质量提高，在复核阶段核准死刑的概率要远大于不核准。

君树所是少有的以死刑复核业务为主的律所。作为创办人之一的谢通祥谈及早年从业经历，并不避讳当初免费办理死刑复核案件是为了提高名气，以便吸引案源，如今他以擅长死刑复核案件为人所知，已无案源压力。他说，继续以律所名义援助此类案件，更多是实践法律公平正义和最大限度落实被告人的辩护权。

2018年秋天，王想想的母亲吴素伟辗转找到谢通祥，她认为该案有诸多疑点未弄清，如果她儿子真有罪应按法律来惩罚，反之则希望能得到一个公正的说法。向法律寻求公正的还有被害人胡某、张某某的亲属，亲人离去让他们身心受创，他们对王想想不承认警方查证的事实感到愤慨，在2018年终审前，两个家庭都出具了不予谅解书，请求法院判处王想想死刑。

很多死刑案件伴随争议。对刑辩律师而言，为"坏人"辩护不是障碍，因为每个人都有权获得辩护，检方为公共利益和被害人发声，对应也需要律师平衡。但谢通祥告诉财新，进入死刑复核阶段的大部分案件，实体和程序辩护空间极小，在决定援助之前他会按以下标准筛选：一是被告人是否家庭困难，二是案件是否有重大疑点。多名法律援助律师也反复提及这两条标准，前者多是因被告人在此前的诉讼程序中已经耗尽家底，后者在律师们看来是《刑法》对罪责刑相一致的要求，在证据无法达到确实充分、事实有疑点的情况下，应慎重用死刑。

在谢通祥看来，王想想案符合上述标准，特别是事实有疑，达不到证据确实充分的定罪量刑标准。"当时第一想到的觉得可能速度不对。"他有多年驾龄，自称熟悉涉事车型，认为涉事路段不足以开到每小时120公里的车速。

再就是，法院查明两名被害人被发现时尸体浮在水面，沉塘车辆被发现时"前后四个车门均处于关闭状态，且只有左前侧车门玻璃处于半开状态"。王想想曾经供述，车辆入水后没有马上下沉，而是车头朝下，车尾向上翘。他听到胡某对张某某说后备厢有水袖，他从车里出来游上岸时，看见胡某戴着水袖从车落水位置往南游，当时车已沉入水塘看不见。在另一份供述中，王想想提到看到胡某、张某某都游了出来，但未交代张某某去向。谢通祥认为，车辆高速冲入数米深的水塘后，车内的人很难顶着水压从里面打开车门，而三人身上又没有伤痕。所以他认为两名被害人溺亡的经过并未完全查清，存在重大疑点。

另外，王想想自原一审第一次开庭就推翻此前有罪供述，称没有杀人故意，其在水塘边开车时看见一只黄鼠狼，错把油门当刹车，致使车辆落入水塘。第一次上诉时，王想想甚至不再承认是意外驾车落水，而是称两人被害时他在另一辆车上，是胡某的朋友将车开入水中，而且胡某的朋友以家人安全威胁要求他承认开车入水，他认为交通事故只会判几年刑，他还称自己不会游泳。判决书显示，这些翻供内容因与本人此前供述矛盾或缺乏证据，未被法院采信。

决定援助后，谢通祥与另一名律师谢修志会见王想想三次。2019年11月，二人还去案发的深水塘勘察，由谢通祥解说，谢修志负责录像，之后刻录光盘提交给最高法院合议庭法官。法官看完录像后，也去了现场勘察并且当面讯问了被告人。

谢通祥记得，他第一次会见曾问王想想是否还认罪，对方回不认，又问在侦查阶段为何要认？王想想称其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有人传信说其母病危，认了能见最后一面。这一说法在此前的判决、裁定中亦有提及，吴素伟作证称，她当时未生病，有警察去她家对其拍照录像，但办案机关出具说明对此予以否认，法院也未认定。据判决书等材料，案发当晚王想想并未被采取强制措施，警方调查后发现现场痕迹等与王想想供述不同，且王与二死者有债务关系，遂立案侦查并将其传唤至派出所讯问，之后将其安排在一宾馆内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再往后才是刑拘、批捕。

复核阶段，谢通祥等向最高法院再次提出，该案不符合死刑案件证据标准，除本人供述，无其他证据证明王想想有杀人行为；王想想父母健在，家中有一儿一女未成年，不可能因债务问题与人同归于尽，原审法院认定杀人动机不合理。在提交给最高法院的辩护意见中，谢通祥等提出，"依据现有证据，无法得出王想想具有杀人动机及实

施了杀人行为的惟一结论"，恳请最高法院本着少杀慎杀的原则对本案不核准死刑。

2023年2月，收到最高法院不核准王想想死刑的裁定后，谢通祥注意到，这个结果是由最高法院审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决定的。这是他所见第一起有此表述的案件，此前的死刑复核案件裁定，对结论主体的陈述多是最高法院"刑事审判专业委员会"或"本院认为"。审委会是法院内部对审判工作实行集体领导的组织形式，他认为，裁定书提及审委会全体会议代表了一种集体决策，和对死刑案件的审慎立场。

谢通祥告诉财新，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判处一个人死刑，必须达到《刑法》所要求的标准，防止出现错杀。王想想案疑点颇多、真相不明，公检法要负责查证案件事实，而律师负责找出疑点，保障被告人获得公平的辩护权利。目前该案有待安徽省高院重审开庭。

量刑是否适当

除核心事实确有疑点，在另一些案件中，被告人对参与杀人供认不讳，认罪但不认罚，对其判处死刑是否适当就成为死刑复核辩护的重点。2021年3月，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下称"尚权所"）联合中国政法大学法律援助研究院发起"死刑复核案件法律援助公益项目"，由前者提供律师为被告人免费代理，后者为律师提供办案经费补贴。到目前为止，该项目中已有一起不予核准死刑的案例。

这是一起发生在广东省揭阳市的陈年旧案。1998年6月27日晚，时年25岁的李美林与同伴余祥国经过密谋，携带西瓜刀、割纸刀伺机抢劫，二人行至揭阳市揭西县棉湖镇一栋别墅门口，发现外围的铁门和大厅门未关，有一男性在厕所洗澡，二人进入别墅后持刀威胁，因该男子挣扎反抗，李美林与余祥国一起将其砍伤，该男子倒地后身亡，案发后李、余二人潜逃。后经鉴定，被害人有20余处伤口，伤口应由单刃锐器（如现场提取的割纸刀）及便于挥动的锐器（如现场提取的西瓜刀）两种以上造成。

2019年5月，揭阳市警方通过全国DNA数据库比对，发现李美林已返回湖南岳阳老家，在属地警方配合下将其抓获，同案的余祥国依旧未归案。2020年4月，揭阳市中级法院一审以抢劫罪判处李美林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该院认为，李美林伙同他人入户抢劫，持西瓜刀、割纸刀砍、割被害人，致其当场死亡，手段极其残忍，后果特别严重，应依法严惩；他直接参与抢劫杀人，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应按照其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

李美林不服上诉后，广东省高级法院于2020年12月18日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之后，李美林的二审辩护律师丁一元决定为该案提供援助，在死刑复核阶段免费代理。此前的辩护中他认为，原判称李美林将责任推卸给同案人的说法没有证据支撑，在该案的共同犯罪中李美林应是从犯，且同案犯未归案，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但这些辩护意见未被采纳。

丁一元介绍，2021年上半年，他在一个聊天群组看到尚权所发起的公益项目，于是联系尚权所希望能加强复核阶段的辩护力量。后来李美林案纳入项目，被安排给该所张宇鹏律师办理。

张宇鹏告诉财新，入选的前提是通过律所的讨论会，确认案件还有辩护的空间和价值，李美林案符合要求。他认为，从供述来看，李美林在案件中的地位明显是小于另外一人的，而另一人是在逃状态，这种情况下，至少从具体的司法要求来看，不应该判处李美林死刑立即执行。

最高法院2016年发布的《关于审理抢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规定，共同抢劫致一人死亡的，依法应当判处死刑的，除犯罪手段特别残忍、情节及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一般只对共同抢劫犯罪中作用最突出、罪行最严重的那名主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有同案犯在逃的，应当根据现有证据尽量分清在押犯与在逃犯的罪责，对在押犯应按其罪责处刑；罪责确实难以分清，或者不排除在押犯的罪责可能轻于在逃犯的，对在押犯适用刑罚应当留有余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要格外慎重。

在张宇鹏看来，李美林案复核阶段的所有辩护工作思路都是围绕抢劫罪的《指导意见》，研究对李美林的量刑是否适当，是否应判处死刑。为此，需要通过阅卷寻找证据，并在会见中向李美林本人求证，综合判断他的供述是否可靠。当时新冠疫情管控尚未放开，会见通过视频进行。

参与会见的律师徐翰清介绍，原判认为李美林供述不尽不实，是因为他的供述中只提到了西瓜刀，但现场还发现了一把割纸刀，这导致法院认定他未如实供述，主观恶性大。在会见中律师着重问了割纸刀来源、位置等，李美林对此还是表示不知情。整体看，无法排除那把刀是同案人带来的可能，而这关系到判断谁该为此负主要责任。徐翰清说，有的案子二审判死刑后，被告人对案件不抱什么指望，希望程序快速推进，不愿再受煎熬，而李美林表现出的求生欲十分强，在能回答的问题上甚至结合动作予以说明。

2021年7月，尚权所的律师们形成辩护意见提交给了最高法院，其主要思路是沿着《指导意见》陈述李美林不应被认定为"作用最突出、罪责最严重的主犯"，现有其他证据均不能作为区分二人在实行阶段罪责大小的依据。例如，现场提取的西瓜刀和割纸刀均未检测出任何有效STR分型，无法判断实际使用者是谁；此外李美林到案后供述稳定，且与其他证据印证，律师们认为可信度高。

该案二审中，辩护律师提出李美林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比同案人小，属从犯。广东省高院回应称："经查仅有李美林一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不予采纳。"进入死刑复核阶段，律师们进一步提出，基于无罪推定的大前

提，应当由公诉机关承担准确区分该案两嫌犯罪责大小的举证义务，并排除审判机关、辩方的合理怀疑，公诉机关如不能使李美林定罪量刑事实的相关证据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则应当由公诉机关承担举证不能的诉讼后果。死刑复核辩护意见认为，由于同案犯在逃等情况，不能排除李美林罪责轻于在逃犯的可能，根据《指导意见》应对其适用留有余地的刑罚，以待未来查明的可能性。

"一般死刑复核案件的结果会在年底出，我们当时5月份接的，2021年底还没出结果。"张宇鹏说，律所同期办理的死刑复核案件有的已经收到核准死刑的消息，这时他们意识到李美林案可能有转机。2022年1月，李美林的家属反映，已收到最高法院的刑事裁定书。最高法院认为，一审判决、二审裁定认定的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不核准死刑，将其发回重审。2023年1月，李美林案在揭阳中院重审开庭，张宇鹏、丁一元继续为其做罪轻辩护，目前尚未宣判。

常规化诉讼的挑战

除律师群体自行发起的委托代理公益服务，中国已经建立起死刑复核阶段的法律援助制度。

法律援助，是为经济困难公民和符合法定条件的其他当事人无偿提供法律咨询、代理、刑事辩护等法律服务的制度。中国自1994年开始探索法援制度，并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律师法》修改时明确了其法律地位。2003年国务院颁布《法律援助条例》，规定了该制度的基本框架内容，至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又明确死刑复核阶段法援律师参与的法律地位。

中国政法大学国家法律援助研究院院长吴宏耀告诉财新，2012年《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死刑复核案件可以委托律师，但没有规定律师来源，这就导致死刑复核案件中的委托辩护，有钱的当事人可以请律师，没有钱的请不起律师，造成一种程序上的不公正；虽然有以委托代理方式进行的公益服务，但机会很少，无法覆盖所有死刑案件，法学界、实务界一直在呼吁建立死刑复核法律援助制度。

2021年8月，立法机关表决通过《法律援助法》，其第25条规定，没有委托辩护人的，申请法律援助的死刑复核案件被告人，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担任辩护人。该法于2022年1月1日施行。同日，最高法院、司法部《关于为死刑复核案件被告人依法提供法律援助的规定（试行）》（下称《死刑复核法援规定》）生效。至此，死刑复核案件被告人依申请提供法援辩护的制度正式确立。

吴宏耀告诉财新，中国对死刑的总体态度是"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在短期内不可能废除死刑的背景下，死刑复核法律援助通过保障程序公正，来控制死刑的适用。他说，实体责任和程序权利并行不悖，一个人即使有可能判处死刑的严重犯罪行为，但他依然享有公正程序的保护，剥夺其生命必须尊重法律赋予的公正审判权，这会帮助减少不必要的死刑案件。同时，也是在通过法律制度引导公众对死刑的认知。

目前，负责指派死刑复核案件辩护律师的是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该中心建立了律师库，入库律师由律师行业组织和管理部门等推荐报名，谢通祥、张宇鹏等都报名了。一位要求匿名的入库律师介绍，与个人援助不同，指派律师由政府财政提供经费，包括差旅费以及适当的补贴。为保障办案质量，司法部法援中心对办案时限、工作流程有明确规定，"每一步的工作记录，还有辩护意见都要留痕"。在他看来，死刑复核案件经过两级法院的审理，大多数案件在实体和程序上不会有明显问题，但对政府指派援助律师这个动作而言，本身就是积极维护当事人辩护权利的重要表现，通过辩护律师积极履行职责，找到可从轻之处，或许就能留人一命。

这位律师被指派了一起带有悲剧色彩的案件：一名工人与工头发生矛盾，一次酒后，工头把工人按在墙上教训了一顿，事后工人气不过把工头砸死了，工人因故意杀人罪被判死刑。他说，在被害人也有过错情况下，一二审如果被告人通过赔偿获得谅解，是有机会判死缓的，但这名工人文化水平低，家庭也十分困难，一审到死刑复核都是法援律师。这种情况下，虽然不现实，但为了能留人一命，他曾一度考虑过是否要垫付赔偿费用。他对财新说，办理确属穷凶极恶、罪不可赦的杀人案件不会有太大的心理压力，但这种普通劳动者因日常矛盾引发的死刑案件，则总希望能有机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救人一命。

另一名在高校任教的兼职律师告诉财新，她在办理死刑复核指派辩护案件时也遇到类似问题。这起案件基本事实清晰，但辩护人的职责要求她找出可能"保命"的情节。案件中被告人是共同犯罪中最后归案的，曾潜逃19年，警方传话后他选择投案自首，因故意杀人罪被判死刑。这名律师在会见时发现，被告人求生欲很强，希望律师能帮忙通知家属对被害人进行赔偿，但其家属怀疑赔偿后能否保命，不愿出钱，作为律师颇为为难，她无法给出确切的承诺，因为具体裁量权在最高法院。

对律师而言，死刑复核案件的辩护与前期诉讼流程类似，包括阅卷、会见当事人、提交辩护意见。较为显著的区别是《刑事诉讼法》未规定死刑复核案件必须开庭审理，而是笼统规定"听取辩护律师意见"，在此基础上由最高法院作出裁定。财新获悉，死刑复核律师们在这些环节中时常遇到堵点，一些普遍性问题在这一特殊阶段暴露了出来，即便是指派辩护的律师，亦有受困于此的经历。

查询案件信息是开启工作的第一步，但很多死刑复核律师一开始就被卡住了。他们很难知晓案子到了最高法院哪个刑事审判庭，只能根据公开的最高法院五个刑庭分管区域推测，挨个拨打办公电话查询。在众多律师讲述中，最高法院刑庭办公电话有效拨通的概率非常低。2023年3月，尚权所发布了《死刑复核案件法援辩护公益项目阶段性工作报告》，提到了死刑复核程序存在的七大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排在第一位的便是案件查询问题，其举例说："曾有一个案子，律师每周一挨个打五个刑庭内勤电话问，查了三个月才查到。"

克服各种沟通难题，最终成效体现在最高法院的死刑复核裁定书上。但多名律师告诉财新，很多裁定书上并不会记载律师姓名、机构、辩护意见以及最高法院对该意见的评述，只有“听取了辩护律师意见”的简单陈述，无法评估辩护意见对复核结果的具体影响。《死刑复核法援规定》要求“死刑复核案件裁判文书应当写明辩护律师姓名及所属律师事务所，并表述辩护律师的辩护意见”，但一些死刑复核法援案件的裁定书并未达到这一要求。

吴宏耀说，委托辩护律师与法援律师的辩护权保障应当是平等的，随着死刑复核法律援助制度的全面推行，委托代理的公益服务需求会下降，但律师参与死刑复核案件将会逐步成为一种常规化的诉讼活动。他说：“最高法院应当就律师参与死刑复核案件提供一种全流程的辩护权保障，接受案件材料到最后诉讼文书送达，中间的会见、阅卷，还有申请重新鉴定，重新申请调查取证，应该有一个完整的辩护权保障。”

版面编辑：吴秋晗

最新财新周刊｜拆解经济复苏动能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3月20日第11期

近期中国经济复苏更多由政策和防疫措施调整后的积压需求释放带动，内生动能仍显不足，后续复苏斜率或放缓



2023年3月13日，贵州遵义，工人在汇川区一家整车生产企业车间内安装汽车发动机。图：瞿宏伦/中新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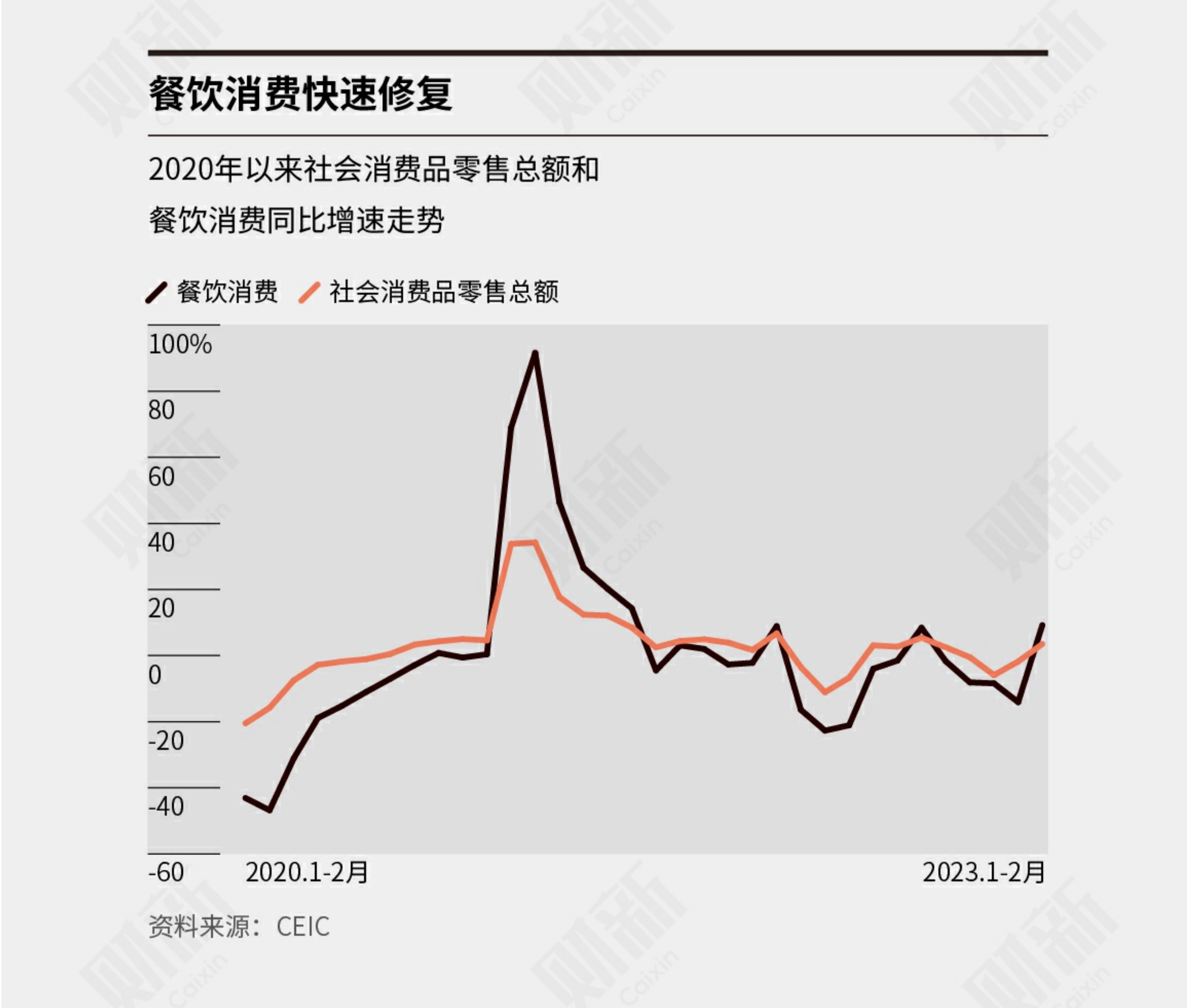
文｜财新周刊 于海荣

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后，中国经济复苏进程如何？2023年首份经济增长成绩单，给出了答案。

国家统计局和海关总署近日公布的经济增长相关数据中，除了进口同比增速低于前值，其余数据均较2022年末明显改善，出口、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表现均好于预期。

“生产需求明显改善，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市场预期加快好转。”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付凌晖表示，随着疫情防控较快平稳转段，稳经济政策的效果持续显现，经济运行整体呈现企稳回升的态势。

不过，拆解细项数据不难发现，不同部门和领域的回升幅度并不相同。生产端，得益于被抑制的需求释放和防疫限制取消，前期受疫情影响严重的服务业反弹幅度明显大于工业部门。与此相对应，需求端，消费尤其是以餐饮为代表的接触型消费快速修复，出行相关的商品消费修复也较为明显；基建投资和制造业投资表现稳健，房地产投资在前期政策持续宽松的支持下，降幅大幅收窄；出口虽然在发达国家经济韧性仍存的支撑下表现好于预期，但同比继续下降。



市场普遍认为，目前中国经济的复苏，主要是由前期出台的稳增长政策和防疫措施调整后消费场景修复推动的，经济内生动力仍然偏弱，并未出现防疫政策调整之初市场所预期的强复苏。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钟正生认为，1—2月中国经济较快复苏，除了地方推进重大项目施工、春节返乡人员增加带动消费、房企融资政策逐步落地，也和疫情期间被压制的需求短期释放有关。当前中国经济复苏基础尚未牢固，政策有必要继续着力于改善预期。

多家机构观测高频数据发现，3月以来此前快速改善的房地产销售、耗煤量等都出现放缓迹象，虽然经济仍然处于复苏阶段，在低基数作用下，同比增速或继续改善，但环比修复速度或将放缓。



新当选的国务院总理李强3月13日在首次记者会上表示，世界经济形势总体不容乐观，不稳定、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比较多，如何稳增长对世界各国都是一个考验。目前中国经济总量超过120万亿元，而且新的挑战也不少，在这种高基数上要达到5%左右的增长目标，恐怕也不是容易的事，需要倍加努力。

他特别强调，"两个毫不动摇"是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是长久之策，过去没有变，以后更不会变。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会越来越好，发展空间会越来越大，将在新起点上大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平等对待各类所有制企业，依法保护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促进各类经营主体公平竞争，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并希望民营企业家大力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坚定信心再出发。

市场期待，新一届政府正式履职后，在深化改革开放中不断增强发展的动力和活力，释放出更多"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的信号，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

复苏主动能：消费和地产

2023年开年，在防疫政策调整后人员活动半径扩大和此前出台的稳增长政策持续显效的推动下，中国经济开启了疫后回归常态化的道路，主要经济增长数据普遍回升。

各项数据中，最超出预期的是固定资产投资。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1—2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5%，增速较2022年加快0.4个百分点。而在此前财新对14家国内外机构的调查中，经济学家对这一数据的预测均值为4.2%，预测区间为2%—7%，只有三家机构认为将高于前值。也就是说2023年1—2月投资走势与市场预期相反，不降反升。

分三大投资看，增长最快的是基建投资，2023年1—2月同比增长9%，增速略低于2022年全年0.4个百分点。中金公司宏观研报称，基建投资在资金和项目端均受到支撑：一是资金端方面，前两个月新增贷款显著同比多增，投向的重点便是2022年开发性政策性资本金工具的配套贷款；二是实物投资方面，随着疫后经济形势逐步明朗以及前期新开工项目进入施工阶段，春节后第二周开始，水泥、螺纹钢等实物需求量有明显回暖，主要拉动力或来自基建。

与2022年类似，2023年财政继续靠前发力，2023年专项债券提前批额度首次按上限下达，在1—2月提前批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和此前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的支撑下，基建投资有充足的资金支撑。

1—2月，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8.1%，增速较2022年全年小幅放缓1个百分点，或主要受到出口下行、产能利用率偏低等因素影响；房地产投资仍然是投资的主要拖累，同比下降5.7%，但降幅较2022年12月显著收窄6.5个百分点，为2022年4月以来最高。

瑞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测算称，制造业投资和基建投资疫情以来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均较2022年12月放缓，表明房地产投资跌幅收窄是1—2月固定资产投资改善的主要驱动因素。

不仅房地产投资，房地产其他指标也均呈现改善态势：2023年1—2月商品房销售面积、销售额同比分别下降3.6%、0.1%，降幅较2022年12月大幅收窄27.9个、27.6个百分点；房屋新开工面积同比下降9.4%，降幅收窄34.9个百分点；在"保交楼"等政策推动下，商品房竣工面积同比由降转增，从2022年12月的下降6.6%转为增长8%；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同比下降15.2%，降幅收窄13.5个百分点。

衡量房地产业景气程度的房地产开发景气指数结束了此前持续下行的态势，2023年1月和2月连续两个月回升。钟正生认为，地产行业大概率已经见底，2023年房地产对中国经济的拖累将弱于2022年。

投资之外，另一超出市场预期的是消费。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5%，较2022年12月回升5.3个百分点，结束了2022年10月以来的下降趋势。在此前财新的调查中，经济学家对消费同比增速的预测均值为3.2%。

按消费类型分，1—2月商品零售同比增长2.9%，较前值加快3个百分点；餐饮同比由此前的下降14.1%转为增长9.2%，大幅反弹23.3个百分点，显示防疫措施调整后，餐饮等接触型消费修复明显快于商品消费。由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未包括餐饮以外的其他服务消费，考虑到服务消费修复更快，消费实际表现或好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表现。

相比内需，外需表现相对偏弱。以美元计，2023年1—2月出口累计同比下降6.8%，或得益于供应链冲击消退、疫后订单短期反弹，降幅较2022年12月收窄3.1个百分点，但仍延续下降趋势。其中，对美国出口降幅扩大2.3个百分点至21.8%，对欧盟出口降幅收窄5.3个百分点至12.2%，仍低于总体增速。

与需求端表现相一致，供给端，服务业生产反弹幅度明显大于工业。1—2月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由负转正，上涨5.5%，高于前值6.3个百分点，为2021年8月来最高，其中住宿和餐饮业同比增长11.6%。而1—2月工业增加值同比仅增长2.4%，较前值加快1.1个百分点，低于财新调查3.3%的预测均值。

华泰证券固定收益分析师张继强认为，工业生产活动走强但恢复程度不及预期，主因是复苏节奏分化拖累生产：人力因素制约复工节奏，外需下滑与内需顺周期力量偏弱也拖累生产。

不过，汪涛测算的疫情后工业生产年均复合增长率，1—2月也高于2022年末，表明随着消费需求复苏和防疫限制取消，制造业增长动能改善。

复苏成色几何

2022年末，防疫政策调整之初，市场一度对经济复苏抱有较强预期。2023年年初的数据相对真空期，为数不多的调研数据——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明显反弹，也一度让市场对复苏期望较高。不过，最终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经济复苏更多是前期政策逐渐显效和消费场景修复带来的积压需求的释放，内生增长动能仍显不足。

华创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张瑜认为，分部门需求来看，表现最好的是广义政府部门（基建投资），其次是企业部门（制造业投资），然后是居民部门（房地产销售和消费）和海外部门。"居民部门和海外是目前需求侧两个偏弱的部门。"

就居民部门而言，近期修复主要集中在消费场景恢复、人员活动半径扩大带来的接触型消费和出行相关消费上，大宗消费和耐用品消费表现偏弱。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1—2月，金银珠宝、化妆品等升级类消费结束了此前的两位数下降，增速反弹均超过20个百分点；服装鞋帽和石油及制品等出行类消费也由降转升，增速反弹超过10个百分点。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耐用品消费相对低迷。1—2月通讯器材类消费同比降幅扩大3.7个百分点至8.2%；受车辆购置税减半优惠政策在2022年底结束的影响，1—2月汽车消费同比下降9.4%，低于前值14个百分点。钟正生测算称，2022年各类刺激政策拉动汽车零售同比多增10.1个百分点，透支及透支带来的高基数，对2023年汽车销售的拖累开始显现。

张继强认为，目前消费修复主要反映了返乡过年和出行链恢复的拉动，幅度上有一定暂时性因素，宽度上主要是局部性修复；汽车等大宗消费偏弱，反映出经济复苏的顺周期力量仍旧偏弱。未来消费复苏要看后续就业、收入和信心的修复程度。

居民部门需求偏弱，还表现在房地产销售上。虽然1—2月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同比降幅大幅收窄至较低的个位数，但是，居民提前还贷仍在延续。1—2月房地产开发商资金来源同比降幅从2022年的28.7%收窄至15.2%，但其中按揭贷款的同比降幅却从2022年12月的5.7%走阔至15.3%。

政策和积压需求释放驱动复苏、内生增长动能不足的特征，也在信贷数据上得到体现。2023年前两个月，新增信贷均明显高于市场预期，其中1月新增人民币贷款4.9万亿元，同比多增9227亿元，创下"最强开门红"；2月新增信贷1.81万亿元，同比多增5928亿元，高出市场预测的1.4万亿元的均值。

前两个月新增信贷超预期，企业中长期贷款持续高增长是重要原因。汪涛认为，这呼应了监管部门要求银行信贷“应放尽放”，以及政策性银行对基建项目持续提供信贷支持。

据财新了解，在财政支出前置和投资项目加快落地的带动下，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撬动的基建配套贷款，以及政策支持下的制造业贷款、房地产行业融资，是当前企业中长期贷款的重要领域。相比之下，私人部门的融资需求修复相对缓慢。与此相关的，2023年1—2月，民间投资增速同比仅微增0.8%，创2021年以来新低，明显低于投资5.5%的总体增速。

2月居民部门新增贷款2081亿元。其中，新增中长期贷款863亿元，同比多增1322亿元，为15个月以来首次同比多增；新增居民短期贷款1218亿元，同比多增4129亿元。国盛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熊园认为，居民中长期贷款同比多增，主要与春节错位背景下房地产销售好转有关，居民短贷多增较难由消费修复来解释，可能与居民通过低利率经营贷置换房贷有关。

汪涛也称，居民短期贷款反弹可能由经济迅速重启后消费贷、经营贷增加推动，也可能是因为一些居民通过借短期贷款提前偿还部分利率较高的房贷。

尽管经济快速修复，但内生动力偏弱导致复苏对就业的带动作用并不大。2023年2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6%，上升0.1个百分点，其中16—24岁青年人调查失业率升至18.1%，远高于2022年2月的15.3%和2022年底的16.7%。

张继强认为，2月城镇调查失业率走高有一定的季节性因素。2023年返乡需求激增，导致农民工年后寻求新的岗位以及其他岗位年后季节性离职的现象更明显；此外，可能也与劳动参与率的回升有关。

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郭磊则表示，青年人代表增量就业，历来弹性偏大，高度取决于企业招聘预期。尽管服务业高景气开局，但出口压力或导致一些劳动密集型行业对年轻产业工人的需求减少，制造业行业周期处于低位也对年轻人就业造成一定影响。

未来修复速度或放缓

2023年中国经济开局良好，政府工作报告设定的5%左右的增长目标，传递出不会出台大规模刺激政策的信号。市场开始关注未来复苏的可持续性。

多家机构认为，虽然在低基数的推动下，3月和二季度部分经济增长数据同比有望持续改善，但从环比看，经济修复的速度或将放缓。

张继强认为，经济修复仍有持续性，但修复斜率或逐渐收敛。中期看需求仍有修复空间，但政策不搞“大干快上”、经济内生循环和信心回归尚需时日，叠加外需下行压力，经济全面复苏甚至过热的概率不高。

海通证券宏观研报显示，接触型消费和房地产是经济修复最具弹性的两条主线，部分受益于促内需政策的积极发力，但更主要的是前期积压需求的集中释放。总体来看，经济修复斜率最高的阶段或已过去，下阶段两条主线的修复趋势能否延续仍待观察。

3月以来，高频数据开始分化：一方面，18大城市地铁客运量和百城交通拥堵指数延续反弹的走势，整车货运流量指数同比降幅继续收窄，高炉、焦化等开工率回升，指向经济活动继续修复；另一方面，3月前半个月30城房地产销售出现回落，此前房地产销售改善究竟是前期因疫情积压的需求短暂释放，还是可以持续的趋势性回暖，尚待观望。

“2023年经济复苏的方向是确定的，但地产的长周期转型限制市场对复苏弹性的预期。”兴业证券宏观首席分析师段超认为，从1—2月的数据来看，在宽信用环境下，地产部门边际改善，但3月高频数据走弱，后续是否能延续改善趋势尚不能确认。如果不考虑地产，消费复苏的强度实际上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瑞银最新一期消费者把脉调查显示，2023年消费反弹将主要由工作稳定和收入提高拉动，超额储蓄的部分释放也有帮助。汪涛认为，经济活动反弹尤其是服务业活动复苏，有望支撑就业和居民收入改善，进而支撑消费进一步复苏。此外，她还预计，疫情期间积累的4万亿元以上的超额储蓄中，可能有5000亿—6000亿元在2023年释放。

中金公司将消费复苏概括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疫情过峰之后，受益于防疫措施优化、场景修复，消费“人气”变旺，接触型服务、社交场景相关消费改善较大，这一阶段的消费修复斜率会比较陡峭，海外经验来看一般持续两到三个月；第二阶段则是在场景修复基本完成、“人气”回来之后，进一步的消费复苏更加依赖于居民就业和收入改善带来购买力的提升，这一阶段复苏斜率会相对平缓，但也更为持久，体现的是经济内生动能的恢复。

而要实现“就业改善、收入增加—信心修复—消费复苏—经济增长—就业改善”的良性循环，并不容易。付凌晖提醒，要看到在疫情冲击的这几年中，企业和居民个人的资产负债表受损，还需要时间修复。同时，长期积累的一些结构性问题还比较突出，稳定经济增长需要付出努力。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记者会上表示，2023年经济工作的基本取向是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推动经济运行整体

好转。“稳，重点是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进，关键是在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新进步。”他强调，要打好几套组合拳：一是宏观政策的组合拳，二是扩大需求的组合拳，三是改革创新的组合拳，四是防范化解风险的组合拳。“这些组合拳，都是有其具体内涵的，有的还会根据实践的需要不断充实、调整和完善。”

在重申坚定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同时，他还多次强调中国具备人口、市场、产业体系等规模优势。要激发这些优势，离不开深化改革开放。市场期待新一届政府上任后，在出台更多稳增长具体措施的同时，也能通过改革的方式来提振市场主体的信心。

版面编辑：吴秋晗

专栏丨去美元化导向有利于哪些货币？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3月20日第11期

地缘政治朝着对中国有利的方向重塑全球货币和金融秩序，但科技发展可能指向不同的方向，一些小国货币的吸引力也在增强


各国减少美元外汇储备，并不意味着将完全转向人民币，而是分散于韩元、新加坡元、瑞典克朗、挪威克朗和其他非传统储备货币。图：视觉中国

文丨巴里·艾肯格林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经济学教授

当美国及其伙伴对俄罗斯央行实施制裁、禁止西方金融机构与俄罗斯同行开展业务时，许多评论家警告，全球货币和金融秩序将发生深远的变化，其他国家会将这些制裁视为美国实施金融“武器化”。由于担心未来也会成为制裁对象，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将减少对美元、美国银行以及美国主导的环球银行间金融电信协会（SWIFT）的依赖。

一些评论家进而认为，中国将成为主要受益者。理由是中国已经拥有庞大的银行体系，还创建了一套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来方便人民币结算，可以作为联邦储备通信系统（Fedwire）和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CHIPS）的替代方案。

目前俄罗斯14%的出口以人民币结算，主权财富基金持有价值450亿美元的人民币证券和存款，俄罗斯企业在2022年发行了价值70亿美元的人民币计价债券。考虑到俄罗斯当前所处的形势，这些数据不应让人感到意外。但其他国家会在多大程度上朝这个方向发展？

2022年年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沙特阿拉伯时曾提出使用人民币结算两国间石油贸易的倡议。2022年下半年中国与巴基斯坦、巴西达成了合作备忘录，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还与阿根廷启动了人民币清算行服务。伊拉克中央银行在2023年2月刚刚宣布允许与中国的贸易直接用人民币结算。

这些进展还未在数据中得到体现。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所占的份额仍然不足3%。人民币在SWIFT支付中的占比在2023年1月降到了2%以下。

当然，并非所有国家都会报告其外汇储备的货币构成，那些最担心被制裁的国家不愿公开数据，也不愿意使用SWIFT的电子报文服务，更可能通过电子邮件、电话和传真等替代手段来安排跨境转账。

除了俄罗斯这样的特殊情况，当前中国在金融方面的吸引力或有限。俄乌冲突持续之下，中国金融机构有面临二级制裁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国家通过中国的银行机构开展跨境业务的空间受到限制。此外，中国仍然存在资本管制，这让海外央行担心能否随时获取持有的人民币外储，也让海外主体担心使用人民币做跨境支付能否时刻保持安全。

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国家没有把鸡蛋都放在中国这一个篮子里，而是在寻求使用本国货币开展跨境支付。新加坡和泰国已经将各自的实时快速支付系统PayNow和PromptPay实现了连接，两个系统的客户只需使用一个手机号码就能实现两国间的跨国转账。

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央行已经扩大了林吉特—泰铢直接结算框架，使两国民众能够通过合格的商业银行直接支付。东盟最大的五个国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坡的央行还签署了一项快速支付系统连接协议，使五国间可以无需使用美元或人民币跨境转账。印度尼西亚在2022年担任G20主席国期间，还成立了一个本地货币结算研究小组，以识别出鼓励本币结算所需的监管改革。

各国减少美元外汇储备，并不意味着将完全转向人民币，而是分散于韩元、新加坡元、瑞典克朗、挪威克朗和其他非传统储备货币。

这些趋势折射出的并非地缘政治变化，而是科技的发展。由于PayNow和PromptPay等支付系统是数字原生的，很容易对接，无需在转移资金时再诉诸美元或人民币。随着以自动做市、流动性提供算法为特征的数字化外币平台的兴起，这些小国的货币也变得更容易获得，交易费用也更低，进而增强这些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和国际储备形式上的吸引力。

许多人认为地缘政治将朝着对中国有利的方向重塑全球货币和金融秩序，但在这个过程中，科技或许掌握着更大的决定权。倘若如此，国际货币和金融秩序可能会朝着一个非常不同的方向改变。

版面编辑：吴秋晗

最新财新周刊｜货币经纪报价系统暂停风波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3月20日第11期

中国债市为何发展出了“货币经纪+报价系统”的模式，出路何在？



2023年3月15日，三大债市资讯软件QB、Wind、DM宣布“因不可抗力”而暂停货币经纪报价；3月17日，除QB外，Wind和DM等资讯软件恢复债券实时报价。

文｜财新周刊 张宇哲 王娟娟

2023年3月15日，三大债市资讯软件QB（Qeubee）、万得（Wind）、DM（Dealing Matrix）宣布“因不可抗力”而暂停货币经纪报价，债市一片哗然。

QB、Wind、DM及iDeal，是债市的四大国内报价平台，其中，QB的市占率最高。只有中国外汇交易中心（CFETS）于2022年推出、免费提供报价信息的iDeal未受风波影响。

一时间债市的交易员们手忙脚乱，回到十年前互加QQ群找券、询价的时代。“一些交易员尝试通过iDeal来看报价，另一些交易员靠QQ群喊话，有效报价都不多，相当于从自动挡倒退回手动挡，整个市场的交易效率都大受影响。”一位固收交易人士向财新形容。

当日，据市场同业的消息，整体债市成交大幅缩量，“利率债下降超过一半，信用债下降三分之一”。

这一突发事件迅速引起央行关注。3月16日下午，央行、银保监会召集货币经纪公司、银行等多家市场机构沟通。晚间，多位市场人士告诉财新，已接到通知，除QB外，Wind和DM等资讯软件将在3月17日恢复债券实时报价。此后，央行要求各家货币经纪公司主动向信息服务商提供报价信息，但这一名单中没有QB。这场持续两天的平台报价暂停风波暂告一段落，恢复了正常市场秩序。

据财新了解，央行要求货币经纪公司按照公平原则，向主流的信息服务商提供报价信息，“由双方按照商业原则自主协商，核心是维护公平的竞争环境”。

信息服务商的报价数据来源于银保监会批准的六大货币经纪公司——上海国利货币经纪有限公司（下称“上海国利”）、平安利顺国际货币经纪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平安利顺”）、上海国际货币经纪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国际经纪”）、天津信唐货币经纪有限责任公司、中诚宝捷思货币经纪有限公司、上田八木货币经纪（中国）有限公司，它们负责撮合债市交易。

3月14日，关于货币经纪公司将很快取消QB等资讯软件债券报价的消息不胫而走，债市议论四起，个中原因也众说纷纭。

QB等平台向这六家货币经纪公司采购债券报价数据，再通过终端向客户进行实时展示，使得债券投资者可以实时获取债券交易信息，是债市近年来的现象，也可谓固收市场的中国特色；而债券投资者很快适应并依赖上了这种报价系统加辅助交易的模式。

未来这种模式是否会发展成为电子交易商模式？业内人士大多认为这是行业的趋势，但需要监管首肯，更需要大手笔的硬软件投入。也有业内人士指出，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定位于金融基础设施，近年来已致力于搭建电子交易平台X-Bond等来降低交易成本，iDeal就是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于2022年下半年推出的、主要面向银行间本币市场的即时通讯平台，亦提供相关交易辅助功能，是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交易系统的延伸。

货币经纪的业务由银保监会、央行共同指导。财新从多个渠道获悉，前述“不可抗力”是指近日来自监管部门的

窗口指导，叫停向第三方输出数据，理由是涉嫌“超范围经营”。

《货币经纪公司试点管理办法》（下称《管理办法》）由银保监会发布于2005年，被视为货币经纪业务的上位规定，对经纪公司的数据业务本无禁止性规定。“但《数据安全法》出台以后，监管形势出现了变化。”有宁波森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下称“森浦信息”）人士对财新表示。

2022年12月，国务院出台“数据二十条”，提出建立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和数据产品经营权“三权分置”的数据产权制度框架，以构建中国特色数据产权制度体系。2022年底，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发布《银行间市场货币经纪业务自律指引》，意在对经纪公司业务进行规范；其中第二十六条规定，经纪商与第三方开展数据信息合作的，应遵守国家数据安全、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确保数据信息来源可追溯。

有来自机构的知情人士表示，几家货币经纪公司营业执照上的经营范围并不包括提供数据服务，而把数据有偿给QB等软件或属于提供数据服务行为，“监管就是以此理由，要求这几家货币经纪商整顿不合规的业务，本来也在监管权限范围之内，但没料到对债市影响这么大”。

身陷反垄断调查

“有人彻夜难眠，有人彻夜狂欢。”对于此次QB被排除在恢复报价名单之外，一位债市人士如此评价。

财新注意到，3月16日深夜，Wind在其金融终端首页贴出“债市春夏秋冬、四季都撸BBQ”的图文，标注经纪商报价已恢复。

多方信源表示，四大报价软件中，只有由森浦信息开发、入市最早的QB对六大货币经纪公司数据进行了全覆盖采购，并与上海国利签有数据服务的排他性协议。现在看来，正是这份独家合作协议引发的争议，成了QB此次被排除在外、未能恢复报价、恐怕要继续接受调查与整顿的主要原因。

不止一位业内人士向财新表示，2022年11月左右，Wind等同业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举报上海国利向森浦信息独家提供数据，涉嫌垄断及利益输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已启动反垄断调查，目前尚未出调查结论。

对于相关指控，森浦信息和上海国利的相关人士近两日都向财新口头否认了双方存在利益输送行为和股权关系。公开信息显示，森浦信息成立于2010年2月，股东是自然人王枫和钟燕琼，分别持股大约98.07%、1.92%。

六大货币经纪商中，成立最早、市场份额最大、客户最多、报价数据最全的是上海国利，数据在行业中价格最高。森浦信息推出的QB于2013年上线，于2018年开始收费。作为同业中的佼佼者，尽管报价服务深受市场欢迎，在行业中占尽优势，但也引发争议。

“以前银行间市场没有统一的报价平台时，交易员的报价方式就是在MSN群、QQ群、微信群里每天不断刷。2013年森浦信息最早把各家货币经纪商的报价放到软件里方便查看，市场对报价软件慢慢形成了依赖。等到QB将数据商业化、从2018年开始收费以后，Wind等几家平台也入场跟进。”一位资深债市从业人士回顾。

针对Wind未能如愿采购到上海国利数据的问题，森浦信息相关人士表示：“有的报价平台因没谈拢而未采购上海国利的数据，想以100万元买我们的数据，我们不同意；因为我们也是花七八千万元购买到上海国利的数据，双方都是基于商业合作。”

他还称，森浦信息至今尚未盈利，“我们并不激进，是按终端收费，并免费给客户用3台到4台终端”。

上海国利人士向财新表示：“与森浦信息的合作是在商言商。我们不否认与森浦信息有独家代理的商业协议，其中有一些排他性条款，但这不足以被认定为垄断的依据。”

“QB把货币中介数据和账号捆绑，金融机构想采购全部中介数据，只能选它一家，招投标也流于形式，它说多少钱就多少钱，机构自然觉得被绑架了。”前述债市人士认为，数据全且有独家数据，原本是QB搭建的商业护城河；但外界认为此举有数据垄断之嫌。

也有市场人士透露，QB今年在与客户签署的协议条款中约定，可能遭遇不可抗力风险，但不会退钱，“这也涉嫌利用市场地位绑架用户”。

有债市投资人士称，森浦信息最早是在上海国利的支持下成长起来的，与其捆绑紧密。“如果构成了垄断，也是因为介入市场最早。”该人士认为，如果监管部门认为上海国利或者森浦信息涉嫌垄断，需要整改，也应该有一定的过渡期，突然口头通知就切断数据服务，对市场伤害太大。

业内人士透露，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在2022年7月前后与六大货币经纪公司洽谈接入报价数据，与其他五家都达成了合作，惟独遭到上海国利的拒绝。

对此，上海国利相关人士向财新表示，由于考虑到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旗下有国际经纪的电子化平台，后者与上海国利有竞争关系，“评估下来就没有把数据给中国外汇交易中心”。

一位受访的固收交易服务商人士则认为，上海国利、国际经纪等六家货币经纪公司的交易数据对保证债市的透明度和效率很重要，不应由一家机构商业化地决定卖给谁或不卖给谁，它们对外应该无差别提供数据，无论是免费还是明码标价，都需要公允，谈好合同，谁来都一样。

“货币经纪+报价平台”模式

自2005年开始，国内银行间债券市场逐步引进TP、ICAP、BGC等几家国外经纪巨头成立合资货币中介公司，并安排了中方持股67%、外方持股33%的股权架构。彼时，国内银行间债市刚刚进入发展的快车道，但流动性差，而货币中介业务在中国是新生事物，没人知道怎么做。

公开信息显示，2005年中国银行间国债市场的年换手率仅为0.88，而从国际比较来看，同期美国国债市场的换手率高达40，其他发达国家债券市场的换手率一般也达到10左右。现券市场流动性不足使债券市场作为流动性管理的效果大打折扣，也影响了债券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进一步降低了市场的运作效率。

2003年原银监会从央行分离出来，承担金融机构的牌照准入及监管，形成了货币经纪牌照准入由银监会负责、业务指导由央行负责的监管体系。

此后六家货币经纪公司陆续成立，近十年来银保监会未再批复新的货币经纪牌照。其中，上海国利由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与全球最大货币经纪公司——德利万邦（欧洲）有限公司[Tullett Prebon（Europe）Limited]合资组建，成立于2005年12月，当前注册资本1.5亿元人民币；中方持股67%，外方持股33%。国际经纪商巨头之一的德利集团（TP）成立于1971年，总部位于英国，业务覆盖欧洲、美洲、亚太等地区，是FTSE 250指数的成分股之一。TP从上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向中国的金融机构提供货币经纪业务，与国家外汇管理局储备司、中国主要商业银行都建立了长期的业务关系。

成立于2007年的国际经纪由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持股67%，英国毅联汇业有限公司（ICAP）持股33%。ICAP是全球最大的外汇电子交易平台，由Garban公司和Intercapital公司于1999年合并成立，2001年更名为ICAP。凭借其在利率掉期和期权、商品掉期及可转换债券和外汇期权方面的优势，通过一系列并购行为，ICAP逐步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同业经纪商。

2016年底，TP收购了ICAP的声讯经纪业务，并将名称从TP更换为TP ICAP。

银行间市场的债券交易模式，通常是市场参与者通过经纪商询价或一对一自主询价，确定交易对手后，再通过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同业拆借中心线上确认。也就是说，市场参与者开展银行间市场交易时需要经过线下、线上两次确认过程。

“早期我们把卖方报价信息向市场展示，让有需要的买家可以看到这个信息，我们来给双方提供撮合，这个撮合业务是货币经纪公司提供的主要服务或产品，提供信息展示的数据业务最多算副产品。”上海国利人士介绍说。

据业内人士介绍，货币经纪公司的数据业务分三块：数据展示、衍生数据加工、数据销售，后者以API接口形式卖给金融机构。QB做的是数据展示和数据代销，是帮货币经纪公司拓展数据销售业务。

上海国利人士对财新表示，根据《管理办法》，对货币经纪公司的定义，是指经批准在中国境内设立的，通过电子技术或其他手段，专门从事促进金融机构间资金融通和中国外汇交易等经纪服务，并从中收取佣金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声讯即喊价的方式是华尔街最古老的报价、询价方式，电子手段早已是国际上经纪商的主要方式，《管理办法》也是允许的。”

成立于2010年的森浦信息，起步阶段是为前述六家货币经纪公司开发内部系统的技术供应商。“当年银行间市场没有统一的报价平台，交易员每天就在微信群、MSN群不断地刷信息找券。森浦信息击中了交易员的痛点。”有债市人士称。

“债券交易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场景，有很多行话、俚语，要对这些数据清洗、整理，让大家都能看明白。”森浦信息有关人士说。

“一开始没人做，要先烧钱；更需要认真趴下去，了解每家货币中介的需求，跟货币中介之间频繁沟通，把需求反映到系统里面，这需要细致的服务意识，不是靠一纸行政命令就能做到的。QB做了十几年，投了十几亿元，几百名员工天天在做这件事，还得跟六家货币中介搞好关系，把数据都能拿过来，是很不容易的。”前述债市投资人士称。

“经纪商+报价平台”的模式，很自然地指向电子交易经纪商的方向。上海国利人士就表示，国外传统经纪商早已转型为电子经纪商，“国内的各家经纪公司自己建电子平台，转型成为电子经纪商应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如果监管政策允许，我们肯定愿意做；只是需要大投入，包括结算清算系统，远比报价信息展示复杂得多”。

上世纪后期以来，电子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市场交易机制逐渐成熟，原来国际上传统的货币经纪商逐渐发展成场外市场中的电子交易平台，成为电子交易经纪商，如TP ICAP、BGC、Tadeweb等。为强化市场规范，提高信息透明度，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将提供与交易所类似交易服务的机构统称为另类交易系统（Alternative Trading

System，ATS），并建立备案管理规则。除了作为经纪商的撮合业务，报价信息展示只是这些电子交易平台的业务之一。

不过，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推出的竞价撮合平台和iDeal打通，一定程度上替代了传统的货币经纪中介，并在这个平台上推出了X系列产品，提供自动化做市报价服务，包括X-Bond、X-Bargain、X-Lending等，本就是朝向资讯和电子交易合一的平台在演化，目标也是以金融基础设施的定位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场效率。

经纪商PK做市商

从国际上成熟债市来看，国际债市是以"经纪商+做市商"（Broker+Dealer）为主要形式、以做市商主导的价格传导与双边交易形成分层的市场体系。做市商交易模式，是国际上通行的为场外债券市场提供流动性的基础制度；提供做市业务的机构，要具有较强的定价能力和与开展做市业务相匹配的资本实力和风险管理能力，并有专门的做市业务系统和人才投入。

"在成熟市场，做市商、中介和买方之间，做市商真金白银地在市场上随时bid/offer（投标/报价），提供流动性给买方，中介只做做市商之间的平盘撮合，是不能越级报价碰买方客户的。"在前德意志银行CMO亚洲交易主管Ralph Wu看来，这种立体分层的关系就像一个大自行车轮，轴是做市商，车辐覆盖整个买方世界，而中介像是填充在车轴部件之间的润滑油，绝不去到车轮部分。在这个结构里，做市商是流动性的提供者、市场的组织者，也是风险的承担者和价格的给予者；买方则是流动性的获得者、市场的参与者、收益的获得者以及价格的承担者；中介主要充当做市商之间的信息传达人。

他在其文中指出，固收市场对流动性的需求特点与股票市场不同，固收市场交易频度低，但单笔交易量大，而交易者对单笔交易影响价格变化的关心度高，同时对仓位有秘密保护需求，对交易确定达成的要求也高。在这种情况下，由机器规则配单进行的交易所式市场组织结构并不切合，做市商制度则能够最大程度保证这种流动性要求。

2001年，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就开始引入做市商制度。当年，央行发布《关于规范和支持银行间债券市场双边报价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九家银行成为首批双边报价商，这是中国债券市场做市商制度的雏形。2005年，上海国利作为第一家货币经纪公司成立，代表国内经纪商机制破冰。上述两大机制的引入，都有改善市场流动性结构、建立价格发现机制的意图。

但种种现实因素制约下，至今中国债市一直未建立起真正有效的做市商机制。

首先，目前国内银行间债市的做市商以大银行为主，但由于同质化、资产配置属性、缺乏激励机制、投资限制、做市商考核指标不够市场化等多种原因而做市不积极；其次，券商受限于资本金以及金融工具不足等原因，做市存在感不强。

"货币经纪+报价平台"模式则渐渐成为国内债市最主要的价格传导机制，方便交易员精细化择券、询价等，大大提高了交易效率和原本不活跃的债市流动性，但也离做市商模式越来越远，甚至一定程度出现了此消彼长的态势。"后来券商轻资产的销售交易那部分业务，很长时间也被经纪中介给抢占了，因为中介的人力成本要比券商便宜。"有债市资深人士称。

由于做市商一直未有效发挥作用，投行发完债看不到交易台流动性支持，交易台也没有几家能按照买方要求给价，所有市场交易者都到经纪商去挂报价或要报价，结果就是谁都可以既是买方又是卖方，而国外市场对经纪商的角色有严格界定。这种情况下，有撮合经验与技术储备的几家合资经纪商，利用技术优势和信息优势面向全市场广做撮合，国内债券市场的生态结构长期处于扁平化。

由于六家经纪商的数量远远少于做市商的数量，形成的数据有点类似准基础设施数据；而做市商出于种种原因不做市或者不积极。"现在债市更扁平了，中介形成了一个价格中枢，就变成做市商一大堆、货币经纪牌照倒有点寡头垄断的意思了。"前述债市资深人士分析。

不止一位受访人士指出，经纪商的报价撮合实际上是纯中介业务，没有风险资本投入，并不能提供真正的流动性。"市场单边走势时bid/offer会很快枯竭，而这往往是买方机构最需要流动性支持的时候。"Ralph Wu在其文章中这样表示。

此番有分析认为，监管部门有意借此次整顿，推进债券做市商的业务发展，但市场询报价模式并非一朝一夕可以改变。据财新了解，3月15日，有多家做市商接到相关部门电话通知，要求做市商维持市场稳定，报价量尽量不减少，价差尽量缩窄，且信用债要多报。3月16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数据显示，银行间债券市场92家做市商持续履行报价职能，做市报价债券只数合计4871只，覆盖国债、政金债、地方债、同业存单、商业银行金融债、中票、企业债、短融、超短融等各类型。但相比银行间近3.55万只、共计逾51.26万亿元的规模而言，体量尚小。

一位债券私募首席投资官对财新表示，做市机制多年来难以发挥，与国内债券市场生态并不完整直接相关，"都是银行这些大机构在玩，需求同质化，主要是做流动性好的利率债，买入并持有到期，交易需求不强"，多元化需求的机构太少，风险偏好不够多元，"传统的公募基金风险偏好也接近于银行，像去年年底流动性风险时，大家都卖，结果根本找不到对手方，卖不掉"。除此之外，他也提到，国内债市机构"都是挖矿的，但没有卖铲子的"，即提供加杠杆等各种服务的机构太少，市场缺乏配套工具，很容易形成单边交易，机构行为趋同，交易量很

少。

2月3日，为降低流动性溢价和债券发行成本，提高定价效率，证监会宣布启动交易所债券做市业务。2月6日，沪、深交易所正式启动债券做市业务，安信证券、东方证券、国泰君安、国信证券、华泰证券、申万宏源、银河证券、招商证券、中信建投、中信证券、财通证券和国金证券12家券商获得首批资格。3月14日和3月15日，DM、QB、Wind三大平台先后上线了“上证做市报价”板块；通过该板块，交易员可查看报价详情和具体成交数据，及相应债券的成交走势。

“就观察来看，现在有几家（券商）已经有苗头了，比如‘三中一华’（中信、中金、中信建投和华泰）以及平安证券、山西证券等在做市业务上已经有所积累和建设。”一位固收交易服务商高管表示，对券商而言，传统业务近年来趋向饱和，自营投资、投行业务都趋于同质化，龙头券商已逐渐将注意力转向做市业务，部分小券商也想借此寻求差异化发展路径。

“这场短期的混乱过去之后，也许有本事的做市商能够起来，对市场是好事，监管也乐见。”前述固收交易服务商高管对财新表示。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定位

接近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人士向财新表示，此次风波与其无关，不管个别机构是否涉及反垄断调查，市场的正常运作与服务任何时候都不应受到影响；并认为，数据加工产品可以收费，但金融交易的基础数据应该免费向社会开放。

据财新了解，此前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根据监管要求，与六家经纪公司洽谈购买数据接入事宜。未来这些准公共数据如何收集使用和管理规范、如何搭建完善的市场生态，备受业内关注。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成立于1994年，是央行直属的事业单位，具备行政色彩，又兼具金融基础设施和培育行业发展的多重角色：旗下有国际经纪，以经纪商的身份承担着信息传导与交易撮合的职能；中汇亿达金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服务于银行的金融科技公司，开发的comstar系统是商业化收费产品，与恒生等其他系统软件商存在一定竞争关系；新推出的iDeal免费提供报价信息，但数据广度和好用程度还有待提升。目前iDeal上只有平安利顺和国际经纪两家公司的报价。国际经纪是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持股67%的控股子公司；平安利顺的多位高管出自中国外汇交易中心。

“如果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定位是交易报告库，就有责任要求经纪商和信息服务商向其提供数据；但如果中国外汇交易中心自身也有各种商业化成分，就难免会有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的疑问。”业内人士指出。

“交易报告库”是债市的基础设施，也是央行赋予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重要角色。前述人士也明确表示，中国外汇交易中心自身从不参与商业化子公司的市场竞争，“没有必要，也没有动力”。

2022年12月，央行发布了《金融基础设施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对于金融基础设施的定义，是指金融资产登记存管系统、清算结算系统（含开展集中清算业务的中央对手方）、交易设施、交易报告库、重要支付系统、基础征信系统。

在国际上，交易报告库制度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于欧美诞生的重要的基础制度之一。2009年，G20匹兹堡峰会明确，所有场外衍生品必须向交易报告库报告。2012年，国际清算银行支付结算体系委员会（CPSS）和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发布了《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PFMI）》，交易报告库被纳入五类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交易报告库通过要求交易主体向交易报告库报送交易数据，将分散、非公开的业务数据整合在一起，能够分析市场的整体情况，实时监测业务风险并进行有效防控。

国内交易报告库制度是随着2022年8月《期货和衍生品法》正式实施而诞生的。《期货和衍生品法》首次明确了交易报告库的法律地位及主要职责，规定“应当建立衍生品交易报告库，对衍生品交易标的、规模、对手方等信息进行集中收集、保存、分析和管理，并按照规定及时向市场披露有关信息”。其主旨是通过报告库对全市场基础数据信息的汇集，实现从“看得清”“管得住”到“行得稳”的良性循环；依托交易报告库汇集的海量权威数据和数据标准体系，完善行业数据生态和数据治理水平，对提高市场透明度和投资者保护、防范系统性风险有重要作用。

据债市人士介绍，国外债券市场的交易报告库机制，一般是由监管或市场自律组织牵头，所有的OTC（场外交易市场）渠道交易数据（主要是在电子交易平台上达成的）最终都要进库；由交易报告库决定采购哪些数据，这些数据怎么卖、卖给谁，如何定价，如何分成等商业化安排，而电子交易平台有义务向交易报告库报送数据。

美国债市的自律组织美国金融业监管局（FINRA）与各类电子交易平台或信息服务商有数据服务分成协议，经FINRA整合之后，再返售给各家电子交易平台，即电子经纪商。FINRA的主要功能是通过高效监管和技术支持来加强投资者保护和市场信用建设，主要负责OTC市场的交易行为以及投资银行的运作，是美国金融市场监管架构中的有效组成部门。

“目前，国内债市在各个方面都不够市场化、规范化，市场参与者角色边界的分工不明确、不严格，责任义务界定不清晰，这导致很多市场参与者角色不明，多种利益掺杂在一起。可能要等到金融系统进一步市场化、法治

化，才能有本质上的改变。”前述债市人士称。

版面编辑：吴秋晗

徐小庆｜中小银行危机加大美国衰退风险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3月20日第11期

中小银行危机将加剧美国货币的收缩速度，通胀虽然仍保持韧性，但不应成为进一步收紧的理由

文丨徐小庆
敦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宏观策略总监

当市场对美国经济预期从硬着陆转向软着陆甚至不会着陆时，硅谷银行破产事件无疑向投资者敲响了警钟。

当然，这不是一起典型意义上的高利率环境引发的债务危机，和次贷危机的性质完全不同，而且在财政部承诺刚兑硅谷银行的所有存款后，该事件对金融市场产生的风险溢出效应会逐步弱化。但以硅谷银行为代表的中小银行流动性隐忧，会不会是本轮加息周期引发美国经济衰退的标志性事件？笔者认为概率较大。

根据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划分，资产规模在2500亿美元以上的是大型银行，全美只有13家，需要执行更严格的审慎监管标准；其余为中小银行，硅谷银行资产约有2000亿美元，在中型银行中排名靠前。疫情以来中小银行的总资产增速快于大型银行，最高时接近20%，虽过去一年明显回落，但2022年四季度以来仍有3%—4%，而大型银行的资产增速已在2022年四季度转负。同时，中小银行存款增量只有大型银行的一半，贷款增量却达到存款增量的三分之一。这使得中小银行在贷款增量中的市场份额达到60%，是大型银行贷款投放量的3倍。

由于银行存款利率不会完全跟随货币市场利率同步上调，所以存款收益的吸引力不及更市场化的货币市场基金，这使得银行存款从2022年二季度以来持续下降。中小银行在吸纳存款方面本就优势不大，高利率环境下存款流失的压力就更大，流动性风险显著上升。

硅谷银行事件引发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担忧后，存款会加快流失，继而限制其信贷扩张能力。由于疫情后中小银行已成为美国信贷投放的主力，并以服务中小企业为主，一旦其信贷放缓，美国货币增速将加速收缩，并引发中小企业的就业机会减少，无疑将增大经济衰退风险。

笔者认为，之所以本轮加息周期至今未对美国经济造成明显的负面冲击，关键在于现代货币理论使得美国M2增速在2020年至2021年出现史无前例的飙升；尽管2022年二季度以来环比增速转负，但回落速度偏慢，即使利率大幅提高，紧缩效果也被充裕的流动性总量抵消了。由于庞大的货币供应量淤积在金融体系中，不同于过去的传统紧缩周期，仅提高利率对经济的抑制作用是不够的，必须加快货币收缩速度才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本轮高利率对经济的负面冲击相对滞后的另一重要原因是：次贷危机以来政府部门成为信用扩张的主体，而政府部门对利率的敏感性相对私人部门偏弱。但随着各期限的国债收益率持续上行，联邦政府也将面临更大的财政压力。基于2023财年的预算赤字，笔者估计2023年利息总支出接近8600亿美元，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为14%。事实上，2007年和2018年利息支出占比也曾达到12%—14%的高位，美联储均结束加息周期，说明在目前的利率水平上财政部很难承受较长时间。

美联储一直强调将基准利率提高至限制性水平，那是否在CPI环比年化率没回落至2%—3%时，仍要持续提高基准利率呢？笔者认为，衡量利率的合理水平不能仅看CPI，也要考虑经济的潜在增速，因为它决定了融资主体的长期投资回报率，一旦利率超过该水平，对经济的抑制作用就会显现，通胀回落只是时间问题。2004年至2006年加息周期中基准利率最高达到5.25%，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数据，当时潜在GDP增速为5.8%。目前潜在GDP增速为4.7%，这意味着限制性利率水平应该低于那一轮的峰值。

综上所述，高利率维持时间越长，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会越显著，而中小银行危机将加剧美国M2的收缩速度，通胀虽然仍保持韧性，但不应成为继续收紧的理由。基准利率已达到限制性水平，只需要保持一段时间，通胀压力自然会缓解。国债收益率继续上行的空间有限，而美股在经济开始呈现衰退特征时，新一轮调整风险或许才真正开始。

版面编辑：吴秋晗

最新财新周刊｜供地制度优化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3月20日第11期

销售能否大规模、持续性复苏，决定土地市场前景



苏州工业园区航拍。从首轮土拍看，政策优化不是适用于所有城市的“灵丹妙药”。市场热度两极分化，房企投资仍聚焦于高能级城市的优质宅地。

文丨财新周刊 陈博

2022年10月底，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开表态，力争将南昌从集中供地城市名单中调出。2023年初，南昌“如愿以偿”。

3月1日，南昌披露市本级2023年第一批拟出让住宅用地清单。其中包含23宗地块，总面积约115.33万平方米，计划于3月1日至6月1日入市。

3月3日，南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挂出其中六宗土地的竞拍公告，正式竞买拟于3月23日举行。这意味着，从2023年首轮开始，南昌供地规则改为多次挂牌、错峰出让。

南昌转换土拍节奏得益于供地政策统筹调整。2022年12月，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向各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下发通知，提出建立“拟出让地块清单公布制度”。

具体而言，各地主管部门应根据当地年度供地计划，分批次公开未来一定时段内拟出让地块的详细清单，内容包括地块具体位置、面积、用途、主要规划条件、出让方式等。在清单披露后三个月内，各地可以一次或多次发布出让公告，有序推出清单内全部地块。未能成交的地块纳入后续清单内。

新政策是对此前土地供应制度的优化。2021至2022年的两年间，根据国家统一部署，22个热点城市在宅地拍卖中实施“两集中”，即集中发布出让公告、集中组织出让活动，每年供地原则上不超过三次，且时间间隔和地块数量要相对均衡。南昌未在首批22城之列，但同样于2021年开始执行集中供地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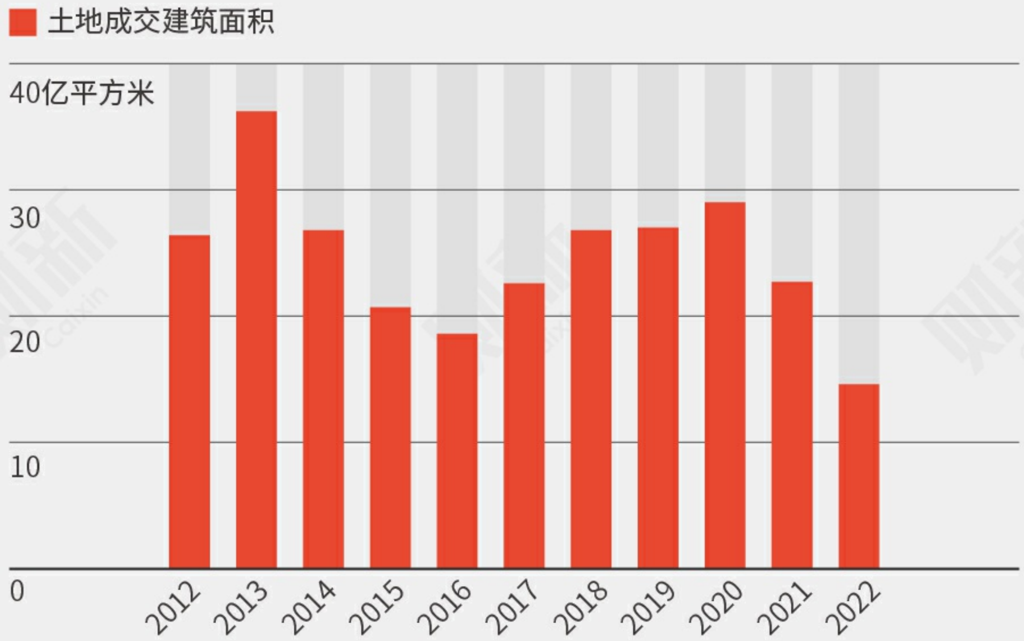
截至3月15日，22城中已有15城公布了2023年首批拟供宅地项目清单。广东东莞、陕西西安、浙江金华等多个原本和南昌一样跟进“两集中”土拍的城市，也纷纷向新制度看齐。

新制度不再限定推地批次，变集中竞拍为分批竞拍，土地信息在地块挂牌上架前就要披露。一名民企华南的投拓负责人告诉财新，这些变化意味着开发商获得更多时间筹措资金参与土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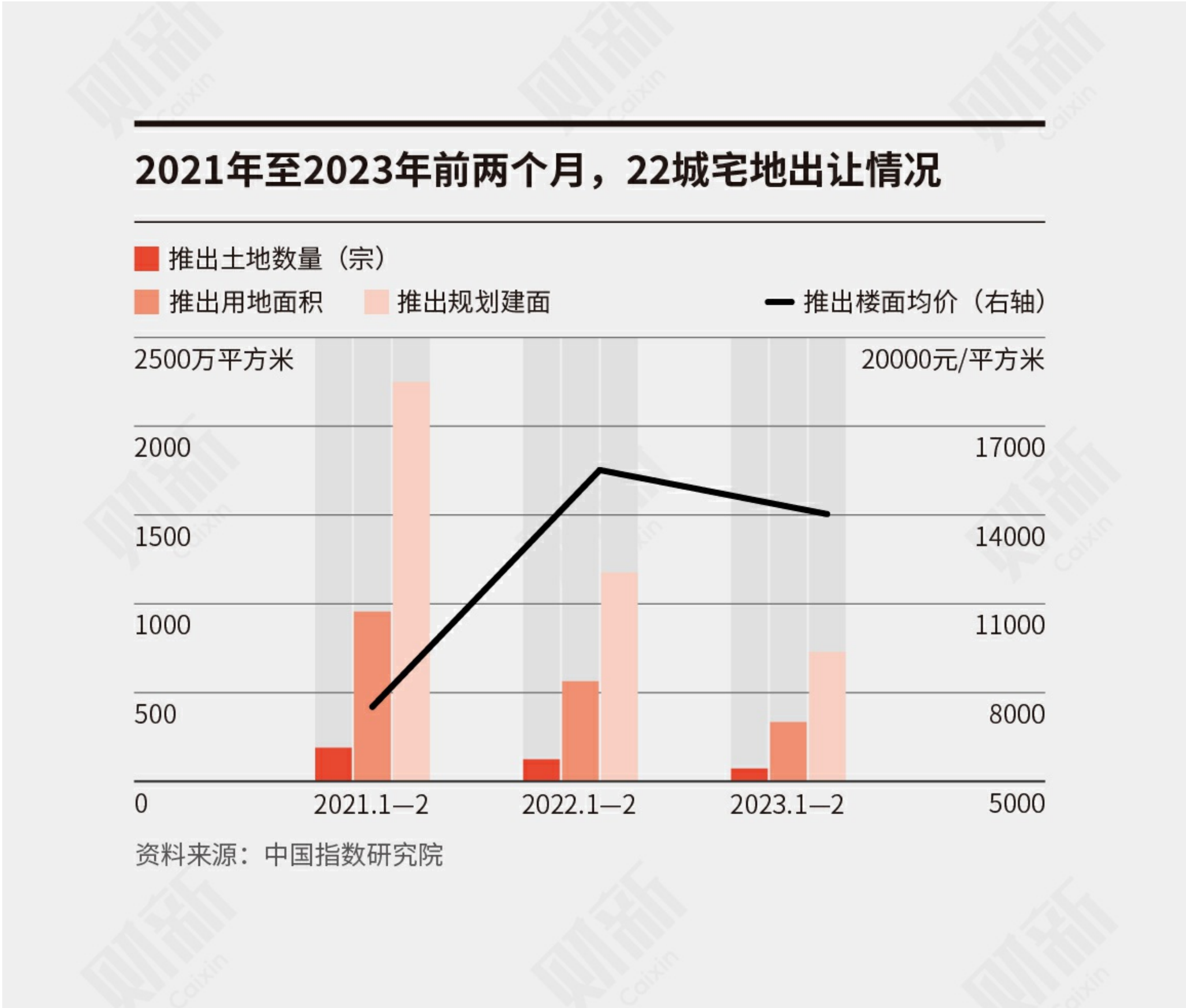
“两集中”制度诞生于房地产上行时期，原本旨在抑制土地市场过热。2021年三季度，制度落地仅半年，房地产行业风险暴露，楼市急转直下，低迷情绪传导至土地市场。

据市场机构克而瑞研究中心统计，从2012年起，国内300城每年的土地成交建面基本保持在20亿平方米以上；而2022年，这一数据仅14.6亿平方米，同比下降36%，卖地规模创下近十年新低。

2012年至2022年，全国300城土地成交建筑面积



资料来源：克而瑞研究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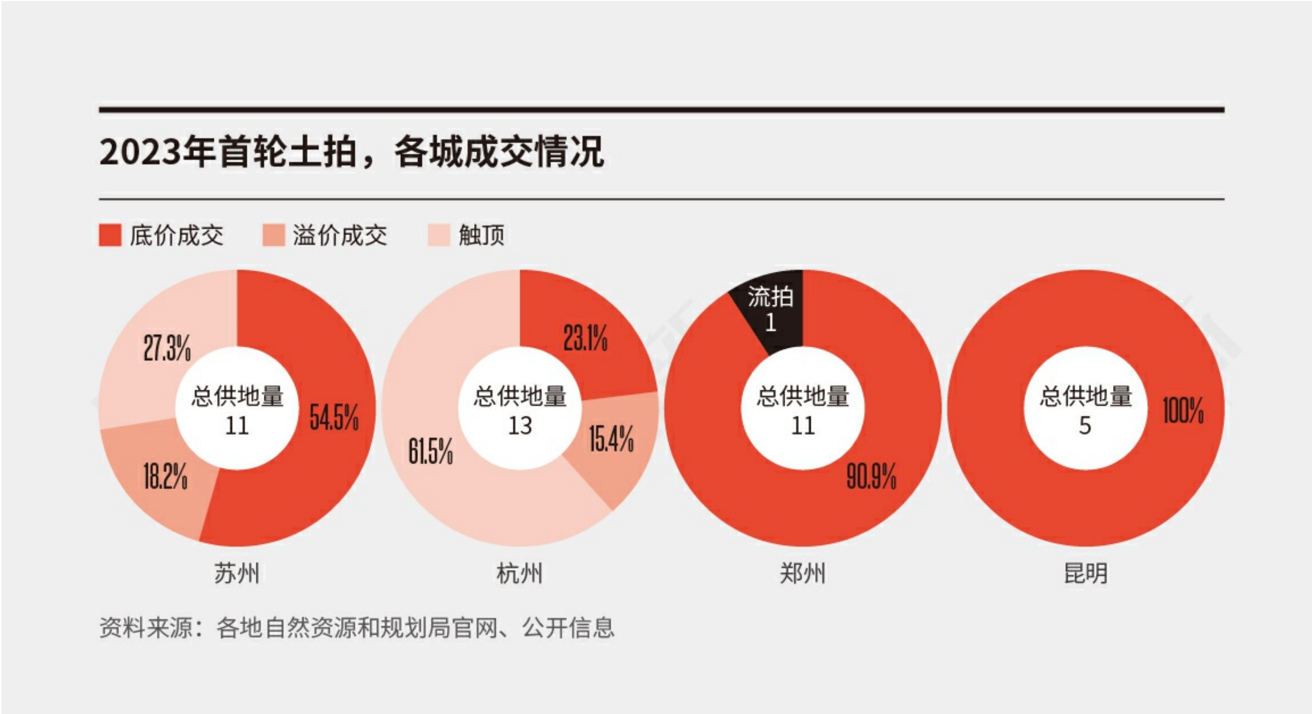
土地财政收入随之下滑。粤开证券在2月发布的报告显示，在已公布数据的26个省份中，仅上海、海南两地2022年的土地出让金实现同比正增长。

业内普遍认为，此时供地制度优化调整，是政府为挽救土拍颓势、缓解地方财政压力的手段之一。

2023年各级政府寄望房地产投资端能够助力“稳增长”，愈发重视拿地主体。自然资源部在上述通知中强调，

要“让市场主体全面掌握土地供应状况”，“给市场主体充足的时间预期预判”。多地都在供地清单中给每宗地块标注联系人及联系方式。这些联系人多为当地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用地科的工作人员，负责与房企沟通地块详细信息。

为了确保土地成交率，主管部门作出了积极主动姿态，不过从已经完成首轮土拍的城市看，政策优化并不是适用于所有城市的“灵丹妙药”。市场热度两极分化，房企投资仍然聚焦于高能级城市的优质宅地。



土地市场能否企稳，主要支撑还要看楼市复苏的可持续性。据市场机构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统计，2月全国60个重点城市的新房住宅成交面积为2005万平方米，环比、同比分别增长47%、37%；同期，8个重点城市的二手房成交套数约为7.94万套，环比、同比分别增长78%、96%。楼市回升迹象初显。

“2月以来，公司旗下新盘到访与成交量确实有所上升。”一名大型央企的华南营销负责人说，不过公司仍在密切关注，“我们也担心这种回暖‘昙花一现’”。

上述民企华南投拓负责人认为，只有销售大规模、持续性复苏，房企才愿意入场拿地，“地块不光要快速开盘销售，还得达到较高去化率。开发商当下缺钱，扛不住慢周转”。

政府卖地提质减量

中国房地产企业长期奉行规模论。开发商撬动杠杆资金“跑马圈地”，依赖高周转快速回款，再滚动投资下一轮。土地和资金是房企崛起的两大“命脉”。

2021年中以前，土地市场长期高热。当年首轮集中供地后，个别地方政府部门甚至约谈企业，警示开发商理性拿地。

但从2021年三季度开始，房企债务频频爆雷，再融资遭遇瓶颈；恰逢楼市销售持续萎靡，开发商无力谋求扩张。土拍转向买方市场，地方政府为了避免土地流拍，不得不主动调整。

2023年首轮供地伊始，苏州政府便释放出满满诚意。1月17日，苏州年内首批宅地上架，11宗地块的总出让面积约为39.26万平方米；2月7日，这批宅地正式挂牌，并于2月17日和2月23日分别完成竞拍。整个过程持续一个月左右。

苏州是年内较早拉开首轮土拍序幕的城市之一。这轮土拍启幕较2022年早三个月，拿地房企如能及时开工，在下半年就能形成销售回款。此外，苏州压缩供地数量至2022年首轮的三分之二，但优质地块占比显著提高。

2022年苏州工业园区和高新区狮山板块的房地产市场仍保持一定热度，2023年首批出让的11宗宅地有7宗即位于这两个区域，其他4宗也多为所在区域的重点地块。

“两集中”供地制度实施之后，多地供地节奏“前高后低”，尤其是2021年，诸多城市首次供地规模超过全年计划的四成。如今土拍热度不复当年，不仅苏州，其他城市也在转换思路，“提质减量”成为2023年主要策略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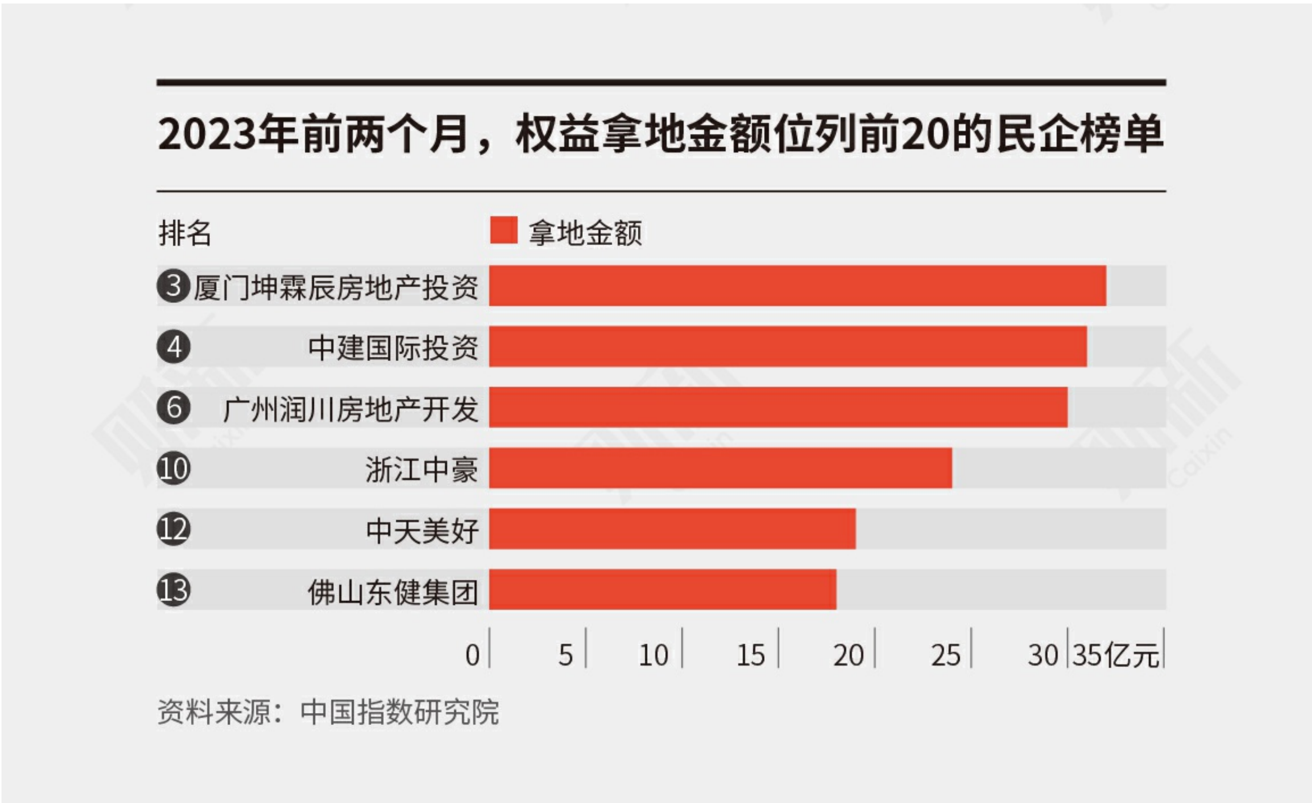
部分地区直接削减了全年计划供地规模。比如长春于2月17日宣布，2023年拟供应187万平方米商品住宅用地，同比大幅减少45.16%。市场机构中国指数研究院提供的数据显示，2022年长春原计划供应341万平方米商品宅地，最终完成率仅16.11%。

据该机构统计，2022年22城平均供地计划完成率只有58.47%。据克而瑞研究中心统计，同年，地方城投拿地建面占比达58%，比2021年增加20个百分点。这组数据意味着市场化企业拿地意愿持续下降。

克而瑞研究中心高级总监谢杨春认为，2023年供地如果进一步增量，不仅加大城投托底负担，也增加土地流拍风险，“对当地市场并非好事”。

上述自然资源部的通知明确提出，各地测算下一年度供地计划总量时，要以当地近三年宅地年平均完成交易量及所对应的住宅建面作为参考。如果商品房去化周期长、土地流拍率高且市场需求明显不足，相关城市应控制宅地供应规模；若已供应未竣工宅地面积超过近三年平均完成交易量的5倍，相关城市应从严压缩计划供应规模直至暂停供地。

据中国指数研究院统计，2023年前两个月，22个热点城市本级总共推出72宗土地，相比2021年及2022年同期分别减少61.90%、41.94%。



中国指数研究院土地市场研究负责人张凯认为，提质减量意味着调整供地结构，优质宅地价格更高、占比更大，地方政府希望此举能够促成土地财政筑底回升。

房地产危机发酵已逾一年，土拍完成度不及预期，地方政府卖地收入骤减。财政部国库司在2023年1月3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约为6.69万亿元，同比下降23.3%。这导致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同比下降20.6%至7.79万亿元，其中，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同比下滑21.6%至7.38万亿元。

地方政府通常依赖卖地支撑债务扩张，土地出让收入既是地方政府当期举债的资信依据，又是偿债主要来源。

过去十多年里，得益于房地产高歌猛进，全国土地出让收入年度增速大多保持双位数。2021年国内土地出让收入达到8.70万亿元峰值。据粤开证券测算，2009年土地出让收入相当于当年GDP的4.1%，及至2021年，这一比例达到7.6%。

张凯称，2021年下半年土拍遇冷，为鼓励房企参拍，当时多地将土地出让金缴清期限延至2022年，2022年多数城市50%的土地出让金收入为2021年卖地尾款，“同理，2022年近乎一半的土地出让金尾款也会推迟到2023年缴纳，由于2022年多城土地成交量远低于2021年，2023年地方土地财政继续承压”。

3月1日，财政部部长刘昆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提到，2022年土地出让收入虽然有所下降，但对地方一般公共预算影响可控。一名熟悉政府运作及土地市场的业内人士则认为，政府对于土地出让减收的后果应有充分估计。地方政府通常先期举债支出一级土地整理成本，如果土地流拍，前期成本难以平衡，城投债兑付风险将进一步扩大。土地财政收入缩水致使地方政府无力扩大基建投资，稳增长能力因此受限。

当前除了优化供地，一些城市还加大力度招商，组织队伍奔赴异地寻找土地买家。财新获悉，3月初，湖北省襄阳市政府相关领导带队前往北京进行土地招商。知情人士透露，襄阳专程出动较高级别官员，安排团队拜访企业，吸引仍然愿意布局三、四线城市的房企到襄阳拿地。

能否见效？

苏州政府主动调整供地策略初见成效。此次拍卖中，该市工业园区湖西板块一宗面积约为5.68万平方米的宅地受到追捧。其挂牌起始价为31.68亿元，本就是苏州首轮供地中起拍价格最高的地块。为争夺这宗宅地，房企在线上报价多达65轮。2月16日10时，在历经两天自由报价后，拍卖进入限时竞价阶段。不到两分钟，报价超过政府最高限价近500万元。

时隔一天，中国海外发展（00688.HK）、万科集团（000002.SZ/02202.HK）、华润置地（01109.HK）、招商蛇口（001979.SZ）、建发股份（600153.SH）、越秀地产（00123.HK）等31家房企齐聚摇号现场，最终华润置地中签。该地块成交总价为36.43亿元，溢价率为15%。

“我们钱都准备好了，就是奔着‘日光盘’目标参拍的。”一名地方国企资金部门人士告诉财新。2022年中，地块附近的湖东板块出让类似宅地，项目一期建成后赶在当年底开盘，当天即售罄。该企业准备原样复制，拿地之后快速开发，年内可以入市回款。

苏州此轮土拍还有另外两宗位于高新区狮山板块的宅地堪称“香饽饽”。在竞拍阶段，两宗宅地分别经过14轮、81轮报价，此后触顶摇号。

一家总部位于华东的中型央企投资高管称，苏州本身是热点城市，此次供给的部分宅地又足够优质。“由于新房限价，工业园区湖西板块、高新区狮山板块均存在一、二手房价格倒挂情况，价差为1万元左右。”这名高管说，“房企青睐这类地块，因其入市后去化速度有保障，地块对应的IRR（内部收益率）更高。”

热点城市优化供地方式，一定程度上提振了房企信心，但部分城市全力“救市”，却难以激发企业拿地积极性。

郑州和昆明即是典型案例。2月7日，郑州首轮土拍落幕。推出的11宗宅地中，1宗流拍，1宗由河南本地民企建业地产（00832.HK）按底价获取，其余9宗均由当地平台公司托底。1月30日、31日，昆明分两天出让五宗宅地，全部按底价成交，其中三宗被云南本地平台公司拿下。

此轮房地产风险爆发后，全国多地预售项目因开发商资金短缺而烂尾或延迟交付。2022年6月底，多地问题楼盘业主维权，公开喊话断贷，郑州及昆明都是断贷风波较为突出的城市之一。为了平息风波，郑州在当年9月启动了“保交楼”专项行动，方式包括申请全国性专项借款、设立地方性纾困基金等。郑州官方屡次动员出险房企开展“保交楼”攻坚战，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还提到，要对停工问题楼盘严肃追究责任，公安经侦、审计、税务等部门都要参与。

行政力量深度介入也表明当地房地产行业难以依靠市场力量迅速修复。一名大型央企深圳投资负责人称，在这类城市的市场销售难有起色，项目去化周期拉长，开发商基本选择退出。

事实上，从2022年开始，多数房企就战略性收缩城市拓展规模。财新了解到，截至目前，不少房企进入布局的城市数量相比2021年之前减少超50%。

出于安全性考量，房企投资收敛聚焦，热点城市卖地收入集中度因此上升。据克而瑞研究中心统计，2022年全年，出让金排行前十位城市的土地成交额在全国300城土地成交总额中占比超过三分之一。

官方此刻“松绑”供地制度，效力大概率也只能因城而异。克而瑞研究中心发布于1月19日的研报指出，受楼市表现差异影响，2023年各地土地市场热度将持续分化，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高能级城市仍是房企拿地重点。

东部沿海某热点城市住建部门人士告诉财新，房企在当地拿地的意愿较高，“今年整体楼市形势有所好转，本地还存在一波购房需求，我们不担心土地卖不出去”。

热点城市内部板块之间同样存在分化。上述央企深圳投资负责人说，如今房企资金有限，不可能再冲进热点城市大规模抢地，“只能优中选优，挑选重点城市核心区域一两块地参与”。

“生存环境恶化，能够拿地的市场化房企只会把钱花在刀刃上。”谢杨春举例称，过去两年龙湖集团（00960.HK）在杭州、重庆、苏州等城市拿地，均选择市区地块，滨江集团（002244.SZ）亦只在南京、宁波等地的市区拿地。在不少城市，边远地块成交只能依靠非市场化力量。据克而瑞研究中心统计，2022年地方城投所拿下的地块中，郊区地块总建面占比为53%。

这一轮最终进入摇号阶段的地块，都集中位于高能级城市中新房保持严格限价的核心区域；在这些城市的外围区域，库存压力较高、去化速度偏缓，或测算利润指标偏低，房企通常不会把相关地块列入考虑范围。

“说到底，大家的投资策略基本一致，都盯住一线城市和强二线城市中心地段。”上述央企深圳投资负责人说，这是土地市场价值规律决定的，不会受到供地具体形式明显影响，不过“新制度意味着房企拥有更充足的时间提前研判拿地策略，铺排拿地资金与次序”。

民企返场

杭州2023年首轮土拍在2月进行，推出的13宗地块悉数成交，其中8宗因报价触顶摇号，整体溢价率高达9.3%。13家拿地房企里有7家民营开发商，包括台州伟星、浙江中豪、浙江中腾等较新面孔。

民企返场是土拍市场久违的景象。楼市高光时期，民营房企每年贡献大约70%的销售份额，对土地需求量更是逐年递增。每逢土拍，热点城市经常高潮迭起，时不时涌现出一批民企“黑马”。“黑马”多为全国化布局的高杠杆民企，以阳光城（000671.SZ）、泰禾集团（000732.SZ）等为代表，它们凭借激进拿地实现规模快速翻倍。而2021年下半年以来，房地产再融资一度停滞，楼市销售下滑，大小民企因资金拮据普遍收缩投资，杠杆高的企业甚至从土

地市场“销声匿迹”。

但政府卖地需要托市。从2021年第二轮集中供地起，地方城投被迫成为托底主力军。据克而瑞研究中心统计，2021年至2022年的集中供地中，地方城投摘下了半数地块，其中90%都是底价成交。2022年第三轮供地开始，城投拿地金额占比一直超过40%。

多名业内人士认为，近年来，城投债发行与存续规模不断攀升，城投公司本身债务风险显露。经历超一年举债托底之后，城投公司又积累大量待开发地块，开发能力与资金周转备受考验。这类平台公司将逐渐退出核心城市土地市场。

国企开发商亦是过往两年土地市场的“常客”。全行业信用危机爆发后，国企受影响较小，融资能力相对民企而言更强。据克而瑞研究中心统计，2021年至2022年，保利发展（600048.SH）、华润置地、招商蛇口、中海地产、中国铁建（601186.SH）五家央企连续两年锁定企业拿地金额榜单前五，合计斩获了集中供地政策实施以后60%的地块。

谢杨春预计，国资企业仍将是2023年上半年土地市场主力，不过国企也面临资产负债表考核，不会一味扩大规模。上述地方国企资金部门人士提到，国资委对国有企业负债率设置有红线，拿地预算还会受制于杠杆率。谢杨春认为，愿意大规模出手的国企开发商仅限于少数几家，更多尚有拿地能力的国资企业会以销定产，不再盲目加仓。土地市场若想真正激活，关键还在于民企能否大量登场。

民企现身备受关注。前述央企深圳投资负责人指出，深圳2022年第三轮和第四轮集中供地时，已有少量民企报名，“只要地方政府明显让利，土地成本足够便宜，地块利润率不差，还有资金周转能力的民企就愿意参与进来”。

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于3月1日的拿地排行榜显示，2023年前两个月，小型区域民企在前20榜单中占据三成席位。

“今年这一轮拿地的更多是地方性小民企，销售规模仅数百亿元。它们更倾向于布局自己熟悉的区域，且拿地数量较少。”上述中型央企投资高管说，这类民企对地块利润和去化速度要求不高，只要项目安全且有钱赚就能接受。

大型民企暂时鲜有亮相。例如龙湖集团在2023年初参与过北京土拍摇号，至今未再出手拿地。在3月17日举行的2022年业绩会上，龙湖集团执行董事兼高级副总裁张旭忠称，公司2023年的投资额度要与销售回款动态匹配，保证业务大盘的安全性；此外还要严守投资刻度，仅围绕20个主力城市和14个机会城市的核心区域布局，确保地块周转率和利润率。

同时，以国资为大股东的市场化头部企业如万科，在土拍市场也秉持审慎的投资纪律。2023年开年至今，万科在土地市场“颗粒无收”。在3月8日举行的股东大会上，万科集团首席运营官刘肖称，万科对行业、政策和市场判断趋于积极，随着后续融资资金到位，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公司将会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捕捉新项目机会。

民企拿地前提也需资金充裕。克而瑞研究中心在1月19日的研报中指出，2022年四季度以来，房地产金融端调控持续放松，但并未为土地市场带来直接利好。比如，通过担保发债融到的资金按规定主要用于“保交楼”或偿还旧债，并不能用于拿地。这意味着，销售真正好转才能帮助民企坚定拿地意愿。

2月各地房地产市场出现一波“小阳春”，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成交量同环比均呈双位数正增长，结束了自2021年7月以来持续下降态势。

3月7日，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会议第二场“部长通道”活动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倪虹公开表态称，现在对房地产市场企稳回升充满信心，房地产供需两端发生积极变化，项目复工率大大提高，售楼处看房量大幅提升，成交量也有明显改善；2023年前两个月，全国一、二手房销售结束长达13个月的负增长，市场主体信心正在恢复；此外，支持购买首套与二套住房相应政策已经出台，正在落实见效。

不过，一名民企华东区域营销人士称，2月底至今，不少城市新盘周到访量与成交量又开始回落，“比如苏州，最近两周，我们旗下楼盘周到访量与周认购量持续减少，降幅均超过20%”。

“现阶段，销售端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房企拿地还是谨慎。”上述地方国企资金部门人士告诉财新。▫

版面编辑：吴秋晗

最新财新周刊｜运营商全员卖云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3月20日第11期

政企上云撬动云市场格局悄然剧变。从传统管道变身云网融合，运营商欲重定估值体系



博览会上的天翼云展台。运营商上云的背后是信创浪潮，政企市场的巨大需求裹挟其中，悄然改变了云市场供给方的势力对比。

文丨财新周刊 覃敏

3月13日，三大运营商股价再次飙高，中国移动（600941.SH）涨停，报98.34元/股，市值冲上2.1万亿元，距离2.21万亿元市值的茅台仅一步之遥；中国联通（600050.SH）、中国电信（601728.SH）分别涨5.4%、8.3%。

前一日，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分别发布超市场预期的派息政策。中国移动称，预计2022年派息率将同比提升，2023年现金分红则将提升至当年公司股东应占利润的70%以上。中国电信自2022年起宣派中期股息，也作出了类似中国移动的承诺，在其A股发行上市后三年内（即2024年8月前），逐步将年度现金分红提至当年股东应占利润的七成以上。

自2022年11月以来，运营商一改过去十余年受移动互联网打压的颓势，股价走势开始逆转。截至3月17日的短短四个月，中国联通、中国电信股价累计涨幅分别达69%、85%，盘子大得多的中国移动也累计涨超五成。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分别于1997年、2002年在香港上市，中国联通则于2000年、2002年分别在港股、A股上市。但受OTT（Over The Top）冲击，互联网公司越过运营商发展各种视频及数据服务，运营商逐步沦为传统的"管道式基础设施"，业绩增长乏力，资本市场估值长期低迷。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分别于2021年的8月、12月回A股上市，皆需"绿鞋"（主承销商超额配售股份）机制护盘，但仍一度跌破发行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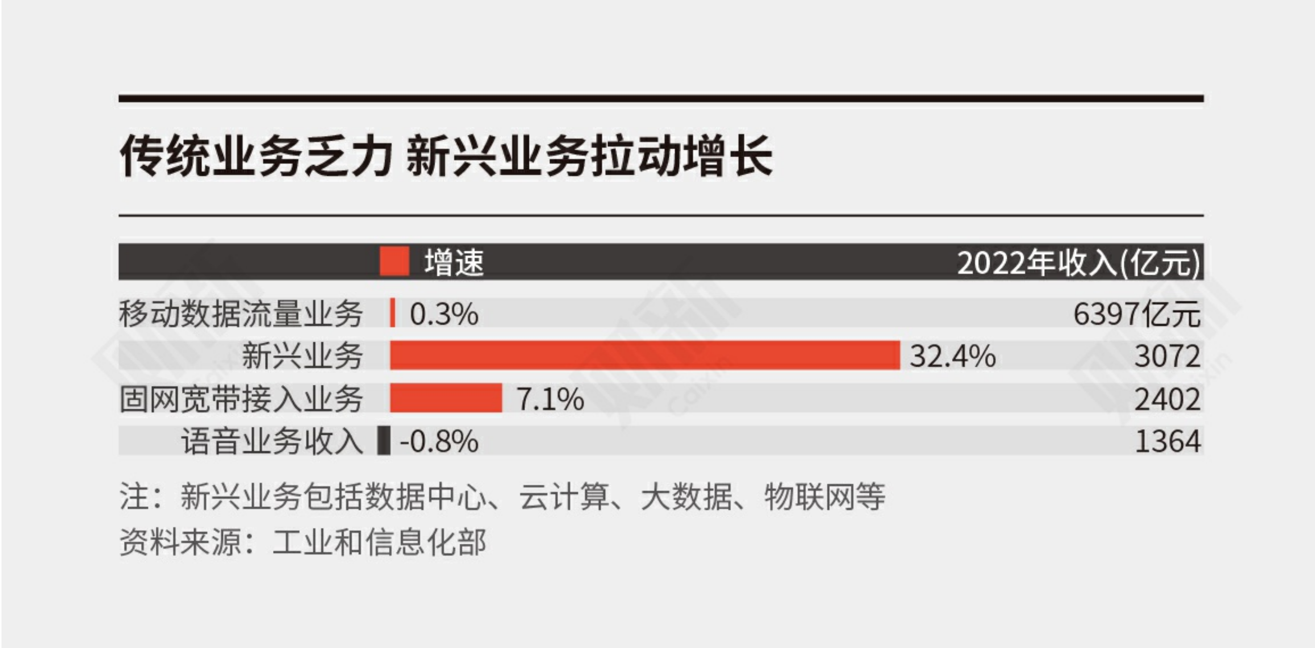
运营商股价大幅转涨，或是撬动了市场估值重塑。中国联通董事长刘烈宏在2022年11月底的三季度业绩说明会上表示，电信行业正在数字经济新赛道上全面升维，不能再简单套用延续了几十年的用户增长等老指标、老模型来评估电信行业的新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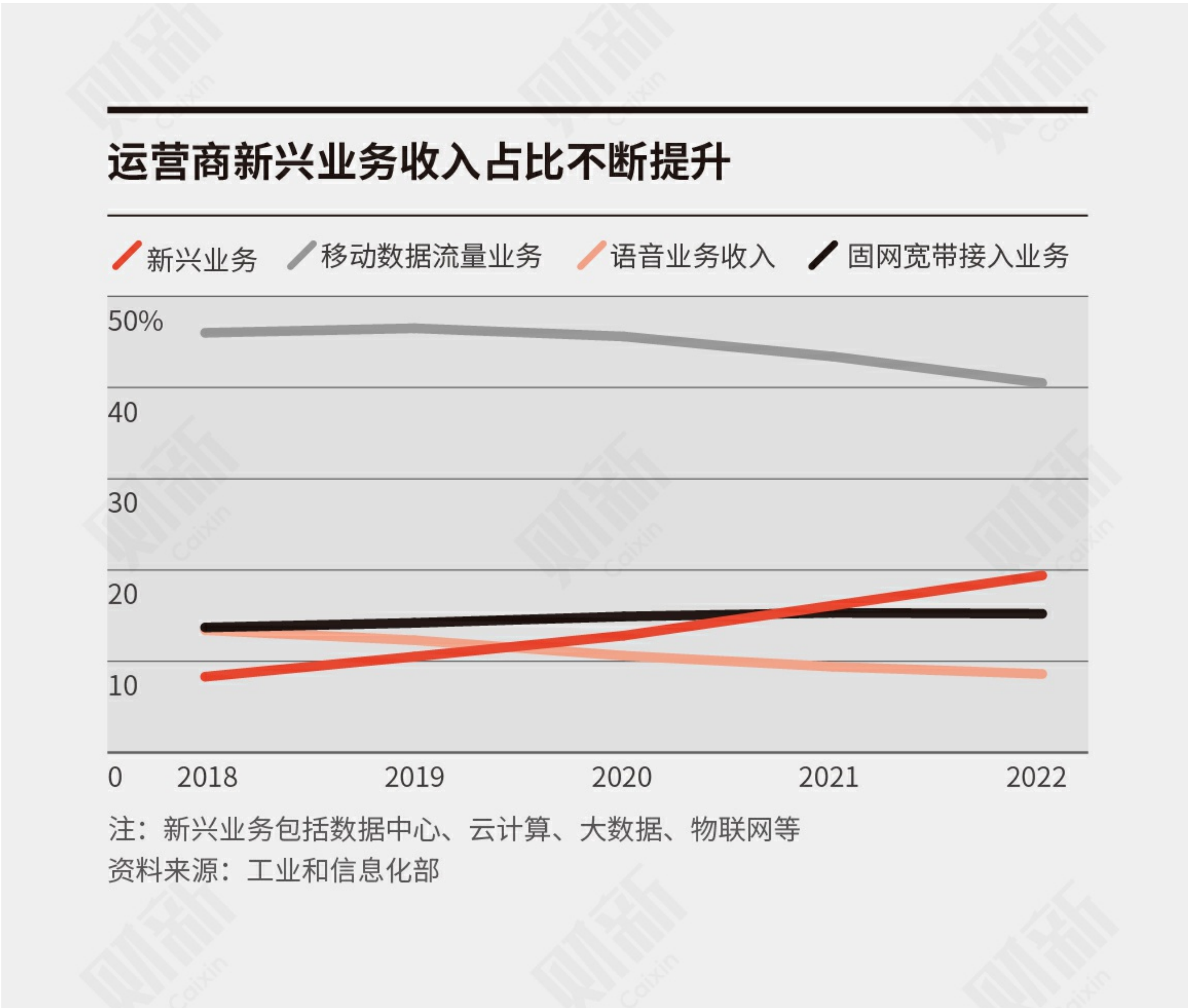
近年来，运营商试图摆脱纯"管道"角色，开始突出"科技创新、云网融合"等目标，全力发展云、数据中心、物联网等新兴业务，打造通信业务之外的"第二增长曲线"，要在数字经济大潮中分羹。

从当前运营商的业务结构来看，流量业务仍占主导地位。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2022年电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58万亿元，其中移动数据流量业务收入6397亿元，在电信业务总收入中占比40.5%；语音业务收入、固网宽带接入业务收入分别为1364亿元、2402亿元，总收入占比分别为15.2%、8.6%；包括数据中心、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在内的新兴业务共收入3072亿元，总收入占比19.4%，较2021年占比提升了3.3个百分点。

传统的流量收入增长曲线已近拉平。一名运营商人士对财新称："4G来的时候，运营商就希望依靠流量增长拉动收入。现在5G都来了，流量也确实增长了，但是收入却没怎么涨。"运营商更需要开辟新兴业务作为增长引擎。据工信部统计，2022年，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达2618亿GB，同比增长18.1%，移动数据流量业务收入同比仅微增0.3%；而新兴业务同比增速达到32.4%，拉动电信业务收入增长5.1个百分点。

云业务成为运营商新兴业务的主力军。2022年，运营商的云计算、数据中心、大数据、物联网业务收入增速分别达到118.2%、11.5%、58%和24.7%。其中中国联通云收入361亿元，同比增长超过121%。业内人士估算，2022年，三大运营商云业务收入合计将达1300亿元左右。





一名长期观察通信行业的A股券商分析师告诉财新，此前，市场重点考察的是运营商的传统业务。运营商是重资产，业务比较稳定，且其并非传统制造业，估值方式一般不按PE（市盈率），通常是PB（市净率）作参考，按EV/EBITDA（企业价值倍数）估值方式更好。但现在，云业务成为运营商估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机构甚至按3至4倍PS（市销率）给出估值。

浙商证券在3月6日发布的研报中提及，以4倍PS对运营商2022年的云业务进行估值，天翼云、移动云、联通云估值的合理区间分别为2232亿—2364亿元、1536亿—1688亿元、1304亿—1428亿元。

据财新了解，三大运营商正在发挥组织架构优势，集全员之力卖云。中国电信在内部要求云收入三年翻番；中国移动则提出到2025年云业务达到千亿规模的目标。运营商上云的背后是信创浪潮，政企市场的巨大需求裹挟其中，悄然改变了云市场供给方的势力对比。

2019年以后，几乎吃尽互联网红利的云市场开启2.0竞争，向传统政企市场寻求增量。“这几年，政府、头部企业是‘金主’，在安全、自主可控等要求下，具有国资背景的运营商明显更受青睐。”一名互联网云厂商的中层人士对财新称。多名省级运营商人士也认为，互联网厂商不具备政企业务基因，在客户关系、服务态度、运维能力等方面

都比不过运营商。

市场调研机构Omdia资深首席分析师杨光认为，在目前宏观形势下，运营商云业务前景光明，主要挑战在于自身技术和服务能力。亦有不少声音认为，相较互联网公司，运营商的技术积累以及投入都还是弱一些，且体制机制的一些瓶颈很难突破，在决策流程、市场竞争、人才引进等方面的灵活性恐不及民营公司，从而制约云业务发展。

云收入成为KPI

直到2019年，三大运营商中规模最大的云——中国电信旗下天翼云全年收入也只有71亿元。近两年来，中国电信前所未有地重视卖云。

一名中国电信集团公司人士向财新介绍称，中国电信力推"云改数转"战略、打造"云网一体"的算力网络。2021年，中国电信将云计算独立，整合上海、广州两大信息化研发中心，设立天翼云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天翼云公司"），注册资本40亿元。新近还引入了更多国资小股东加持。据财新数据，2023年2月24日，天翼云公司完成股权变更，注册资本由40亿元增至47.6399亿元，新增中国国新、中国电科、中国诚通、中国电子四名央企股东，中国电信集团持股降至83.96%。

天翼云公司集建设、研发、运营、生态合作和销售服务于一体，与各省电信进行结算，自负盈亏。一名天翼云省分公司人士向财新介绍称，其所在云中台有20余人，有从电信内部调过去的，也有新招聘的，"目前主要是提供解决方案及相关咨询，卖云主要还是靠政企部门大大小小的客户经理"。近两年，电信各省公司陆续成立云中台，与政企部门平级，负责为全省卖云提供智力支撑，并协同各方资源、落地云项目。天翼云省分公司与各省电信的云中台实际上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天翼云省分公司总经理一般由省电信总经理兼任。

一名天翼云前高管对财新感慨称，之前他每年都要花大量时间跑各省电信公司布道云业务，但现在各省电信总经理挂帅、举全员之力卖云，局势大为不同。上述天翼云省分公司人士亦称，尽管此前也会把云收入作为KPI（关键业绩指标），但约束力并不强，现在云收入是考核重点。

为加强总部销售职能、拓展外部行业市场，2022年10月，天翼云公司分立了央企、政府、要客、互联网金融等事业部。一名天翼云总部员工称，为避免与省级分公司订单冲突，天翼云针对这几个行业划定了白名单客户，白名单之外的项目需与省公司协同。

中国联通卖云体系与中国电信大致相似：在集团政企部门统筹下，各省政企部门负责云业务的销售工作，联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下称"联通数科"）负责产品能力供给、技术支撑等工作，同时也具备一定的销售职能。联通数科与各省公司按一定比例结算，自负盈亏。

相较天翼云公司专注做云，中国联通旗下的云服务主体联通数科，由联通云、大数据、物联网、安全、系统集成五大业务公司于2021年2月整合而成。一名联通数科内部人士对财新称，云是联通数科最大的事业部。相较天翼云、移动云，联通云的体量比较小，必须发挥一体化优势，即云、大数据、安全等业务互相借力、融合发展。

一名联通省公司中层人士告诉财新，现在，联通省公司都是"一、二把手"亲自抓新业务，从各地市到区县都在大力卖云。"所有的项目，我们都要求全面融云、上云，比如有的客户机房要扩容，我们会建议它不要再去扩建机房，直接用我们的云；比如智慧医疗、智慧教育、工业互联网等项目，底层能用云的都建议客户上云。"他直言，云是公司2023年重要的战略方向，资源都会向云倾斜。

中国移动的云业务直到2019年才正式对外提供服务。2019年以前，承载云业务的中国移动苏州研发中心（下称"苏研"）定位不清、方向不明，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什么都做，产品能力不强，难以撬动各省公司去卖云，只能以服务中国移动内部项目为主，在市场上未成气候。2019年，杨杰从中国电信调任中国移动董事长，考察苏研之后，提出"云改"战略。一名中国移动中层告诉财新，杨杰明确苏研以做云为主，并把苏研从利润中心调整为成本中心，形成了总部管总（统筹云业务规划）、各省主战（打市场抢订单）、苏研主建（提供云产品）的架构，带动云业务快速发展。

有运营商人士担忧，相较于天翼云、联通数科自负盈亏的机制，苏研作为成本中心不考核利润，不与一线"打粮食"挂钩，短期内确实有利于轻装上阵，但长此以往可能对市场敏锐度不够，产品迭代失速。上述中国移动中层则称，苏研作为成本中心只是移动云成长期的扶持政策，预计未来会根据情况适时调整。

目前，三家运营商为抢夺云订单均给出了不菲的折扣，尤其是中国联通，一些产品甚至能够打到四五折。一名河北电信的客户经理透露，政企客户经理卖云的销售激励要比卖传统专线高1倍；一名吉林电信的人士亦称，其卖云的销售激励约为10%，比传统业务激励高不少；上述联通省公司中层则透露，各地联通公司给出的云销售激励不同，一般在5%到15%之间。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省份，运营商为冲KPI，将云相关的配套业务收入也计入云收入。"比如，有项目需要专线连接到云资源池，我们就把它叫作'云专线'。"上述天翼云省分公司人士透露，"反正只要用到云的项目，我们都算是云的集成项目，做大云收入。"他保守估计，其所在省的云相关配套收入占比可能要超过云服务总收入的30%。

亦有运营商人士称，在一些项目落地过程中，会将硬件收入和云服务收入都算作云收入，比如卖摄像头200元，摄像头用到的云存储100元，最后计300元云收入。不过多名运营商人士均向财新解释称，云收入并没有造假，只是统计口径不同。三大运营商均未向财新正面回应关于云收入的统计口径问题。

合营转自研

运营商将云作为发力数字经济的抓手，希望将云掌握在自己手中，一方面加大研发投入做强自有云产品；一方面从销售端淡化合营云色彩，优先推荐自研云。

所谓"合营云"是指运营商与外部公司合作运营云服务。2016年前后，中国电信与华为开始合营云，由华为出服务器、操作系统及软件，运营商出机房、带宽等资源，联合建立云资源池，由运营商负责销售，获得的收入按一定比例分成。在不少市场人士眼里，合营的天翼云就等于是华为云。

不过，多名天翼云公司人士向财新证实，目前遇到新项目一定是主推自研云，与华为的合营云只是存量维护。"当然，一些与华为绑定的客户，比如华为卖某个行业解决方案，客户是华为打下来的，需要配合云平台，但客户又有国资背景要求，还是会上合营云。"一名天翼云总部人士称，其接触的新项目，90%都用的自研云。

上述天翼云前高管对财新称，华为与天翼云的蜜月期是2016、2017年。"当时，我每个月要给华为结算费用，眼睁睁看着那个数字非常快地涨上去，合作规模很大。"2017年后，华为开始走到台前、力推自有云服务，双方的合作就进入了维持状态。自2019年开始，天翼云越来越重视自研。

天翼云不过是利用华为的产品抢市场，争取时间窗口。上述天翼云前高管对财新介绍称，天翼云其实自2012年成立起一直有自研，但囿于运营商体制，且定编定岗，研发进展较慢。2016年，天翼云是个千人规模的公司，研发几百人，只能在局部做一些单点突破，产品线不成熟，因此选择借华为的产品打市场。但不管是合营云还是自研云，前端销售都以天翼云为品牌，提升了客户认知度；另一方面，中国电信的政企客户经理以前只会卖专线、卖卡，也需要给他们一段时间来学习和适应云市场。这几年，安全、自主可控是大方向，天翼自研云也相对成熟，于是从合营云切换到了自研云。

据中国电信官方信息，其从定制化芯片到整机、云操作系统、IaaS（基础设施即服务）计算存储网络、PaaS（平台即服务）中间件等全面实现自研。上述天翼云总部人士介绍称，天翼云产品更迭很快，2022年下半年4.0版本已全面测试、打磨完成，2023年将大规模推广。

之前因为混改与阿里云合作密切的中国联通，目前也强调自研云。2017年8月，中国联通引入阿里、腾讯、京东等股东，随后推出了基于阿里云、腾讯云产品和技术的沃云平台，主要面向中小型用户转售阿里、腾讯的云。彼时，联通希望通过开放合作，成为三家运营商中第一家打通跨云平台连接的公司。如今，这一战略已然转向。

"我们之前确实卖阿里云的情况会多一些。一是阿里云的产品种类比较多，客户对阿里云的认可度也比较高；二是联通云资源池相对匮乏。"上述联通省公司中层称，但自2022年开始，集团加大力度推进"一市一池"云资源建设，内部叫"骨干云池"，各省大力推联通自己的云。"很多之前从我们这里买阿里云的客户，到期后都会引导它们迁移到骨干云池。"

对不愿意迁移的客户，联通则力推与阿里的合营云。上述联通省公司中层介绍称，此类合营云使用阿里的技术，但云资源池是联通与阿里共同搭建、统一调度，相较以前纯转售合作更深入。整体而言，自研云在当前新增项目中占大头。

按联通2022年规划，到2023年6月，拟建成222个云资源池，覆盖206个城市，实现数字经济新三线城市全覆盖。据中国信通院定义，数字经济三线城市指数字经济发展开始起步，并初步进行部分领域规划建设的城市。上述联通省公司中层介绍称，2022年山东已经完成了任务，每个地级市都建了云资源池，但有的省市进度落后一些，还在建设当中。

相较联通、电信，中国移动最初就选择了以自研云为主的路线。2019年以前，移动云未直面市场，各省移动公司基于业务需要，会转售一些第三方云公司的服务。2019年云改之后，云收入开始纳入各省考核指标，自研的IaaS、PaaS产品销售收入成为重点的业绩考核对象。

中国移动也与华为有合营云。中国移动方面对此解释称，由于产品体系的完善需要较长时间的技术积累，所以刚开始移动云在IaaS+PaaS市场的排名较为靠后。为弥补这一缺陷，移动云一方面夯实技术能力、丰富产品体系；另一方面与华为云合作，弥补缺失的产品领域。移动云的市场份额已从2019年的排名第12位爬升至如今的第6位。

"现在我们基本上自己都能覆盖了，来自华为合营云的收入占比不到10%。"上述中国移动中层向财新透露。

据财新了解，中国移动目前已上线涵盖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完整板块的自研产品230余款。截至2022年11月，移动累计投产云服务器66万台，2022年上半年新增投产服务器同比增长300%，异构算力总量同比提升53%以上，GPU（图形处理器）/NPU（嵌入式神经网络处理器）、全栈专属云多样化算力布局初步形成。

杨光向财新分析称，三大运营商均以开源云平台OpenStack为基础自研操作系统，同时也关注安全、数据库等

核心能力，相对更侧重IaaS领域。在他看来，运营商在研发方面仍需持续投入和积累。市场亦普遍认为，当前，运营商自研云在高阶能力上与阿里云等头部厂商存在差距。

运营商也在发力补短板。以移动云为例，近期重点是研发CPU（中央处理器）及定制化服务器产品；中期则布局DPUASIC（数据中心芯片专用集成电路）芯片定制及国产化DPU（中央处理器分散处理单元）卡研发；长期目标是构建起芯片研发能力。

财新了解到，目前移动云研发人员超过1800人，研发团队规模是阿里云的20%、华为云的30%，2023年将新增扩招至2800人以上，2025年将扩招到6000人以上。天翼云也在2018年底获得特别的人才政策，可以突破中国电信既有薪酬体系招人，目前研发团队五六千人。联通云的研发团队相对较小，约千人规模。

政企大单撬动市场格局

国企之前上云的比例很低，近两年，一方面政府对数据重视度提升，国企对数据统一管理、利用的需求增加；另一方面，信创从党政领域向金融、电信、教育、电力、石油、交通等行业拓展，针对一些行业甚至提出了到2023年新增IT设施中信创比例达到30%的目标，刺激国企上云需求。

国资委鼓励国企上云。2022年7月24日，国资委副主任翁杰明出席"共铸国云智领未来"云生态大会，鼓励国资央企积极投身云体系建设，明确提出国资央企要做国家基础公有云的运营者，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开拓者，行业领域公有云建设运营的先行者，上云、用云的引领者。当日，在翁杰明见证下，国资监管云上线。

在这之前，不少地方"国资云"已先行先试。2020年9月，国资委下发《关于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及加快企业上云步伐。2020年10月，天津召开"国资云"建设座谈交流会，明确表示已将"国资云"建设列入正在制定中的天津市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计划。2021年4月，"四川国资云"发布，成为国内第一个国资企业专属云。之后，广东、河南、湖南等地亦纷纷上线了当地的"国资云"。

这些"国资云"大多是当地国企运营，背后大多是当地国资委。比如，运营广东"粤企云"的广东粤数网络建设有限公司，由广东省交易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广州易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广东恒电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各自持股85%、10%、5%，穿透股权后，最终由广东省国资委控股。

杨光认为，地方政府可能会指定地方国企作为地方国资云的经营者，但云业务的技术和资金门槛都较高，普通的地方国企完全承接有难度，底层技术平台一般需要与大型云服务商合作，这对运营商云来说是很好的机会。上述"粤企云"人士亦告诉财新，天翼云、移动云都是公司的技术服务商。

值得注意的是，整体来看，各地国资委当前并没有强制国企必须迁移到"国资云"，也没有指定国企必须用哪"朵"云。

一名"粤企云"内部人士告诉财新，公司是完全的市场化行为，参与市场竞争，"广东省国企可以选择我们，也可以不选我们，没有强制性要求"。不过，他介绍称，相较其他公有云，"粤企云"是国企专属云，有独立的计算、存储区域，对入驻客户也有安全门槛要求。"相当于你的每个邻居都安装了防盗门，减少了云内攻击的风险，提升了国企的安全标准。"目前，已有不少广东本地国企及教育机构上了"粤企云"。

当前，竞逐国企上云的厂商五花八门，包括三大运营商、阿里、华为、浪潮、中国电子、东软等，也包括一些有资源的本地云服务商。上述天翼云省分公司人士称，天翼云在省内与国企一家家谈，很多国企偏向运营商或华为，但也有不少国企对技术要求高，看重阿里、腾讯等互联网厂商。

运营商在技术能力上仍需追赶，其关键优势是底层资源和本地化服务。三大运营商具备遍布全国的传输网络，掌握全国60%以上的IDC（数据中心）机房，阿里云、腾讯云等此前就要向运营商租机房、买带宽。随着"东数西算""数字中国"等政策推动，三大运营商还将继续加大数据中心建设，强化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地位。这意味着，运营商通过"云网融合"可以更好地降低云业务成本。另一方面，三大运营商的政企客户经理数以万计，下沉到区县，能第一时间响应客户需求，"出了问题能找到人"。

而互联网公司的优势在于丰富的产品和应用生态，劣势是缺少本地化服务体系，且话语体系、工作风格往往与国企不同。此外，互联网公司重视标准化、规模化，对定制化要求配合度相对低，成本端更为敏感。一名参与智慧城市项目的运营商人士直言，互联网公司缺乏政企市场基因，比如项目还没签，甲方要求过来20个人先配合工作，互联网公司肯定不能理解，"但你不干，现在有的是人干"。

从公开招投标信息看，运营商正越来越多地成为政企数字化项目的总包商。财新查阅企查查招投标系统发现，2022年2月至2023年2月，招标金额在1亿元以上的政企数字化项目中，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华为的中标数分别为28个、24个、9个、11个，而阿里云和腾讯云分别仅中标3个、1个。运营商尤其在三四线城市的"雪亮工程""智慧警务"等项目招标中表现抢眼。

伴随着大量的国企和央企大单，云市场格局快速变化。市场研究机构IDC数据显示，2022年上半年，阿里云在中国公有云IaaS市场的份额保持第一，但已从2021年上半年的38.6%降至2022年上半年的34.5%；华为云第二，市场占有率为11.6%；中国电信天翼云的市场份额从9.6%增加至11%，超越腾讯云的10.3%，成为第三。阿里最新发布的

季报显示，2022年四季度云营收201.79亿元，同比仅增长3%。这是阿里云近年来最低的季度收入增速，2021年四季度的收入增速为20%。

对于政企客户，阿里云和腾讯云正在推动“被集成战略”——与国企云合作，将自己的产品和服务打包进去。腾讯云与智慧产业事业群CEO汤道生在2022年11月底的腾讯数字生态大会上表示，过去腾讯云做总集成商，很多是转售收入，虽然收到100元，但可能90元要支付给第三方产品的合作伙伴，利润率相对小，甚至管理不好的项目会有负毛利。但集成模式定价清晰、利润率更好。

腾讯已将运营商视为一个独立的、需要深耕的行业来拓展。2022年6月，腾讯云成立智慧运营商部门，既向运营商提供企业邮箱、服务器等产品，又与运营商联合起来向客户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该部门负责人为腾讯云副总裁沈可，此前曾任上海联通副总经理、中国联通云数据公司总经理。

不少运营商人士已经感受到市场格局在快速变化。一名移动北方省公司人士告诉财新，在政企市场，前几年都是互联网厂商冲在前头、打标杆，但这两年互联网厂商甚至华为都在后退，“现在往往是我们冲在前头拿订单，它们给我们做支撑”。

上述互联网云厂商人士认为，互联网公司与运营商是竞合关系。在业务侧，双方的竞争更多体现在IaaS层，在PaaS、SaaS层有很多合作机会。不过，在一些项目落地过程中，运营商会要求互联网公司交代码，使得合作备受挑战。▫

孙嫣然、顾昭玮对此文亦有贡献

版面编辑：吴秋晗

最新财新周刊｜美日荷博弈对华出口管制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3月20日第11期

经贸科技问题被进一步政治化，美国拉拢半导体产业链国家加码对华出口管制，荷兰跟进，日本踟蹰



2021年上海进博会上的阿斯麦展台。全球各国都在思考如何减少对特定国家的过度依赖，力求强化本国供应链的韧性。

文丨财新周刊 杜知航 刘沛林 钱童

3月8日，荷兰外贸和发展合作部部长Liesje Schreinemacher给荷兰众议院主席写信，称有必要扩大对特定半导体生产设备的现有出口管制，目标是在2023年夏季之前公布半导体先进生产设备出口的部级法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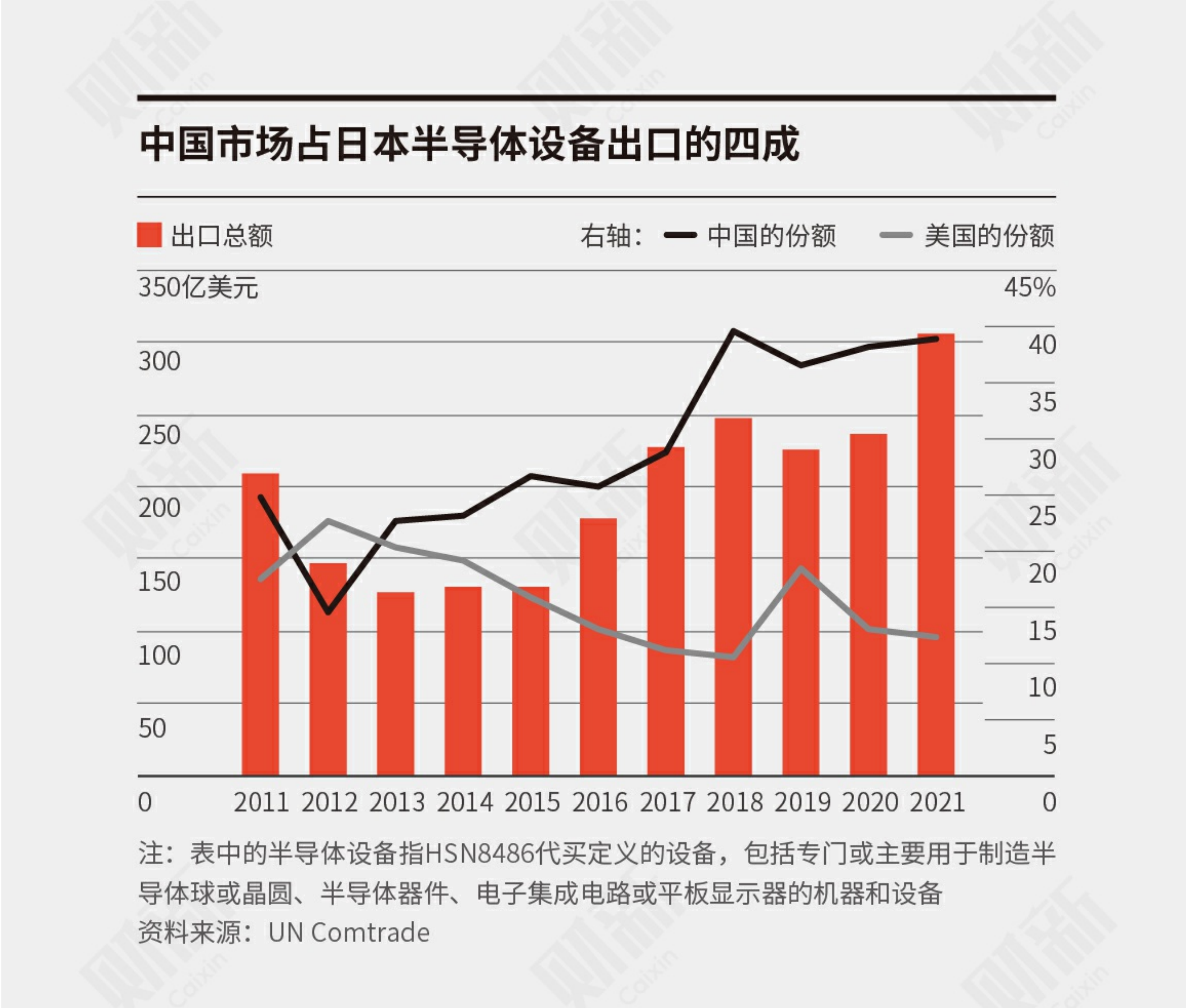
对已受到美国芯片和制造设备严格管制的中国半导体产业来说，荷兰的动作无疑雪上加霜。若要生产先进芯片，必须使用光刻机，而荷兰的阿斯麦（ASML）是世界上惟一一家能生产最先进的极紫外线光刻机（EUV）的公司。2018年，美国政府成功游说荷兰政府禁止阿斯麦对华出口EUV。此后，中国产业界寄望于比EUV稍落后的深紫外光刻机（DUV）。但此次荷兰升级出口管制，连部分高端DUV也将纳入管制名单。

3月9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对荷方以行政手段干预限制中荷企业正常经贸往来的行为表示不满，已向荷方提出交涉，并坚决反对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武器化。

全球范围内，只有两家公司能提供DUV，一家是阿斯麦，另一家则是日本尼康。除给荷兰施压，美国亦希望联合日本实现对中国半导体行业的进一步封锁。2023年1月，美国总统拜登分别会见日本、荷兰首相，建议联手加强对先进科技的出口管制，白宫官员还组织三方会议谈判管制细节。

谈判很快推进。阿斯麦于1月29日向财新证实，美、日、荷政府就达成一项侧重先进制程芯片制造技术的协议有最新进展，其中将包括但不限于先进制程的光刻系统。到3月8日，荷兰政府公开确认上述出口管制计划。

荷兰最终跟从美国的做法，基本在中国市场的预期内；但日本目前尚未“官宣”出口管制措施。日本半导体市场“山雨欲来风满楼”，传言日本不仅将限制出口光刻机设备，还将限制对华售卖先进芯片制造中的关键耗材——光刻胶。这使得中国投资者争相寻找国内替代企业，A股光刻胶概念股一时大火。然而，光刻胶国产道阻且长。据中泰证券，中国光刻胶国产化率仅10%，且集中在较落后产线，用于65纳米以下的更先进芯片生产的光刻胶基本没有量产。



据财新了解，日本在对华出口管制上较犹豫。一方面，中日经贸往来密切，日本对华经济依存度深。若日本对华出口管制，中国可能会有力回击。日本产业界也在密切关注中国的反外国制裁法和出口管制，在近期北京召开的"2023年出口管制合规论坛"上，出现了不少日本企业和机构的身影。另一方面，日本企业受美国牵制较小。日本东京一名中日经贸研究人士对财新分析称，不像荷兰光刻机，日本的原材料和设备中的美国技术含量较低，受美国长臂管辖的威胁更小，因此美国与日本谈判出口管制时的砝码也更小。

荷兰态度骤变

市场对荷兰最终向美国妥协并不意外。2018年，阿斯麦最先进的EUV收到了来自中国的第一个订单，美国就此开始对荷兰政府游说，最终阻止了阿斯麦向中芯国际出货。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官员当时花了几个月时间研究如何阻止阿斯麦向中国出售EUV，并与荷兰官员举行了至少四轮会谈。报道还援引一名前美国政府官员称，2018年7月荷兰首相马克·吕特（Mark Rutte）在访美期间收到了一份中国获得阿斯麦技术潜在后果的情报报告，此后荷兰政府决定不再续签阿斯麦对该客户的EUV出口许可，该设备也从未发货。

EUV是目前全球最先进的光刻机。以光源波长划分，光刻机分为UV（紫外线）、DUV（深紫外线）、EUV（极紫外线），波长越短分辨率越高，量产条件下，7纳米及以下的先进芯片制程工艺只能通过EUV实现。

2018年，中国的晶圆代工还处在向14纳米制程量产突破的关键期，荷兰禁售EUV后，中国产业界寄望于部分较

先进的DUV产品——即浸润式光刻机（ArFi）——通过工艺研发实现14纳米甚至更先进的制程。目前，在DUV产品上，阿斯麦也处于垄断地位。2021年ArFi产品出货量为81台，而尼康在截至2021年3月31日的财年内，ArFi产品出货量仅3台。

2022年10月7日，美国出台半导体出口管制新规，对半导体行业美国籍人员在中国的工作作出限制，阿斯麦也不得不要求美国员工停止为中国晶圆厂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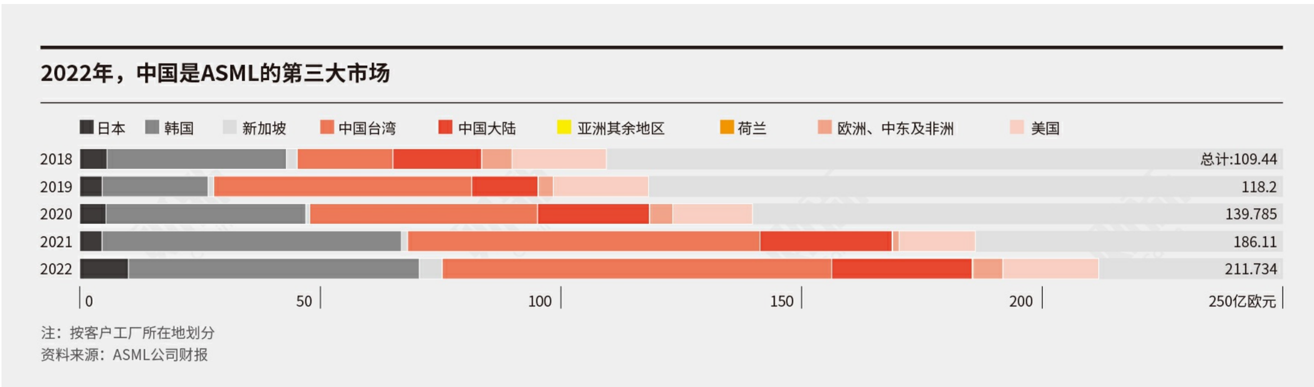
同期，美国新一轮游说开启，但一开始效果不彰。Liesje Schreinemacher曾表态称："商业利益和国家安全一样重要，如果和美国谈判的结果是放弃DUV，那状况会更糟。"她当时还表示"中国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伙伴"。而阿斯麦首席执行官温彼得（Peter Wennink）接受荷兰当地报纸NRC Handelsblad采访时也颇多怨言，称阿斯麦已经作出了牺牲，在美国压力下限制了EUV出口。

然而，2023年1月17日，荷兰首相马克·吕特访美成了本轮管制的转折点。

根据白宫公布的纪要，拜登在会谈前声称双方将共同建设"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以应对中国的挑战。吕特在会前并没有与之呼应的表态，这让市场一度认为美、荷对中国半导体出口限制问题将不会取得进展。

1月25日，温彼得接受彭博社采访时仍然不愿加入管制同盟。他指出，美国主导的出口管制将最终导致中国发展起自己的半导体设备。"如果得不到这些设备，他们就会自主研发，这可能需要时间，但他们最后一定能做到。增加压力只会迫使他们加大投入。"温彼得还警告，出口管制将会阻挠效率和创新，"将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

中国大陆是阿斯麦第三大市场，2022年为阿斯麦贡献了29.16亿欧元的收入，占总营收的13.8%。中国台湾、韩国、美国、日本2022年贡献的营收占比分别为38.2%、28.6%、9.4%、4.8%。



然而四天后，阿斯麦不得不接受政治谈判的结果。阿斯麦在1月29日发给财新的声明中称，在协议正式生效前，还需进一步细化相关具体内容并付诸立法，仍需一定时间；预计这些措施不会对公司2023年的业绩预期产生实质性影响。

在"瓦森纳协定"或美国国内出口管制条例等框架下，荷兰的光刻机出口并不受管辖，但由于光刻机零部件来自全球各地，美国可利用供应链给阿斯麦施压。根据阿斯麦官网，其光刻机产品供应链包括全球各地的5000家供应商，其中荷兰供应商有1500家，北美、亚洲供应商各有1400家，欧洲其他地区的供应商有700家。以采购金额来看，2022年阿斯麦采购自北美地区的光刻机组件金额占到了总采购金额的13%，光源、光栅等光学元件严重依赖美系供应商。

事实上，阿斯麦能在2009年击败此前独霸天下的尼康、佳能，靠的就是美国协助研发的EUV技术。上世纪90年代，英特尔为了促进光刻技术发展，联合政府成立了EUV技术联盟，美国三大国家实验室——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桑迪亚国家实验室和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均是该联盟成员。起初英特尔邀请了包括尼康、阿斯麦等光刻机公司加入，但因美国政府不希望外国公司分享最前沿的技术，尼康未能进入该联盟。但阿斯麦在美国展开了强力游说，最终同意由阿斯麦出资在美国建工厂和研发中心，并承诺55%的原材料都从美国进口，最终才得以进入联盟。

在EUV技术联盟研究成果的加持下，阿斯麦在2010年研制出EUV工程样机，并随后产品化迅速占领市场；尼康则因错过EUV而被甩在后面。2000年，尼康光刻机市占率超过七成，2009年就被阿斯麦超越。

由于光刻机研发成本巨大，阿斯麦在财务上允许大客户对其进行少数股权投资，2012年，英特尔、台积电、三星三家，总投资38.5亿欧元获得了阿斯麦23%的股份，并提供13.8亿欧元用于EUV研发并享受优先供货权，成功构筑了利益共同体。

Liesje Schreinemacher称："额外的管制措施将是尽可能精准（外科手术式），以防止价值链造成不必要的破坏。"尽管她未在信中提到中国，但目前阿斯麦的客户中只有中国被出口管制所针对，"额外"一词显然意有所指。阿斯麦也在3月8日称，未来将需要为DUV中最先进的浸润式光刻机申请出口许可，尽管尚未获得荷兰政府关于"最先进"的定义，但阿斯麦预计，限制令会包括2020年推出的TWINSCAN NXT：2000i及之后的型号，即阿斯麦内部定义的"关键浸润式DUV"（Critical Immersion）。

这也意味着，若出口管制最终如阿斯麦所料，中国晶圆厂未来只能获得NXT：1980Di及后续产品，那中国芯片

制程探索将停在7纳米制程之上。“过去美国不觉得DUV与中国有关，现在是只要发现你能拿这个设备做出来接近先进制程的产品，他都要给你卡住。”一名半导体行业人士说。

他还指出，光刻机的型号不同，在生产中并不完全是“0”和“1”的区别。他认为，中国在谈论芯片制程时，往往过于强调光刻机的重要性，但一条先进制程产线的诞生有赖于半导体设备、材料、工艺等全套流程，中国晶圆厂在其他环节同样存在较大差距。

不过目前荷兰政府尚未公布半导体出口管制的具体措施，包括哪些光刻机型号、阿斯麦能否为已售出的光刻机继续提供服务等细节仍未知。“光刻机十分依赖原厂支持，一年维护费用要占到机器采购价格的十分之一，能否有原厂服务和买不买得到一样重要。”上述行业人士说。

日本尚无定论

荷兰在美国压力下就范，日本方面目前尚未明确态度，但中国市场对其最终作何决定并不乐观。

2020年1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公布出口管制清单，光刻胶的大类抗蚀剂已被列入。“从权限来看，日本政府是有能力限制光刻胶出口的。”日中经济协会常务理事高见泽学告诉财新，但基于中国市场的潜力，日本企业出于经济利益考虑不可能立刻离开中国。

日本企业再度被置于地缘政治的夹缝中，“平衡”成为日本政企两端的共同目标。“政府决定管制出口，企业自然只能遵从。不过从过往历史来看，企业是可能要求政府在政策调整上留有余地的。”高见泽学称。

中国之前，日本已经对韩国半导体实施出口管制。2018年10月，韩国最高法院发布判决，裁定日本对“二战”时强制劳动的劳工及其亲属进行赔偿，日韩关系因此一时紧张。作为反击，日本在2019年7月发布限制令，限制氟化氢、聚酰亚胺氟化物、EUV抗蚀剂三种材料的对韩出口。2019年9月，韩国就日本半导体限制令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提起诉讼。近期日韩半导体贸易出现转机。3月6日，日本宣布“两国政府正加快协商，洽谈取消出口管制一事，以将日韩光刻胶出口恢复到2019年7月之前的情况”。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李昌洋也表示：“两国的会谈非常密切，出口限制问题也在解决当中。一旦韩日产业合作得以继续，有望构建更稳固的供应链体系，减少企业的不确定性。”

高见泽学认为，即使在取消出口管制前，日本半导体也并非对韩国关上大门。政府限制了对韩光刻胶出口，却又在同年12月宣布简化光刻胶的对韩出口手续。“放宽出口的具体原因尚不清楚，但不难想见是因为日本半导体行业对限制出口的反对声音强烈。鉴于中国是日本最大的半导体设备出口市场，限制对华出口将产生（比限制出口韩国）更大的影响。”

据日本半导体制造设备协会（SEAJ）统计，2021年度，日本半导体制造设备的销售额为3.443万亿日元（约299亿美元），其中对中国出口同比增加57%，达到9924亿日元，约占整体的三成，在各贸易国中也居首位。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研究人员给出的出口占比甚至更高。该机构亚洲经济研究所主任研究员丁可向财新指出，按海关HS8486编号划定的半导体设备计算，以出口额计，中国市场在2021年占到日本整体出口市场的40%，而美国只占15%。

在半导体生态中，日本企业在全球也掌握诸多生产环节的绝对话语权。丁可称，比如在光刻胶涂布设备、热处理设备、单晶圆清洗设备和批量清洗设备领域，日本企业的全球市占率超过了70%。

据中泰证券，光刻胶目前国产化率仅10%，中国量产的光刻胶仅能满足150纳米的芯片制造，属于较落后制程；用于65纳米以下的ArF光刻胶大多处于研发或送样阶段；用于3—7纳米先进芯片的EUV光刻胶尚处于早期研发阶段；甚至光刻胶的原料——树脂也几乎由海外垄断，这一领域的大厂信越化学、东洋合成、住友电木和三菱化学来自日本，杜邦来自美国。

市场担心日本一旦限制对华出口半导体，其力度将对齐美国。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电子信息产业部部长吉池直樹向财新指出，2022年10月，美国政府对华先进半导体产业发起全面出口管制，此后一些美国技术人员撤离中国企业。“日本政府迄今尚未正式公布在该领域对华出口管制的具体措施。但此次的出口管制有别于之前日本对韩国的出口管制，面临的国际形势更为复杂，日本政府会否采取更严苛的措施，我们也非常关注。”

目前，要影响日本政府的对华出口管制政策，尚有多重斡旋空间。前述中日经贸研究人士表示，相比荷兰企业，日本企业在光刻胶等原材料领域自主研发的独立性更高，更少用到美国技术，受美国长臂管辖的可能性更低。此外，日本企业也可能改变生产策略，在中国设厂以避开出口限制。他举例称，2019年日本对韩国半导体出口管制时，日本企业随机应变，比如住友化学就在韩国建厂生产ArF光刻胶；东京应化扩大了在韩国仁川的工厂，光刻胶产能翻番；韩国半导体企业SK Hynix的日本供应商大金工业与韩国设备供应商成立合资企业，在韩国投资40亿日元建立工厂。

通过子公司扩大产能来弥补出口渠道不畅，是日本半导体企业普遍选择的可行办法。从光刻机市场来看，中国已成为佳能和尼康光刻机的最大买家。高见泽学认为，从企业侧来看，应该对政府出台管制措施有应对举措。比如佳能、尼康可以通过中国子公司扩大供给的方式，来将政府管制的影响降到最低。

既然日本企业可以来中国寻求发展机会，那么，中国企业也可以到日本去寻找商机。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北京代

表处投资总监金京浩向财新指出，在“脱钩”风险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已有一些中国企业主动登陆日本，借助日本的全球供应链优势和各类经贸协定基础，拓展投资合作的可能性。

前述中日经贸研究人士称，在对华出口管制的态度上，目前日本政府内部也有分化。出口管制主要由日本外务省和经济产业省主导，负责日本经济政策的经济产业省可能更加支持出口管制，因其正在支持本土的先进半导体生产，例如引入台积电在熊本建设生产基地；而负责外交事务的外务省，可能偏向于不要把出口管制做得太严，以损伤中日关系。

美国的博弈筹码

美国“拉帮结派”围堵中国的策略已有时日，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时期，白宫试图封禁TikTok和微信时，华盛顿政策圈彼时就有“小院子、高栅栏”（Small yard，High fence）联盟限制中国先进科技的说法。

拜登上任后，“小院子、高栅栏”策略进一步融入白宫和国会的政策制定中。2022年6月，美国国会推出的“两党创新法案”进入最终讨论阶段，法案讨论建立“多边出口管制协调委员会”（CoCom），专门协调美国和欧盟的政策，限制对中国的敏感技术出口。不过，由于美国国会两党对法案中环保相关等内容意见不一，最终“两党创新法案”未能通过。

“两党创新法案”失败，作为替代，“2022年芯片和科技法案”很快在两个月后落地，该法案推出总值2800亿美元的产业补贴，其中527亿美元用于鼓励芯片生产和研发。法案暗藏了对华半导体投资的排斥条约，特别提及中国，要求受补贴实体如与中国等“受关注的国外实体”有实质性半导体产能扩大的重要交易计划（成熟制程除外），须向美国商务部通报，美国商务部有权收回补贴。

上述机制实质上要求芯片企业在中美间“二选一”。美国资产管理公司联博集团研报指出，受补贴的企业可能被视为站在美国一边、在政治上对立中国。企业将必须权衡补贴带来的好处与中国市场的商业价值。

2022年10月，美国政府发布139页的出口管制新规，实施长臂管辖，即“外国直接产品规则”（FDP），使用了美国《出口管理条例》（EAR）管控的软件和技术直接生产的产品，即使不在美国生产，也需要获得美国的许可。“外国直接产品规则”对荷兰阿斯麦等使用美国技术进行生产的公司产生直接威胁——如果要出口相关先进半导体设备到中国，美国就会切断对阿斯麦的技术供应。

推进本土出口管制的同时，拜登政府将视线转向海外。2022年中，韩国当地媒体陆续传出消息，美国试图拉拢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组成名为“Chip 4”的联盟，形成“供应链闭环”，将中国大陆排除在外。美国精于设备和设计，日本以设备和材料见长，韩国在存储和制造领域强势，中国台湾更是在制造领域无可替代。一旦“Chip 4”成形，中国大陆半导体产业将从材料、设备到设计、制造、封测全面受限，几乎只能依靠自身力量从头再来。

2022年10月，美国商务部（BIS）与韩国贸易、工业和能源部（MOTIE）成立美韩双重用途出口管制工作小组。美国商务部称，工作小组名为“美韩供应链和商业对话双重用途出口管制小组”，小组任务是确定双方将考虑采取的具体行动，促进出口管制合作。

让日企放弃中国市场，美国的谈判砝码并不大。前述中日经贸研究人士指出，美国政府不大可能为了补偿日企损失，而让美企扩大对日订单。不过美国在扩大本土制造，美资半导体厂商订单增多，可能一定程度上扩大对日采购。但一旦真的实施管制，日本不仅将丢掉中国买家，还将失去外资半导体企业和很多日本在中国的企业客户。

美国对日本大打合作牌，通过先进半导体研发合作，以加深供应链依赖度。日本经济产业省2022年11月公告，日本在2022年内，学习美国的国家半导体科技中心（NSTC），建立日本的最尖端半导体技术中心（LSTC：Leading-edge Semiconductor Technology Center），进行芯片的尖端设计、尖端设备和材料的技术研发。

日本将建立一家名为Rapidus的公司，与LSTC合作，作为将来的量产基地。LSTC与Rapidus将和NSTC、美国信息技术公司IBM、比利时微电子研究中心（IMEC）在内的“志同道合”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和机构合作。

目前，在美国挑起的技术“脱钩”和选边站队中，一些在华日企开始调整架构以应对风险。多名了解在华日企的人士称，一些大型日企已将业务和团队分为面向中国和非面向中国两种。有的日本厂商将工厂和产线从中国转回日本或转到东南亚。

吉池直樹认为，部分日本企业在公司内部区分中国业务和非中国业务的做法早已有之，特别是在华业务销售额占比较高的日本企业，早早就在中国设立单独的研发团队，研发针对中国市场的产品，这符合本地化的需求。不过，全球化大背景下，陆续发生新冠疫情导致的断供、俄乌冲突、疫情封控等系列事件，也加深了各国对本国供应链安全的担忧，各国确实都在思考如何减少对单一国家的过度依赖，力求强化本国供应链的韧性。

吉池直樹表示，平衡“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的关系，是任何国家和企业都需要思考的问题。他强调，中日经济完全脱钩，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面对中国企业全方位的追赶，相比考虑如何应对“脱钩”，日本企业应该下更多功夫关注自身的技术发展。□

陈立雄对此文亦有贡献

专栏｜研发费用的两面性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3月20日第11期

过分依赖企业研发投入作为投资判断，容易误入歧途



2023年3月6日，贵州遵义，新蒲经开区一家视窗触控玻璃面板研发、生产企业车间。图：视觉中国

文丨杨庆宏
资深华尔街投资人

随着国内对自主创新的不断鼓励，一些投资人很关注企业研发费用占收入的百分比，而企业也很喜欢用此佐证自身技术含量。从统计角度看，企业整体研发占比与其科技含量有一定正相关性，有些投资人甚至用企业市值和研发投入之比作为企业估值工具（PRR）。但在看待一家具体企业时，这种相关性就不太明显了。

笔者近期碰到一家热门工业制造企业，行业排名前五，一大卖点就是研发占比同业第一，因此科技含量高，应该得到高估值。但该企业过去几年的销售增长仅为行业均值，也未提及未来新产品推出计划，且其毛利率明显低于行业龙头。从公司历史业绩及融资后的未来预期，都看不到任何高于行业研发投入相应的成果。实际上，该企业实际情况可能与其标榜的正好相反：研发能力弱、效率低，因此投入多、产出少，高额研发费用勉强维持行业销售均值和略低的毛利水平。这样的企业，在全行业高速发展期可以分羹，一旦发展放缓或停滞、竞争加剧，往往是率先倒下的那一个。如此看来，高于行业均值的研发费用是它的预警，而非亮点。

“研发”顾名思义就是技术研究和产品开发，企业研发的结果往往是推出新产品或改进原有产品性能质量。低效研发的问题最早引起市场重视，源于美国医药行业，新药竞争促使很多大型药企大规模投入研发，一款新药的研发成本动辄超10亿美元。然而美国药企的研发效率不断降低，平均每10亿美元研发投入产生的获批上市新药数量，从1960年的约60个，下降到2020年的不到1个。大型药企的激进投入并没有产出足够的新药以应对已有药物专利到期的挑战，反而耗损了企业利润。美国医药行业的这一现象，触发了市场对研发效率的反思，产生了大量学术研究。人们发现，FIPCo（全产业链的医药企业）也许不是最有效的选择，因而后来诞生了各种提高研发效率的商业模式，包括并购精专小药企和CRO模式（基于专业外包原则的合同研究组织）。

研发按周期一般分早期和晚期，早期侧重基础研究，晚期侧重应用研究和产品开发。外界评估研发水平时，对早期研发往往用学术论文发表数量，相关获奖级别和数量等；对晚期研发则用获得专利数、新产品数量等。部分投资人喜欢用专利数量、高学历高职称人员构成等二阶数据，来衡量企业的研发效率和技术能力。但这些指标并非研发效率的直接反映，譬如专利是企业申请的结果，而不能完全代表其真实研究水平，相当多企业把核心技术作为商业机密，根本不申请专利。

从投资角度衡量企业的研发效率，还是要基于业绩。研发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从研发效率来讲，达到同样的业绩，研发费用投入越少，说明其效率越高。简单地说，就是要衡量企业每一元钱的研发投入能带来多少钱的回报。从企业报表上来看，研发的贡献需要体现到两个方面：销售的增长和毛利率的提高。

投资界有一个常用方法来衡量研发的有效性（RORC）：用当年毛利润除以前一年的研发费用，从而算出单位研发费用对应的下一年公司的毛利回报。这个方法看似简单，但涵盖了上述评判企业研发效率要关注的三个角度：销售、毛利率和研发周期。如果研发结果是向市场投放了新产品，那么应该看到企业销售的增长；如果研发是提升已有产品，应该带来毛利率增长；而研发周期也是重要维度，可以去研究标的企业的运营历史，连续看几年的RORC，可反映出企业研发效率的变化。例如Meta过去三年的RORC分别为5.1、5.1 和 3.7，明确显示出研发效率的降低，而2022年业绩首次出现负增长，毛利率同比降低，研发费用却同比增长超过40%，公司数字货币项目告败，元宇宙项目亏损扩大。数月来，Meta股价持续走跌，继解雇1.1万人后，3月14日又宣布将裁员万人，并关闭约5000

个尚未招聘的职位。

版面编辑：吴秋晗

摄影/撰稿 | 财新周刊 陈亮

外贸下滑空箱堆港，集装箱卡车运输产业链上的人们生计堪忧

“49台车就是49个司机，今天只有22个集装箱要拉。” 宁波天旭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的豆中旭闲在一张破了边的老板椅上晒太阳。本该忙碌的日子，却有一半车在“趴窝” ，这让他感到沮丧。让谁吃饭、不让谁吃饭，成了物流老板每天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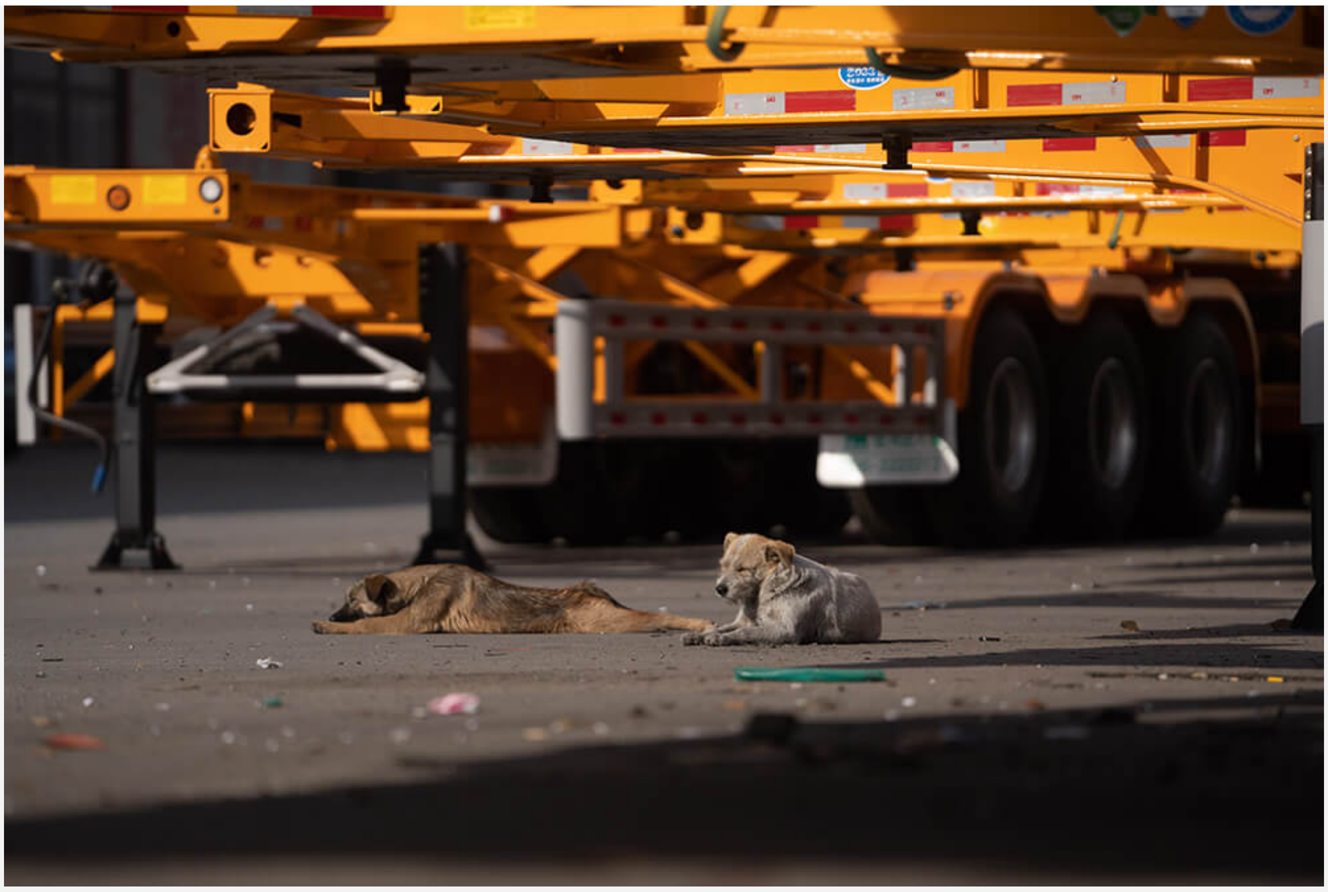
卡车销售市场，豆中旭闲在一张破了边的老板椅上晒太阳。司机多活儿少，是他最近每天面临的问题。



卡车销售市场，闲来无事的赵治田在一台二手集卡上养起了鸽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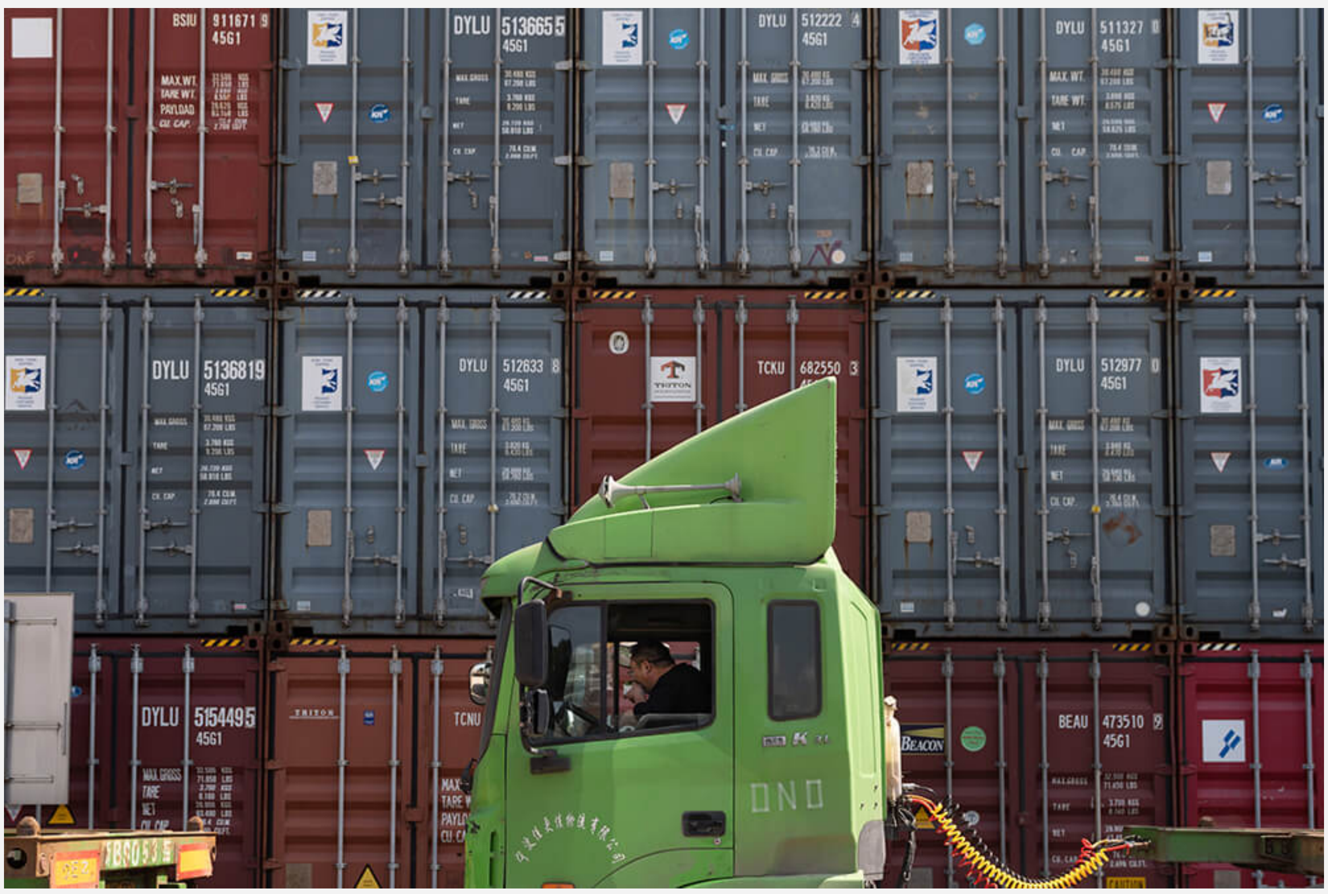


卡车销售市场，黄青山的店内生意冷清，茶台上富贵竹已经枯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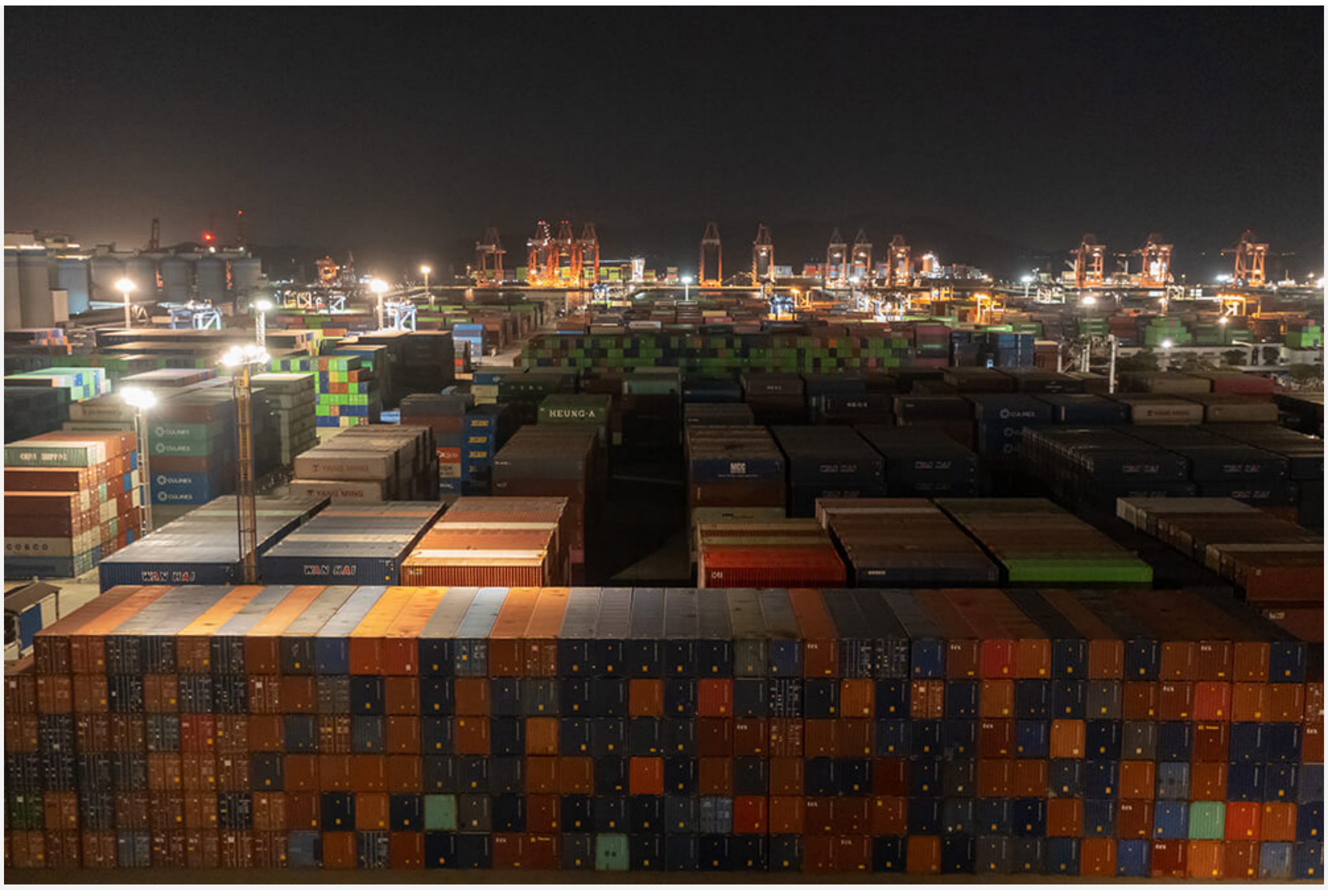


卡车销售市场，3月本应人流如织，如今门可罗雀，流浪狗聚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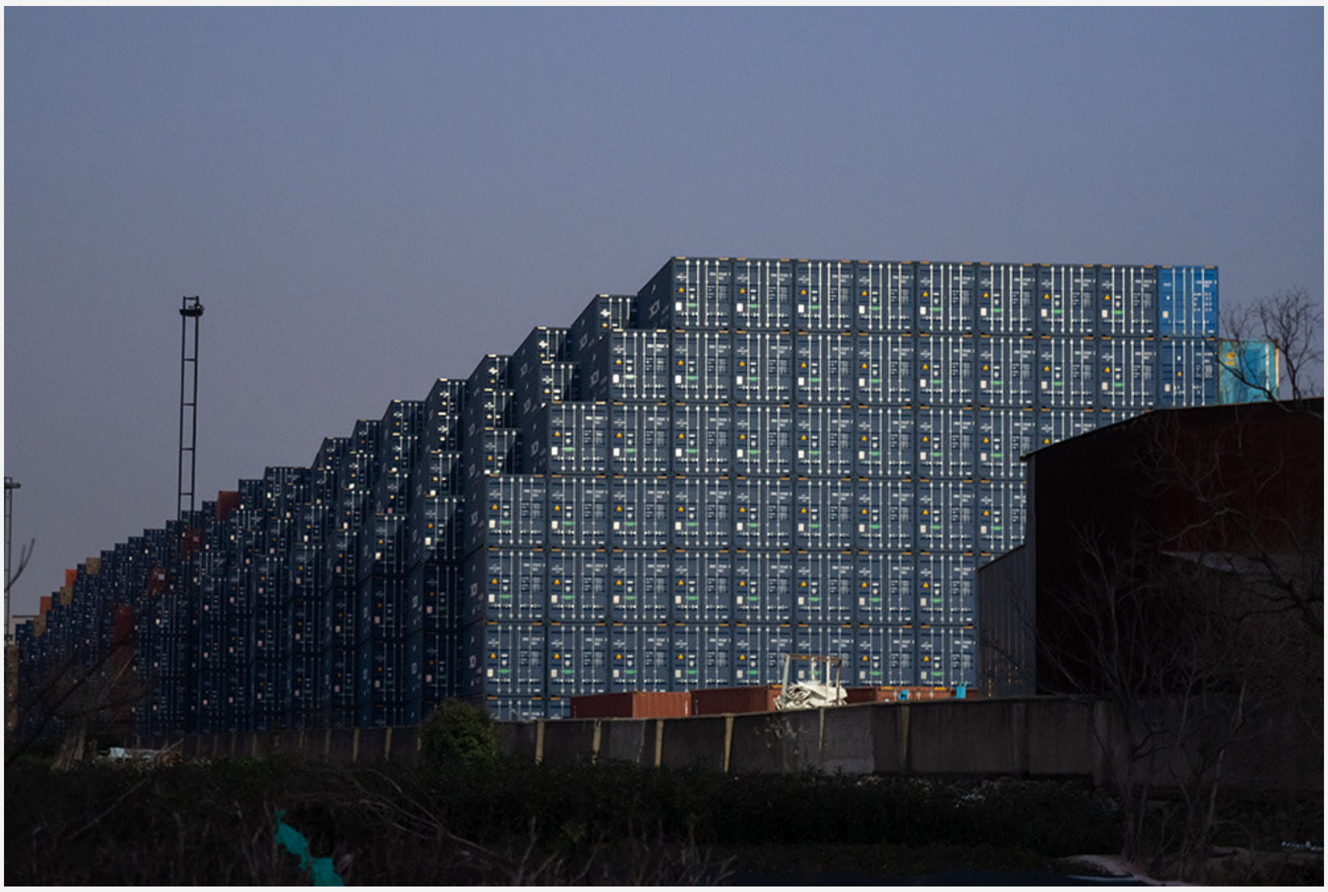
宁波舟山港是全球货物吞吐量最大的港口，也是全球三个集装箱年吞吐量超3000万箱的港口之一，北仑港区是其集装箱业务的核心港区。天旭国际物流是注册在北仑港区做集装箱运输的近4000家物流企业之一。3月初，港区堆满了空置的集装箱，服务于港口的集装箱卡车（下称“集卡”），大量闲置在停车场内。



集装箱第三码头，一名待货的集卡司机在车里吃午饭。前些年集卡司机是个顶好的职业，每月能赚1.5万元，行情最好时每月近3万元。



灯火通明的集装箱第三码头。宁波舟山港是全球货物吞吐量最大的港口，2022年集装箱吞吐量为3335万标准箱。



陆远堆场，堆放了七层的集装箱。这些显然都是空箱，因为装有货物的重箱最高只能堆五层。

期待中的翻身仗

“不能说怪谁，只能说自己时运不好。”46岁重新做回集卡司机的郑华如此评价自己过去的五年。

五年前，郑华原就是一名集卡司机，前些年生意繁忙，常整月无休，每月能赚1.5万元，行情最好时每月近3万元。媳妇做月嫂每月也有1万多的收入。十多年里，在良好的收入预期下，他们先后在老家县城里贷款购置了两套房，准备给两个儿子一人留一套。此外，他们还翻修了村里老宅。

干到40岁时，郑华两口子手里有了60万元的存款。考虑到家里老人年纪大了，身边离不开人，他决定回乡创业。2018年，郑华进了4万只鸭苗办起养鸭场，脖子上也戴起了大金链子，有了“老板的样子”。

鸭子养到第七个月便遭遇了禽流感，隔年新冠疫情暴发。每天3000斤鸭蛋卖不出去，先是送给村里老乡吃，也不敢一直送，“村里看你笑话的多，怕你富，嫌你穷”，后来积压的鸭蛋大多作为抗疫物资捐了出去，“年年赔，拿着60万元回乡创业，现在反而欠了20多万元”。不得已，46岁的郑华回到东海边，重新跑起了集卡。他本预计生意差不多的话，两年能翻过身来。没想到春节后，他又遭遇了十余年未见的行情低谷。如今，他每周大部分时间都滞留在一片用碎石和沙土堆起的简易停车场上。



集运基地横浦停车场，集卡司机郑华打开车前盖晾晒衣服。为了省钱，他最近一直住在车里。

“疫情走了，生意没了”

即使在疫情期间，贴着封条出入港口的集卡也能为集卡司机带来每月万元以上的收入。郑华在春节前还能一个月跑29趟，春节后，13天里他只跑了2趟，每趟550元。自己生活都不够，更别说养家了。“县城房子的房贷3000元，办鸭场时买的小轿车的车贷2000元”，再加上三个孩子的生活费、学费，这些压力让郑华喘不过气，他现在惟一感到庆幸的是，决意重新跑集卡时，没有再贷款买卡车，只跟物流公司干，要不现在还要背负每月1.5万元的车贷。

集卡司机张文海算过一笔账：“（集卡）每天贷款四五百元，折旧费100元，保险费100元，停车费40元，即使司机不吃不喝，一台车一天不跑，也要损失七八百元。”



集运基地，闫武勇背着一袋衣物去浴室，洗澡时顺便洗衣。基地内虽规划了3000个车位，但往常没有多少车会整周停放，如今司机大量滞留，遭遇到诸多生活不便。



集运基地，司机们闲来无事，凑在一起聊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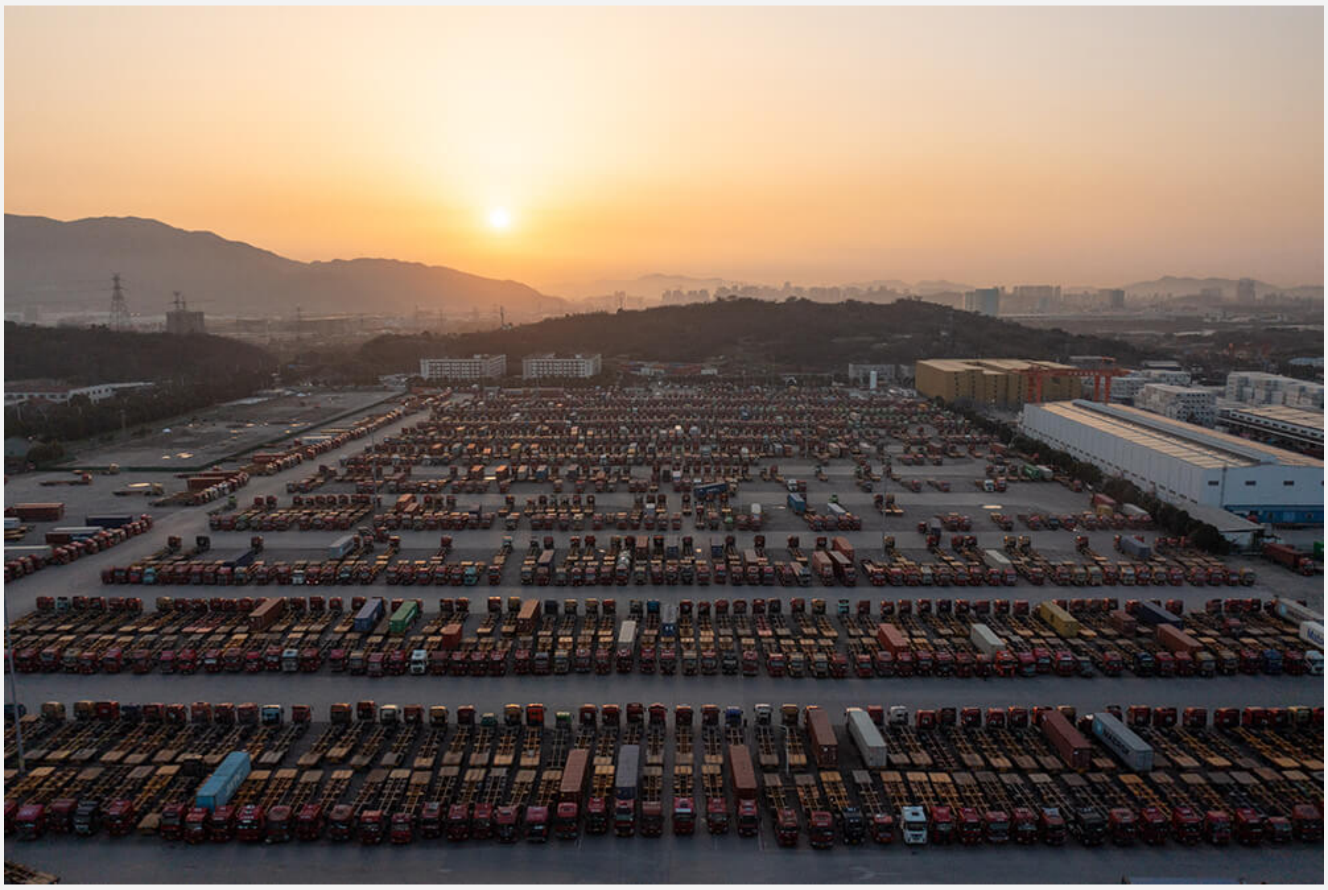
集运基地，周一深夜，住在车上的蒋勇（左）和王会启在翻看账单。周一通常是司机们对账的日子。



霞浦街道，蔡洪礼的老婆在集装箱改造的住所里哄孩子。不少司机和在港区打工的人在这片租了集装箱房当作家。

和郑华、张文海有相同遭遇的司机还有很多。周二到周五原本是他们最忙碌的日子，现在数千台车在停车场里“趴窝”。跟物流公司干的司机要么在车里睡觉，要么在出租屋里打牌，要么在健身器材上晒太阳；单干的司机们则躺在车里长时间盯着手机屏幕抢单。手机接单软件上刚刷到一条信息，就被抢走了，根本没时间去看发车时间、要求、价格；生意越少，运价越低，宁波到台州的运费已经从600元掉到了550元……“整个行业正在陷入恶性循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跑集卡的老司机周金生感慨，“哪曾想疫情走了，生意没了。”

有的车回家了，有的车为了省停车费，停到了偏僻的路边，周金生也退掉了出租屋，住进了车里。“谁不知道睡床上舒服啊！”同样睡在车里的司机蒋勇说。



航拍集运基地，大量集卡在此“趴窝”。

中物联研究室主任周志成已注意到很多港口集卡司机营收困难这一情况，正在做调研，他认为目前看，其成因主要有“3月份至5月份是行业的传统淡季；今年外需下滑比较快，海运订单取消得比较多，所以集卡、内贸的公路运输都比较淡。另外疫情过后，司机都着急出来赚钱，司机供给量也增加了”。

基地门口的生意人

据宁波北仑港区官方数据显示，该地平均每天约5万车次的集卡进出。司机群体的消费，也养活着餐饮、修车、超市、洗衣店、按摩店等一连串的人群。

午夜过后，在集运基地门口卖饭的普建波知道今天的饺子馅又备多了。2014年，他来到北仑港卖饭，头两年生意不错，“以前冒尖的两盆饺子馅都能卖完，现在只能弄个半盆，还经常卖不完要倒掉”，他先是感觉卤肉难卖了，后来小菜也难卖了，“这生意一年不如一年”。

往常司机们下了班，把车停进停车场里，就来这里消夜，大口喝酒大块吃肉。“以前集卡司机常聚会，一桌人吃饭花上千儿八百的也没人会在乎。”周金生说，现在生意不好，司机们都琢磨着省点钱，有的司机每天只吃一顿饭。



集运基地门口，普建波夫妇坐在面馆里等待客人，“以前冒尖的两盆饺子馅都能卖完，现在只能弄个半盆”。



陆远堆场，75岁的孙树贤给女儿的菜馆帮厨。生意冷清，她已准备回佳木斯老家。



集运基地门口，凌晨4点多，64岁的老魏做好了第一锅煎包，只有一位司机在等候。往常没出锅就有人排队，第一锅一掀锅盖就被抢光。

凌晨2点半，普建波收摊时，老魏煎包出摊了。老魏64岁，做的煎包香脆，往常没出锅就有人排队，四点半第一锅一掀锅盖就被抢光，摊子一支就来生意，摊位里挤得满满的人。集运基地可以容纳3000台车，司机们都想着早点出车，躲避拥堵，着急的司机顾不上吃打了包就走，“现在好了，做好一锅，就能歇着了”。

东北人老张租了一排修车门面，现在为一年67万元的租金发愁，正常每月销售700—800桶机油，现在一个月200桶都卖不掉，“车子跑的里程数不够，没人来保养”。以前他雇着4个工人干活，现在自己上手，只留了一个兄弟帮忙。3月过半，生意不见起色，他给这个兄弟也订了机票回东北老家。“现在回去还能赶上这一季插秧。”老张苦笑着说。



集运基地，60岁的老唐为一台集卡打完黄油后从车底钻出，“儿子、女婿都是集卡司机，都没什么生意，就我这还有点活儿，养着一大家子”。



集运基地外，以路边修车为生的阿大无事可做，闲在集装箱房里。



集运基地一处修车厂，没活儿干的维修工坐在卷帘门外晒太阳。

等不到活儿干的郑华也动过回家帮农的念头。去年，他的鸭棚已经拆掉，重新种上的小麦刚返青，老一辈人正在地里精耕细作，“可若是回去，靠那些庄稼活儿如何维持房贷、车贷？”他已摘掉了脖子上的金链子，“欠了那么多钱，还戴着金链子，人家不笑话你吗？”但金链子没卖，他总觉得再省吃俭用几年，还能翻身。

图片编辑 | 董德

开篇图说：2023年3月7日，宁波舟山港北仑港区（下同）集运基地横浦停车场，集卡大量闲置。春节后前来赚钱的司机们遭遇十多年未见的行情低谷，进退两难。

回溯｜一周回溯（《财新周刊》2023年第11期）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3月20日第11期

一周回溯

3 月 11 日至 12 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产生新一届国家机构组成人员，李强任国务院总理；张又侠、何卫东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李尚福、刘振立、苗华、张升民为中央军委委员；刘金国当选为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张军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应勇当选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为国务院副总理，李尚福、王小洪、吴政隆、谌贻琴、秦刚为国务委员。

3 月 11 日和 13 日，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和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先后在京闭幕。

3 月 16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3 月 9 日，尼泊尔大会党领导人拉姆·钱德拉·保德尔在总统选举中胜出，成为 2008 年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第三位总统。他于 3 月 13 日宣誓就职，任期 5 年。

3 月 16 日，欧洲中央银行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 50 个基点，符合多数机构和投资者预期。



3 月 13 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记者会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3 月 14 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国务院机构设置有关工作，讨论《国务院工作规则（修订稿）》。新一届国务院开始全面履职。

3 月 13 日，土耳其内政部长表示，2 月 6 日发生在该国南部的强烈地震已造成至少 4.8448 万人遇难，包括 6660 名外籍人士。



3 月 16 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东京与韩国总统尹锡悦举行会谈，双方决定让因强征劳工问题等历史问题受损的两国关系“恢复正常”。这是韩国总统时隔近 4 年首次访问日本。

3 月 15 日，英国财政大臣亨特发布预算报告，为企业提供更多税收减免措施。这是亨特就任财长后提交的第一份完整预算。目前，英国的税收负担已达 70 年来高点。

3 月 14 日，湖南、安徽、海南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沈晓明接替张庆伟任湖南省委书记；海南省原省长冯飞接替沈晓明任海南省委书记；吉林省原省长韩俊接替郑栅洁任安徽省委书记。



沈晓明　冯飞　韩俊

3 月 15 日起，国家移民管理局调整签证及入境政策，对来华外国人持 2020 年 3 月 28 日前签发且仍在有效期内签证的，准予入境；恢复海南入境免签、上海邮轮免签、港澳地区外国人组团入境广东免签、东盟旅游团入境广西桂林免签政策。

3 月 15 日起，中国扩大开放公民出境团队游国家试点范围，出境团队游国家再增加 40 个。截至目前，国内已开放出境跟团游试点的目的地国家达到 60个。

3 月 15 日，巴黎奥运会第二阶段的门票销售启动，这一天也是巴黎奥运会倒计时 500 天。第一阶段门票销售共有 325 万张门票售出。

3 月 15 日起，中国银保监会开展为期六个月的不法贷款中介专项治理行动。

3 月 13 日起，日本进一步放宽新冠防疫口罩规定，交由个人判断是否佩戴口罩。

3 月 14 日，美军一架 MQ-9“死神”无人机在黑海水域附海，美方称无人机遭俄军机撞击，俄方则称其因飞行动作太大而坠落。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一年来美俄首度“空中过招”引发外界高度关注。

3 月 11 日，澳大利亚政府取消对自中国入境旅客的行前新冠检测要求。

3 月 13 日起，香港交易所互联互通股票标的范围将进一步扩大，符合有关条件的在港主要上市外国公司股票将被纳入港股通股票标的。同时，沪股通和深股通股票标的范围也将扩大。

3 月 15 日，国际消费者权益日。2023 年，中国消费者协会确定消费维权年主题为“提振消费信心”。

3 月 13 日，韩美两国军队正式启动“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持续至 3 月 23 日。

3 月 9 日，德国汉堡市发生枪击事件，造成 6 人死亡、2 人重伤。

3 月 9 日，尼日利亚最大城市拉各斯发生一起客车与火车相撞事故，造成至少 7 人死亡、80 余人受伤。

3 月 9 日，加蓬首都利伯维尔附近发生一起沉船事故，已造成 21 人死亡、16 人失踪。加蓬总统邦戈宣布 14 日至 16 日为全国哀悼日。

3 月 11 日，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世界上首枚 3D 打印火箭“人族一号”多次尝试发射均宣告失败，这也是在不到一周内，该火箭再次被迫推迟发射。



版面编辑：吴秋晗

前瞻丨巴西总统卢拉访华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3月20日第11期

文丨财新周刊 侯吴婷

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巴西总统卢拉将于3月26日至31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此前，卢拉在他首度担任巴西总统的2003年至2010年间，曾两度到访中国。

2009年，即卢拉第二次访华同年，中国便成为巴西的最大贸易伙伴。据中国海关统计，2022年中巴双边贸易额为1714.9亿美元，同比增长4.9%，其中中方出口额619.7亿美元，同比增长15.7%，进口额1095.2亿美元，同比下降0.4%。中国从巴西进口商品主要为大豆和铁矿石。

今年1月，在德国总理朔尔茨访问巴西之际，卢拉曾强调中国在俄乌冲突中的重要作用，并提倡由中国、巴西、印度等国，建立一个以和平为导向的多国斡旋小组，通过外交努力介入调停俄乌冲突。当时，卢拉表示将向中国领导人提交此提议。

“正如为了克服2008年的经济危机而创建20国集团一样，我们想创建一个讨论终结俄乌冲突的国家集团，”卢拉当时说道，“我们需要的是，建立一个足够强大、能在谈判桌上受到尊重的国家集团，且这些国家能坐下来跟俄罗斯和乌克兰进行谈判。”

当时，和卢拉同台的朔尔茨并没有就这一提议发表评论。卢拉还已就此与法国总统马克龙、美国总统拜登进行过商讨。

在卢拉计划中的访华议程中，双方还可能就金砖国家共同成立的新开发银行下任行长人选进行讨论。巴西政府目前已提名与卢拉同属劳工党的巴西前总统罗塞夫接任行长职务。新开发银行成立于2014年。当时，包括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在内的金砖五国，在巴西福塔莱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上，宣布签署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协议；目前巴西为轮值主席国。若罗塞夫确认成为下任新开发银行行长，其任期将持续至2025年7月。据巴西媒体报道，罗塞夫此次也将陪同卢拉访华。

卢拉是巴西历史上少有的出身贫寒的领导人，也是拉美地区的温和左翼领袖人物。2022年10月，时年77岁的卢拉在巴西总统大选第二轮决选投票中，再次当选巴西总统；2023年1月1日，卢拉宣誓就职，任期四年。

卢拉宣誓就职后两周内，巴西政府机构就遭到不愿承认选举结果的右翼前总统博索纳罗的支持者强闯，并与首都巴西利亚军警发生冲突。事后，卢拉誓言查明事件真相，并于1月21日解除陆军原总司令阿鲁达将军的职务。

上任两个多月来，卢拉加强了巴西的枪支管控，并开始组建特别行动队，驱逐侵入原住民保护区的非法开采金矿人员，以保护亚马孙雨林。

卢拉曾在1989年、1994年和1998年三度参选巴西总统，均告失败；直到2002年，他才成功当选，成为巴西历史上首位通过选举上台的左翼总统。在他首次任职期间，巴西一度跃升为全球第六大经济体。

版面编辑：吴秋晗

国风丨蜜蜂"摇摆舞"中的社会学习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3月20日第11期



标记采集蜂和拍摄它们回巢后的舞蹈。图：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文丨财新周刊 王克柔

3月10日，来自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植物园研究团队的最新研究登上《科学》杂志封面。该团队发现，社会学习改善了蜜蜂的"舞蹈语言"表达能力，幼教缺失影响蜜蜂舞蹈信息的准确性。该研究为昆虫的社会学习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模式。

该研究由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谭垦研究员团队与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詹姆斯·聂（James Nieh）合作开展。董诗浩助理研究员和林涛博士后为论文共同第一作者，谭垦研究员、詹姆斯·聂教授为共同通讯作者。

蜜蜂是典型的社会性昆虫，在蜂群的日常交流中，一种"8"字形舞蹈频繁出现，被称为蜜蜂的"摇摆舞"（waggle dance）。1946年，奥地利动物行为学家卡尔·冯·弗里希（Karl von Frisch）提出，蜜蜂舞蹈是一种编码行为，蕴含着与食物有关的信息。1973年，弗里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其关于蜜蜂舞蹈的观点进一步成为主流。

研究者发现，外出觅食的工蜂回到巢穴后会以极快的速度表演，伴随其有规律的移动和摇摆，食物的质量、方向、距离等信息被准确传递给同伴。

此前研究表明，这种交流方式只在蜜蜂群体里存在，其他蜂类没有，而且蜜蜂舞蹈像是提前设置好的程序，所传递的内容仅限于食物资源相关信息，不像人类语言那样具有创造性。科学家据此推断，舞蹈行为由蜜蜂的先天基因决定，生来就会。但谭垦团队的最新研究表明，蜜蜂舞蹈行为中存在社会性学习的成分。

研究者设计了一个富有创造性的实验：他们设置了幼蜂群和自然蜂群进行对比，幼蜂群的蜜蜂全部由刚出房的幼蜂组成，自然蜂群则由不同年龄段蜜蜂构成。与在自然蜂群里成长的蜜蜂相比，幼蜂群中的蜜蜂在成长过程中缺失了向有经验的采集蜂学习表演舞蹈的机会，就像婴幼儿在成长初期丧失了跟成人学习和互动的机会。

通过比较幼蜂群和自然蜂群的同日龄蜜蜂的各项舞蹈指标，研究者发现，相较于自然蜂群，幼蜂组的第一次舞蹈更为无序，指示距离较其实际行进距离更长。他们推断，成蜂（成年蜜蜂）的舞蹈具有教学作用，跟随成蜂学习能提高幼蜂舞蹈行为的准确性，社会学习塑造了蜜蜂的舞蹈语言。蜜蜂舞蹈就像人类、鸟类等脊椎动物的语言交流，新手向有经验的个体学习比它们自己独自摸索能更好地获得技能。

除此之外，研究者还发现，尽管随着社会经验的增加，幼蜂组舞蹈准确性逐渐提高至正常水平，但始终达不到自然蜂群的程度。那些在关键的学习早期阶段无法观察其他蜜蜂舞蹈的蜜蜂，就像发展出了一种自己的"方言"，而这种"方言"将伴随它们的余生。

该研究同时证实，即使脑容量很小的无脊椎动物也具备"言传身教"的能力，相互交流和学习是蜜蜂社会取得成功的基石，这对探索人类和动物语言的起源和演化具有重要的科学启示。

版面编辑：吴秋晗

心智丨你是高神经质人士吗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3月20日第11期



插画丨董必奇

文丨猫柳
安人心智特约作者

大五人格是当前学术界广泛研究并认可的一个人格框架，它包括五种特质：神经质、宜人性、尽责性、外向性与开放性。

在大五人格框架中，神经质非常特别。其他维度的高分者都预兆着良好的行为适应，例如高宜人性，意味着好相处、朋友多；高尽责性，预测学业、职业成就高，还能预测长寿；高外向性，有体验积极情绪倾向，被认为更有吸引力；而高开放性，则经常被形容为具有艺术家气质，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可一旦提到高神经质，让人不由得眉头紧皱。它与抑郁、易怒、情绪化、心理障碍、身体容易出问题等偏负面标签一起出现。跟大众印象吻合的是，神经质就是消极情绪的探测器。

高神经质的人也很容易受到烦恼影响，例如抑郁症、焦虑障碍、失眠以及其他由压力引起的问题。除了健康，他们还需要付出其他代价，例如他们一般对婚姻满意度更低，工作满意度更低，也更强烈地感受到他人有意图（无论真假）伤害自己。

如果人生隐喻是一颗苦巧克力，那么高神经质的人品尝到的苦味深刻10倍。有时，这种痛苦并非刻意为之，而是一种无意识的合谋——基因与另一个自我的合谋。

根据对同卵双生子和异卵双生子的研究，神经质的遗传性约为41%。也就是说，如果你身边有一位易燃易爆炸的高神经质人士，请抱抱他吧，他其实也不“想”那么难相处的，因为生物性因素（基因）对这个“难相处”负有41%的责任。

怎么识别身边的高神经质人士？你可以通过一些行为来判断。例如，高神经质的人在压力情境下特别容易现出原形，他们的应对技巧薄弱、健康状况更差，更容易筋疲力尽和回避工作。另外，高神经质人士还有一个隐藏的行为特性，他们容易对任何可能被理解为批评或侮辱的事情敏感。

除此之外，你还可以通过神经质维度下的六个构面来分辨：

他容易感到害怕吗？（N1：焦虑）

他容易有敌意情绪吗？（N2：敌意）

他容易沮丧或悲观吗？（N3：抑郁）

他容易因害怕被拒绝而害羞吗？（N4：忸怩不自然）

他较难抑制冲动吗？（N5：冲动）

他容易因压力而失去平衡吗？（N6：脆弱）

一个神经质水平高的人，意味着他的行为有体验负面情绪的倾向，尤其是在应对感知到的社会威胁时。他们容易忐忑不安、担忧、沮丧、烦躁和对他人生气，也容易感到悲伤、孤独和抑郁。在与人打交道，尤其是与陌生人打

交道时，他们时常感到尴尬或害羞，有些人还会感觉到自己不善于控制冲动和欲望。高神经质人士还有一种思维倾向，总觉得："我不够好。"

现代社会对高神经质的人来说并不友好，它的快节奏、工业环境、淡漠人情等等，常常让高神经质人士颅内的"危险探测器"误报。但这个探测器在野兽横行的古代，却有着生死存亡的意义——对古人来说，对威胁反应灵敏的人才有更高的生存率。

那么，要让对威胁探测灵敏的远古大脑在现代很好地生存下去，可以怎么做呢？根据个人经验，我有两个想法。

首先，请拥抱这样一种思想：任何一种特质都不存在绝对的好坏，只要在合适的情境，都能发挥其独特作用。

例如，对低尽责性的人来说，他们在没有规则的环境中更能灵活适应。例如，如果智商不够高，可是又偏偏身处在精英圈中，要做的不是让自己跟精英们竞争，而是转变角色，成为信息的中介者。

高神经质纵有千般不好，换个角度来看，它还是有很多优点的。比如情绪觉察强、善于发现危险，以及品位好，精神性与信息性事务处理好。进一步，这些优点在什么情境下，能更好地发挥优势呢？

不妨这样想想，是不是在消防、警察等行业，善于发现危险，能让你更敏锐地识别出犯罪线索；作为心理咨询师，情绪觉察强，是不是能让你通过来访者一两个无意的举动，就触碰到他们的内心；你还可以选择成为作家。

高神经质在作家、诗人和艺术家群体中很常见。对此的解释可能是，高神经质的人具有细腻的情感感受力，这让他们轻松拥有技能优势，同时，写作也是他们的一种治疗方法，因此很多人作出投身写作的选择。但是，高神经质不是成为一个作家的充分条件，可能还需要有高开放性。

另外，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高神经质常对自己"开刀"这个行为。正因为他们觉得世界上的事情都不全是对的，所以他们想要改变。又因为害怕失败，只要他们没有觉得糟糕到无能为力，这种情绪就会驱使他们去努力。换言之，高神经质驱动人去奋斗。

除了换个角度看待神经质，相信很多高神经质的人还是想去改变。对此，我想传达一个好消息与一个坏消息。

先听坏消息吧。改变人格特质很难，往往需要 3年—25 年的时间，因为它与生物性因素有关。而好消息是，对特质的纵向研究表明，随着年龄增长，尤其是30岁以后，神经质程度会有所下降，宜人性和尽责性水平会上升。

如果你非要跟自己较劲，那么就在对的地方较劲吧，去对抗自己"不够好"的思维模式。例如，你可以亲近低神经质的人，慢慢地受他们影响。你要找到一个宽容的群体，他们能够无条件接纳你。不优秀没关系，不美丽没关系，你依然能拥有很多关心你、爱你、懂你的朋友。

更多精彩请阅读：【专题】心智

版面编辑：吴秋晗

天眼丨移民冲卡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3月20日第11期



图：Jose Luis Gonzalez/IC photo

当地时间2023年3月12日，至少有1000名移民拥向连接墨西哥和美国得克萨斯州埃尔帕索的北帕索国际大桥，试图进入美国。这些移民大多来自委内瑞拉。当天，现场情况混乱，不同年龄的移民向围栏边界挤去，另有人将手举在空中，鼓励他人继续前进。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已对该地区增派人手，墨西哥军方也于大桥南侧试图控制事态发展。据悉，2022财年，有230多万移民试图越境进入美国，预计在2023财年，移民危机还会愈演愈烈。

版面编辑：吴秋晗

回声（《财新周刊》2023年第10期）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3月20日第11期

沈ZS： 自由的意志，舒展的灵魂，是创新的基础，也是生而为人的要件。

《自由与开放是科技创新之魂》

财新网友： 西方历史上，“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文艺复兴—工业革命”是一连贯的因果过程，很难想象人们处在思想禁锢下，能创造出什么重大科技成果。创新很难被“计划”出来。

《自由与开放是科技创新之魂》

SWULib： 如果监管的权力变大后，谁来监管权力的运行？

《重塑金融监管》

Antonio7966： 安全网非常必要，控制风险对双方都是好事。 改革开放以来，是世界发达国家的购买力和中国人民的勤劳共同实现了发达国家的低通胀和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如今这两个趋势都遇到了大问题，应思考哪里错了。

《中美竞争亟须建立防护安全网》

版面编辑：吴秋晗

读周刊看视频（《财新周刊》2023年第11期）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3月20日第11期

5%左右的增长目标相对谨慎，显示2023年更多是恢复性增长而非刺激性增长，而就业成为政策变化的重要考量因素——@《财新周刊》《2023年经济如何回归常态》，**相关视频：**政府工作报告提今年预期目标：GDP增长5%左右，CPI涨幅3%左右

消费电子市场全线萎缩，5G投资回报不明，中国移动通信厂商在增长停滞期挖掘新市场、新动能——@《财新周刊》《移动通信寻找新大陆》，**相关视频：**摩根士丹利：美国电子消费放缓 苹果受影响小

大震后的安塔基亚，一群不愿离去或无处安身的人从废墟中抢救家当，在帐篷中等待重建——@《财新周刊》《安塔基亚震后余生》，**相关视频：**寻找林时珠

版面编辑：吴秋晗

财新视听内容精选（《财新周刊》2023年第11期）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3月20日第11期

【财新时间】历史学家王笛：于无声处听惊雷

用更多元、更微观的视角观察历史的重要在于——让普通人明晰过往、珍惜日常

【华尔街原声】

木头姐：高利率环境下存款搬家 冲击硅谷银行/埃尔埃里安：美联储制定政策时过分依赖数据/美港口CEO：2022年美国原油天然气出口创新高

【周五晚7点】

数据、改革与预期中的中国经济2023

【直播回放】

外交部长秦刚答中外记者问

版面编辑：吴秋晗

答疑（《财新周刊》2023年第11期）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3月20日第11期

联系编辑部：邮箱newsroom@caixin.com或电话（010）8590 5000

北京读者 梦熊：

聊天机器人ChatGPT近日进一步升级，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内容？

本刊产业新闻部：

3月15日，ChatGPT背后的创业公司OpenAI发布新一代的多模态模型GPT-4，该模型除了有更强大的文字交互能力，还首次支持用户和AI模型间的图片交互。GPT-4模型新增图片输入模式，可以对图片进行分析、分类，并写配文。24分钟的官方演示视频里展示了多模态功能，包括描述网友实时发送的图片、阅读并理解一则手写笑话图片等。

GPT-4模型扩展了文字处理能力。在输入方面，GPT-4模型可以处理高达2.5万个英文单词的文本，而GPT-3.5模型支持处理的英文单词仅为500个左右。

在内容反馈上，GPT-4模型可以生成6.4万词或50页左右的文本，足够写短篇小说。

OpenAI介绍，GPT-4模型创造性更强，可以生产、编辑音乐创作、台词写作等更复杂的任务，并随着用户的写作风格迭代。用户也可以赋予AI独特的“人格”。

在OpenAI的示例中，GPT-4模型参加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GRE）等考试，成绩惊人。GPT-4模型在阅读理解、数理、写作三科考试中分别击败了99%、80%、54%的人类考生。

值得注意的是，OpenAI的此次发布重点已经从参数规模的扩张，转向模型的实际应用表现。

中国AI企业出门问问创始人李志飞在社交媒体上直言，此次发布的GPT-4模型各项能力惊人，势必给其他竞品造成较大压力。▫

版面编辑：吴秋晗

编辑更正（《财新周刊》2023年第11期）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3月20日第11期

本刊2023年第10期，第79页右栏第三段第一行应为“韩裔演员吴珊卓担纲主演的美剧《英语系主任》（The Chair），全因吴珊卓浑身都是戏的出色演技才让我追剧”。特此更正。

版面编辑：吴秋晗

最新财新周刊｜新冠后的甲流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3月20日第11期

新冠疫情如何影响流感走势？新冠的抗疫经验又如何启示流感的防控？



2023年3月2日，北京儿童医院发热门诊，排队就诊的人群。分诊台工作人员称，当天科室内就诊病人多为甲流患者。有工作人员表示，发热门诊曾于2月25至27日的周末期间迎来就诊小高峰，其中27日就诊人数超4000。图：李丛汛（实习）

文丨财新周刊 赵今朝 滑昂 王伯文 戚展宁

冬春交际之时，新冠未了，流感卷土重来。

“现在是综合内科、发热门诊、急诊、呼吸科都在接诊流感患者，医生每天加班，经常来不及吃饭。”3月13日，优艾贝医疗集团北京京都儿童医院内部人士表示，目前门诊相关科室暂时停休，计划等到高峰过去后再换休。

从2月最后一周开始，医院已经连续承压半个多月，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依然接诊了很多病人。据她介绍，近期，门诊量周末一直是超过2000人次，周中也有1700—1800人次，最高的时候超过2600人次。以往流感高峰周末一般也就是1700—1800人次。

在南方，广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儿内科门诊主任李淑华也观察到，3月开始，广州的流感形势逐渐严峻，到了13日，内科门诊和发热门诊的单日就诊量总计达到2500—3000人次，发热门诊达到500—600人次，急诊的就诊量也显著增加。而在2月份，发热门诊的单日就诊量只有200人次左右。

新冠病毒流行步入第四个年头，被人们忽视的流感再次回到话题中心，主角是“甲流”。国家流感中心发布的最新周报显示，甲型H1N1亚型占流感样检测病例数的75.6%，甲型H3N2亚型占24.3%。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感染引起的呼吸道传染病，主要是通过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流感大多属于自限性疾病，但部分患者因会出现肺炎或者其他并发症而发展成重症病例，主要是发生在老人、儿童、孕产妇和有一些慢性基础性疾病的人群。

流感分为甲型（A型）、乙型（B型）、丙型（C型）和丁型（D型）四种类型，人群中主要流行的流感病毒包括甲型H1N1亚型、甲型H3N2亚型、乙型Yamagata系以及乙型Victoria系流感病毒，其抗原性易变，传播迅速，每年可引起季节性流行。

然而，新冠疫情一定程度上影响流感正常的流行趋势。国内流感在经历了2020年断崖式下降后，近两年开始小幅“抬头”。

有资深疾控人士表示，当下这波流行仍是季节性流感，属于一个高峰延迟的季节性疫情，未来不会演变成大流行。大流行专指由新亚型（流感）病毒引起的全球广泛传播。

尽管如此，尚未彻底远去的新冠和正在升温的流感叠加，仍加剧了人们的恐慌心理。甲流阳性率在继续上升、甲流和新冠症状区别、多地学校因甲流停课等话题频频登上网络热搜。

学校更是成为紧张情绪和疫情的“放大器”。春季开学后，学校属于人群聚集场所，由流感导致的集中发热风险增加，关于“减员”“停课”等议论之声渐起。

新冠感染与流感均为呼吸道传染病，且症状相似。最终，新冠疫情如何影响流感走势？新冠的抗疫经验又如何启示流感的防控？

直击校园

“孩子们凡有各种不舒服的，逢症必休。”2月26日，本段甲流疫情流行伊始，北京朝阳某小学就在家长群中进行了如上通知。接下来的两周中，该校二年级某班陆续出现甲流病例，42人的班级里，一度有12名同学请假，相邻的班级甚至曾出现近半“减员”。

浙江西部某地级市一所小学的班主任告诉财新，她任教的年级自3月初陆续有学生出现发热症状，请假人数增多，前后累计有5个班，为此停课1—2天。湖南株洲某小学教师提供的3月13日的午检考勤表则显示，该校58个班中，共18个班出现学生因“感冒”“腹痛”“发烧”等症状请假，确诊甲流病例尤其是多人同时、同症状请假，都集中在低年级。

西部某省会市直中学校长唐飞（化名），对此有横向对比。过去一周，他所在中学的1250余名学生中，单日发热请假数最高达167人，由于家长大多未选择前往正规医院治疗，因此只有18人正式确认为甲流。不过，治校十数年，他对数字的变化十分敏感，往年冬春流感季节，此类病假每天一般只有20—30人的水平。

接诊儿童的医院同样直呼“压力很大”。北京京都儿童医院提供的数据显示，当前医院门诊量相比往年同期增加了53%。

甲流汹汹叠加新冠余波，校园生活中的各方在心态和应对处置上都保留有三年来的谨慎。上海中心城区某区疾控中心人士表示，此波流感波及各个年龄段，学生群体受冲击最大，“学校教室是一个封闭的空间，人群较为聚集，这样的环境特别适合病毒传播”。

西城区某重点小学教师告诉财新，她们紧邻的几所小学目前感染量都较少，暂采取的是病例班级错峰活动、不使用公共教室等措施。根据受访教师和校长的描述，主流的应对举措还包括集体紧急接种流感疫苗。

前述朝阳区小学后续则曾要求，暂停班级间活动、闭环管理、室内戴口罩，确诊学生需症状消失48小时、持社区医院复课证明，方能回到课堂。有学生表示，一些家庭其实尚未出现病例，但出于“避避风头”的心态，最终也选择请假观望。

不少遭遇此次甲流袭击的家长提到，过去一年在紧张的新冠防控节奏中，因隔离、停课等原因孩子错过了流感疫苗的接种，所以担心更甚。唐飞则回忆，他所在的学校是去年12月初开始引导流感疫苗的接种，但当时许多学生都正经历新冠症状，身体状况不允许接种，最终的接种覆盖率尚不到一半。

过去的一月间，杭州西湖区、上海青浦区、天津北辰区等地陆续出现了公开的整班停课动作。2月20日，北京西城区外国语附小也曾有班级因甲流集体停课四天。停课标准是什么？

“（停课）疾控说停几天就是几天，学校自己没有停课权。”前述班主任表示。综合北京各区受访者问政录音，丰台区教委曾回应称，市区两级教委尚并未针对本轮甲流出台意见指导，主要是学校根据情况接受本级卫健部门、地段医院建议举措；海淀区教委则明确，目前暂没有全校停课的应对计划，班级如转线上授课，需要半数以上同学出现发热症状，也不会因此影响校园整体运行。

事实上，如何停课确有“国标”。根据2009年11月由教育部和原卫生部联合印发的《学校甲型H1N1流感防控工作方案》，班级停课标准为，当天新发现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达5例及以上，或发现当天内仍有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状的学生累计达30%及以上。而“由社区医院开具复课证明方能返校”的规定，则出自各地方卫生部门历年出台的冬春季传染病防控工作通知中。

3月初，洛阳市学生资助和健康管理中心就曾全文转发前述方案，要求各县区教体局，市直各学校遵照执行。不过，有当地小学校长向财新表示，洛阳的学校一侧，目前主要是将其作为感冒处理，“有病治病”，暂未听闻停课机制触发。

北京某重点中学管理者告诉财新，甲流出现十余年来，其实学校都有累积的预案可循，但是因为检出率低，病程又快，多数学校对甲流都是“弹性把握”，也因此较少触发停课、隔离等机制。当下的反应，事实上是新冠疫情后，社会对流行病有更敏感的监督情绪，迫使部分学校“认真按照标准执行”。

唐飞则表示，他所在的城市各部门目前强调“淡化影响”，给到校方的推荐举措是“直接带回、居家三天”，当地中小学以及幼儿园，无论病例量超出“国标”多少，都没有停课考虑。而对家长而言，如果自行前往医院被确诊为甲流，反而要因此进入疾控的复杂管理程序，返校须满足无症状时长和开具复课证明等，“（家长）一般也都觉得，新冠都挨过去了，为了甲流没必要”。“其实跟现在对新冠的处理方法比较像，不再强制申报之后，全看家长意愿，想怎么报，我们就按什么程序处理。”前述西城区教师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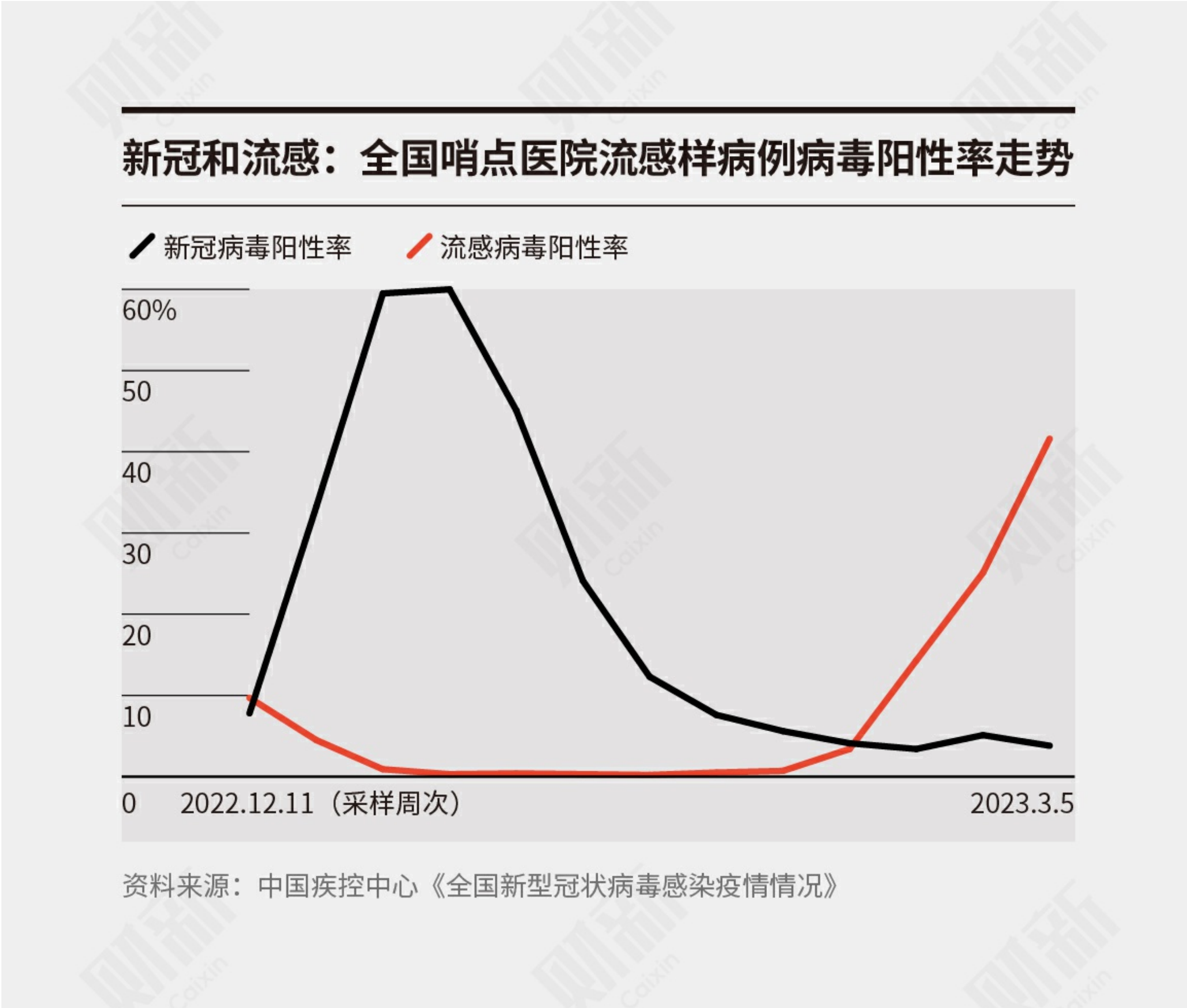
是否更严重？

2月中旬，在全国哨点医院流感样病例监测的曲线图上，新冠病毒和流感病毒阳性率曲线交会，并走向相反方向：流感病毒阳性率从第六周的3.4%一路飙升至第九周的41.6%，而新冠病毒阳性率持续走低，下降至第九周的3.8%，近期呈现低水平波动状态。该数据由中国疾控中心披露，反映的是全国哨点医院流感样病例中，新冠和流

感病毒阳性率的变化趋势。

国家流感中心3月8日发布的流感监测周报称，南、北方省份流感病毒检测阳性率继续上升，流感样病例百分比继续上升。

目前，全国流感流行情况到底如何？结合实际，多名专家提到，当前流感病人数量比往年同期多，逼近或者微微高出新冠疫情之前普通年份流感流行高峰时期的水平。



这一说法亦与国家流感中心监测的全国数据基本吻合。据其发布的《流感监测周报》显示，南方省份流感样病例占门急诊病例总数百分比（ILI%）已经从第七周的1.8%，快速上升为第九周的7.6%，北方省份从1.9%到7.3%，高于2020至2022 年的同期水平。2020年至2022年的ILI%均低于4%。再往前对比，在新冠疫情之前的年份，流感高峰季来临时，南北方哨点医院报告的ILI%多处于6%—7%左右。

同时，2023年第九周共报告720起流感样病例暴发疫情，对比往年同期个位数的疫情暴发数，增加明显。在2019年冬季流感流行水平较高之时，暴发疫情数同样可以达到500起以上。

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对流感流行造成了一定影响。《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详细总结了近三年流感流行的趋势——自2020 年3月开始，流感在中国呈极低流行水平；南方省份从2020年底至2021年9月流感活动呈缓慢升高，北方省份仅2021年3—5 月有短期低水平流行；自2021年10月左右，南北方省份开始进入秋冬高发季节并在2022年初达到冬季峰值，3月逐步回落至低水平；2022年5月以来，南方省份流感活动再次呈持续升高趋势，进入夏季高发期，达到近5年同期最高水平；同期北方省份流感活动处于低水平。

北半球流感高峰一般发生在12月、1月，当前"小高峰"打破了这一规律。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感染病科主任医师张振华提到，2月、3月虽然仍属于流感季，但以往流感从前一年的10月开始逐渐流行，到3月已经接近尾声。此番3月出现高峰的原因在于2022年冬季，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等防护措施仍在施行，流感传染性没有新冠变异株强，这些防控举措对预防流感十分有效，使得流感感染明显减少。随着防控松绑，复产复工后人员流动性和聚集性增加，流感病例开始增加。

之所以来得如此"猛烈"，有疾控专家提到，疾病和免疫力一直是相辅相成的，三年来，长期的非药物干预措施让人们与流感病毒接触很少，人群对流感的预存免疫力下降，形成"免疫低谷"，从而使得后续感染迅速上升。

张振华近期跟安徽省内部分地方医务人员交流过，发现不同城市流感流行程度有差异，很多地方流感并没有大面积流行，甚至没有出现流感病例，"省会城市流行情况更严重，这可能与人群流动性更大有关"。

财新梳理近三周的《流感监测周报》得出，江苏、安徽、山东、浙江、重庆、四川、河南、上海、北京、甘肃、陕西、黑龙江等地单周疫情暴发数超过10起，其中江苏、安徽、山东情况最为严重，江苏三周累计暴发325起

流感疫情。而广西、福建、海南、辽宁、吉林等地三周累计流感疫情暴发数均为个位数。

多名专家将此次流行定义为一种免疫欠债，是"流感高峰的后移"，而非流感大流行。"从免疫学角度来看，它不太具备大面积感染的条件。"前述上海中心城区某区疾控人士提到，发生大流行有一个必要条件是，病毒完全是新的，或者变异特别显著，类似于新冠这样，人群中没有这种病毒的抗体。此轮流感仍是以往流行过的甲型H1N1流感亚型，人群中有一部分人曾经感染过这一病毒，并不能算是全新的或者显著变异的新病毒。

他认为，流感是一个对温度相对比较敏感的病毒，更适合低温生存、传播。目前，天气已经普遍转暖，等气温升高后，感染比例或随之下降。多名专家预测，此轮流感疫情到4月或会趋于缓和。

一个乐观的现象是，张振华观察，虽然感染人数增多，但到目前为止，医院因流感住院和重症的人数并未大幅增加，尚未出现医疗挤兑。即便在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城市，前述上海中心城区某区疾控人士提到，他所在的区流感重症病例没有显著比以前季节性流感流行期增多。

对于即将到来的2023—2024年流感季，有接近中疾控的人士提醒，仍会出现季节性高峰，但高峰强度以及是否仍有延迟，还是回归到既往常见的时间，目前仍难以作出预测。

药物紧俏

新冠感染高峰期的"囤药潮"刚刚平息，国家卫健委印发的《流行性感冒诊疗方案（2020年版）》中，直接对症治疗流感的药物奥司他韦，在全国多地又现供应吃紧。

"紧张！流感药物几乎是每天都在紧张地找，市场上几乎没有奥司他韦了。"北京京都儿童医院人士介绍，目前医院的奥司他韦不定期断货，阿比多尔和帕拉米韦也是货量不足。

"一直在医院大群内及时通知医生这几个专用药的余量情况，请医生开单的时候注意。前几天药品最紧缺的时候也对开药量进行了限制，以保证来院就诊的患者都有药可用。另外就是采购时刻关注渠道里的药品情况，能抢到多少就要多少。"前述人士3月13日告诉财新。张振华亦表示，在自己所在医院，成人用流感药物断断续续断货一个星期。

奥司他韦是一种神经氨酸酶抑制剂，能够特异性地抑制甲型和乙型流感病毒的神经氨酸酶，从而抑制病毒的释放，减少病毒的传播。临床上用于成人和1岁及1岁以上儿童的甲型和乙型流感治疗，也可用于成人和13岁及13岁以上青少年的甲型和乙型流感的预防。

与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等OTC（非处方药）退热药物不同，奥司他韦属于处方药。多位医生提醒，奥司他韦应在专业医师的指导下使用，不宜自行服用，且对普通感冒无效。

但在零售端，"流感神药"奥司他韦重演了新冠管控放开初期"退烧药"被抢购的情形。

"我知道抢这个药还挺早的，但总觉得医院会有。后来听说医院里开不出来，也想到万一真得了特难受可能都不愿意去医院，买的时候就已经晚了。"北京海淀一居民介绍，3月8日自己在两家电商平台下单奥司他韦，收到药已经是一周后，"家里人已经是最难受的那两天"。

天猫买药提供的数据则显示，3月中旬以来，甲流防治相关用品的搜索数据大幅上升，甲流特效药搜索周同比上涨近670%，甲流试纸周同比上涨350%。湖北电视台3月13日报道，武汉多家药店奥司他韦脱销。药在哪里？国家药监局网站显示，国产奥司他韦不同剂型共有31个批准文号，生产企业包括东阳光药（01558.HK）、科伦药业（002422.SZ）、双鹭药业（002038.SZ）、石药集团（01093.HK）、一品红（300723.SZ）、齐鲁制药等10余家企业。进口药物中，罗氏生产的"达菲"（磷酸奥司他韦胶囊）也占据一定市场份额。

已有企业表达，正在加紧奥司他韦产品的生产和供应。博瑞医药（688166.SH）2月底接受投资者调研时表示，目前市场上的奥司他韦产品大部分没有自有原料药，公司将以原料药优势快速响应市场需求。3月2日，阿里健康联合罗氏对外宣布，将保障阿里健康大药房"速福达"（玛巴洛沙韦片）和"达菲"（奥司他韦）药品供给，患者可以根据医生建议凭处方按需购买，不建议囤货。

一位医药流通行业人士告诉财新，此前的新冠防疫中流感相关药物需求减少。企业从库存原料到产能都随之调整减量，重新恢复产能需要有时间爬坡。2月28日，一品红在投资者互动平台回应奥司他韦产能问题时也表示，公司主要实行"以销定产"原则，即依据销售计划、库存情况等制订生产计划，结合市场需求适时调整。

事实上，由流感暴发导致的相关药品"抢购潮"，并非在今年首度出现。最近一次由媒体报道的奥司他韦断货发生在2019年初的流感季。而作为内地奥司他韦市场内的绝对龙头，一次错误的市场预期曾为东阳光药业带来巨额损失。

根据东阳光（600673.SH）披露，2020年初，新冠疫情开始在湖北暴发，早期新冠诊疗指南试行版磷酸奥司他韦被作为推荐用药，叠加处于流感高发的冬春季，预期磷酸奥司他韦市场需求将大幅提升，东阳光药业方面积极排产。

但是，随后的防疫带来的全国人口流动降低、医院门诊量下降，流感亦处于低流行状态。奥司他韦销售市场急剧萎缩，东阳光药业产品积压。2020年及2021年上半年，公司临期奥司他韦共计提存货减值超1200万元。

结合流感传播常在冬季发生，如何保障具有潜在季节性需求的药品供应和流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在2月16日召开会议，要求和部署的工作中就包括"加强医疗物资生产保供，完善储备制度和目录，巩固完善人员、物资统筹调配机制，切实解决好基层一线能力、药品、设备等方面的短板弱项"。有行业人士分析，不排除未来奥司他韦等抗流感药物被纳入国家应急储备。

"我们会根据疾控部门的预警，（产能）提前做一些准备"，东阳光药业方面一位负责人告诉财新。他表示，结合去年流感发生规律，公司奥司他韦一直处于生产状态且形成一定库存，但"最近全国部分地区需求量比较大，可能在调配上存在一些滞后，情况最近有了改善"。此外，公司正在优先保障公立医院药品供应。针对儿童易感人群，还会倾向于分配更多奥司他韦儿童剂型。

在零售及流通方面，九州通（600998.SH）在2019年底与宜昌东阳光签约，目前正独家代理"可威"（磷酸奥司他韦）三个单独规格在全国OTC渠道的销售。"公司从事药品保障，有大量数据的积累。会把季节性的用药做一些分析再去叠加政府指导意见，合理建立库存，不断供应。"九州通方面告诉财新。

湖南省药品流通行业协会原秘书长黄修祥认为，相比新冠管控放开初期的退烧药、蒙脱石散抢购，本轮甲流中药企、流通、零售端保障奥司他韦供应表现已有进步，例如零售端最开始就使用了限购等手段。此外作为集采品种，奥司他韦在公立医院中基本没有出现断货。

与此同时，社交媒体时代，如何向大众科普正确的用药知识，解决信息不对称带来的疾病恐慌问题，亦成为多方疏导药品抢购需加强做的工作。"媒体加大科普力度，还有民众经过前几次恐慌式抢药后闲置浪费，意识到了有整个国家卫生体系在托底，也都开始反思。"黄修祥说。

持续低迷的疫苗接种率

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减轻流感疾病负担最有效的防控措施之一，但新冠大流行极大影响了疫苗的接种。此轮流感高峰来临前，很多需要重点保护的人群处于"裸奔"状态。

流感疫苗按疫苗所含组分，可分为三价苗和四价苗，三价流感疫苗可以预防甲型H1N1、H3N2和乙型BV三个型别的流感病毒，而四价流感疫苗还包含BY型的流感病毒免疫抗原，对流感病毒的预防更加全面。世界卫生组织会在每年2月、9月分别提供冬季北半球和南半球季节性流感疫苗配比方案，包括三价和四价。这一过程近似"押题"，只有流感疫苗成分与当季流行的流感病毒株相匹配才能"精准制导"。此轮北半球季节性流感三价和四价疫苗推荐组分均包含当前流行的甲型流感病毒。

《中华预防医学杂志》2022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暴露出新冠疫情下的两个流感季，流感疫苗接种的"倒退"：其一，流感疫苗接种率由2020—2021年度的3.16%下降至2021—2022年度的2.47%，同比下降0.69%；其二，多数免费政策覆盖的人群接种率大幅下降，下降最多的依次为医务人员等其他人群、学龄前儿童、老年人。两年间，国内实施流感疫苗免费接种政策的县区数减少61个。

研究者分析了接种率下降的多重原因，包括2020年流感呈极低水平流行，公众风险意识降低；受疫情以及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影响，卫生人员不足，进而干扰其他疫苗接种；接种季节性以及与新冠疫苗接种时间间隔影响了流感疫苗的有效接种周期。

江苏金迪克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余军的感受是，2022—2023年这一流感季，疫苗接种率明显更低。这与张振华的感受一致，身边接种过流感疫苗的人很少，甚至医护人员都基本未接种。

实际上，2022年南方省份流感病毒检测阳性率持续上升曾一度"催热"流感疫苗话题，当年首批流感疫苗批签发较往年明显提前。然而，有疫苗行业人士坦言，去年夏季流感的流行实际上并未带动秋冬季流感疫苗接种量的提升，原因在于9至10月流感疫苗接种季撞上国内新冠疫情蔓延，各地卫生疾控系统防疫压力很大，流感疫苗接种受到冲击。

当下已经是3月，是否还有必要接种流感疫苗？"还是建议接种。"有北京市疾控中心人士解释称，一是因为近期流行的病毒株和疫苗比较匹配，二是即使不能完全避免发病也能部分减轻症状，三是现在接种并不影响年底再接种。

河南省濮阳县户部寨镇卫生院医生曹文峰表示，从既往流行趋势来看，中国各地每年流感活动高峰出现的时间和持续时间不同，夏季存在流行的可能，这时与毒株匹配的疫苗同样能提供保护。虽然流感季来临前是接种的最佳时期，但国家疾控局近期仍给出建议，尽快接种流感疫苗，"对于尚未接种流感疫苗的孕妇、老年人、慢性病患者、低龄儿童等高风险人群，在流感疫苗可及的情况下尽快进行接种，仍能起到很好的预防保护作用"。

"有的地方已经及时采取行动，比如联系企业补发货、组织学生接种，但即便进入高发期，仍有很多地方按兵不动。"有疫苗行业人士认为，流感短期活跃对接种量的提升有限，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接种服务提供方在激励不足

又徒增责任的情况下，缺乏扩大接种规模的主动性。

有疫苗企业内部人士提到，流感疫苗接种可及性很差，很多地方疾控中心或者社区接种点每周对流感这类自费疫苗接种只安排半天的时间，给接种者造成不便。

余军明确表示，不会针对此波流行高峰额外增加疫苗产量，2022—2023年度疫苗供应已接近尾声，现在准备的重点是面向2023—2024年流感季的疫苗。“我所在的接种点还有18支疫苗。”曹文峰提到，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及各门诊目前都在消化剩余库存，调拨接种，很多省市接种已经基本结束，无苗可打。

余军称，2023—2024年产能储备暂时还在计划中，到5月才能有一个清晰的判断。

从以往经验来看，企业排产放量非常谨慎。抗原易变是流感病毒最显著的特征，因而流感疫苗有效期仅有10至12个月，当年未接种的疫苗只能报废。由于生产与市场需求脱节，季节性流感疫苗长期以来就是二类疫苗中折损率最高的品种之一。

以2021—2022年流感季为例，据多家疫苗企业内部人士估计，流感疫苗批签发量约8000万支，达到近年来供应高点，而实际免疫到人体仅有4000多万支，半数流感疫苗被浪费。因此，多数企业不愿盲目跟风扩产。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各国将推荐人群的流感疫苗接种率目标设定为75%，中国距此标准差距巨大。有资深疾控人士强调，中国流感疫苗接种率低，需要持续地呼吁和推进流感疫苗接种，特别是老年人、严重慢病患者和医务人员的接种。

相比于释放更强的接种信号，行业更迫切呼吁，平衡好接种资源。“现在仍主要靠宣传”，有疫苗行业人士无奈地表示，中国疾控中心每年都会发布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鼓励接种，但“一到下面就没声音了”。

仍有短板

“今年秋冬季或冬春季，流感暴发流行风险较高”的预警早在2022年秋季已经发出，在当年9月由中华预防医学会、亚太流感控制联盟、中国疾控中心以及中国医学科学院共同主办的2022年世界流感大会上，各路专家均在呼吁进一步提高公众和专业机构对流感危害及其防控的认识，并郑重发问——新冠未去，流感重来：准备好了么？

公共卫生界从监测、疫苗、药物、非药物干预措施等多方面谈及新冠防控对流感的启示。有专家提到，流感存在多年，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应对办法，关键在于落实。

短板并非没有。流感监测系统在新冠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灵敏度”饱受质疑。中国有两套监测流感的系统，一个是2003年SARS之后建立起的全国传染病信息直报系统，另一个是覆盖部分实验室和哨点医院的中国流感监测网络。张振华提到，对于医生而言，无论上报哪套系统，都是一个费时费力的工作，很多时候不愿意上报。

因此，北京协和医学院群医学及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冯录召在会上提出，提升全国流感监测能力和水平，建立整合型监测平台，例如采用多病原监测，或者建立包含流行病学、病原学、疾病负担、干预措施效果等多重信息的监测。此外，开展早期预警技术研究，搭建多渠道、多点触发的预警体系。“单打独斗不太适合，联合监测非常关键，要建立多部门、多行业的监测系统”。有专家建议。

新冠严格管控期间，广泛运用的核酸检测和抗原检测使得公众对快速诊断技术越来越熟悉，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副院长蒋荣猛在会上提到，两种检测在国内流感领域的使用率低。他曾经调研发现，北京能做流感核酸检测的医院或不到20%，抗原检测基本能做，但全国层面使用率也很低。核酸检测是金标准，通常情况下出结果最快也需要两个小时，病人等待时间长。抗原检测可以作为辅助，但灵敏度有差距。

有北京某三级医院医生提到，高峰时期，发热门诊一天接诊400—500人次，核酸做不过来，抗原也很难。他提到，之前有医院对所有的发热门诊患者先筛抗原、然后分流，工作量相当庞大，从系统性应对的角度讲，还是要依靠三级诊疗体系，由基层分流才是解决之道。

“我们还需要提升检测方面的能力。”蒋荣猛表示，快速的、灵敏度高的、特异性好的检测方法有助于帮助医生做早期判断，对改善流感病人愈后、精准治疗以及减少药物滥用非常重要。

个人是否有必要囤流感抗原检测试剂？前述北京某三级医院医生告诉财新，抗原检测试剂良莠不齐，灵敏度差异太大，流感季节，出现发热、咽痛或咳嗽后，抗原检测呈阴性并不能排除流感。

“检测试剂主要用于临床分流，民众不用过度反应。”上海中心城区某区疾控人士表示，流感大多为自限，一般患者在出现症状后，建议居家休息，治疗重点是缓解发烧、咳嗽等流感样症状，是否检测或诊断流感对治疗影响不大。但由于5岁以下儿童、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孕妇或肥胖者更容易出现严重并发症，这类患者一旦出现高烧不退、呼吸困难、心脏不适等重症倾向，应及时就诊，尽早在医生的指导下开展检测或使用抗病毒药物。

此外，非药物干预措施在全球新冠大流行应对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在疫苗和药物尚未面世之时。有与会专家指出，使用非药物干预措施的关键是要精准评测疾病严重程度和采取措施的范围，这能有助于达到控制的效果，同时让公众能够理解为什么要实现、为什么要执行这些措施。

系统性经验和反思的落地需待时日，但新冠带来的实际改变已经体现在细微之处。李淑华认为，经过新冠疫情，上至整个国家的卫生系统，下至每一个医院和医生，都得到了系统性的提升，对传染病防控的经验渗透到了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

她举例称，在防止院感方面，新冠疫情前，手卫生等习惯还需要监督，甚至疫情初期还需要在诊室安装监控，后来每个医生都形成惯性，无需监督也能坚持，“看一个病人做一次手卫生”。“流感防治跟新冠乃至所有呼吸道传染病（防护）都类似，也还是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相信过去三年大家都已经形成习惯了。”李淑华说。

崔笑天对此文亦有贡献

更多报道详见：【专题】甲流来袭

版面编辑：吴秋晗

最新财新周刊｜香港改革基层医疗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3月20日第11期

香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说，需要扭转“重治疗、轻预防”



2023年1月2日，香港一公立医院急症室大厅内安置了临时病床。香港现在有大约200万人患有一种或以上的长期病患，大部分的病人都在公立医院接受跟进及治疗，尤以专科门诊为重。图：张炜/中新社

文丨财新周刊 文思敏 发自香港

“我常常说，不困难的工作都不用找我了。”今年62岁的卢宠茂如今是新一任香港特区政府的医务卫生局局长，在某种意义上他担负着香港基层医疗改革者的角色。

他是国际知名的一名肝移植专家、香港大学医学院教授，之后出任香港大学深圳医院院长，参与中国内地公立医院医疗试点改革，2022年7月他加入特区政府，这也是卢宠茂职业生涯中转换的第三条赛道。

自上任以来，卢宠茂带领的抗疫团队在科学数据的指引下，让香港逐步放宽管控。今年3月1日，港府全面撤销口罩令，所有社交距离措施正式结束，这也标志着香港彻底告别三年新冠疫情。一周之后，卢宠茂在位于添马台的政府总部接受财新专访，在带领香港走出疫情后，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带领香港基层医疗体系进行一场全面改革。

香港已连续多年蝉联全球最长寿的地区，这得益于本地高质量的医疗水平和双轨制的医疗系统，公营医疗系统为全部市民提供安全网，低收入人群同样可以获得适切治疗，而私营医疗系统则为经济能力更佳的市民提供了优质、及时的服务。但是，疫情高峰期公立医院人满为患、私立医院拒收患者的情形，凸显了香港公私营医疗系统的割裂，感染者普遍筛查、推广疫苗接种的艰巨程度，也暴露出政府在基层医疗系统的统筹不足。

去年12月，香港本地疫情已接近尾声，卢宠茂领导的医务卫生局推出《基层医疗健康蓝图》，为香港基层医疗健康的未来发展勾勒出策略性路线图。这项宏大的计划涵盖五个改革方向，包括建立社区基层医疗系统、加强基层医疗服务管理、整合基层医疗健康资源、规划基层医疗人手、改善数据互通及健康监测。过去，香港的私营医疗系统完全由市场导向，如今，政府的力量也将参与其中，以策略采购的形式让公私营协作更加灵活、高效。

基层医疗改革并非新话题，自2009年起步的中国新一轮医改就曾对基层医疗寄予厚望，试图建立“基层首诊、双向转诊”的分级诊疗体系，但改革之艰难超乎想象：2009年至2019年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诊疗人次数占比从71.3%降至61%。在今年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也提出要强化中国的基层医疗体系，“我们必须主动在基层医疗体系建设方面再投入力量，无论是提高质量或是优化布局，不仅是为了应对未来不确定的传染病疫情，同时也是为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做准备。”



香港早已落实“基层首诊、双向转诊”的分级诊疗体系，本次基层医疗改革的重点落在了“早期预防”上。卢宠茂表示，以地区为本的基层医疗健康服务需要扭转当前“重治疗、轻预防”的医疗体制和观念，尤其是加强对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管理，“如果我们可以提早5年识别这些慢性病患者，不仅能减少他们对专科和医疗服务的需求，大大降低医疗开支，也能让患者的生活质量得到提升。”

老龄化下公立医疗承压

“离家最近的政府耳鼻喉科专科门诊最长可能需要等81个星期才能排到，全香港最快的政府专科门诊也要等55周。”30岁的吴嘉宏因为感冒引发的流鼻水和中耳炎迟迟未痊愈，在普通科医生看诊了三次后，病情似乎愈演愈烈，甚至出现鼻腔流血、听力受损的情况，于是他想到了求助公立医院的专科医生。可没想到，吴嘉宏的病情被划到病情稳定的一类，在专科排队可能需要等一年多，他感慨道：“如果真的等这么久，我的病要么自愈了，要么就恶化了，那我只能上私立医院看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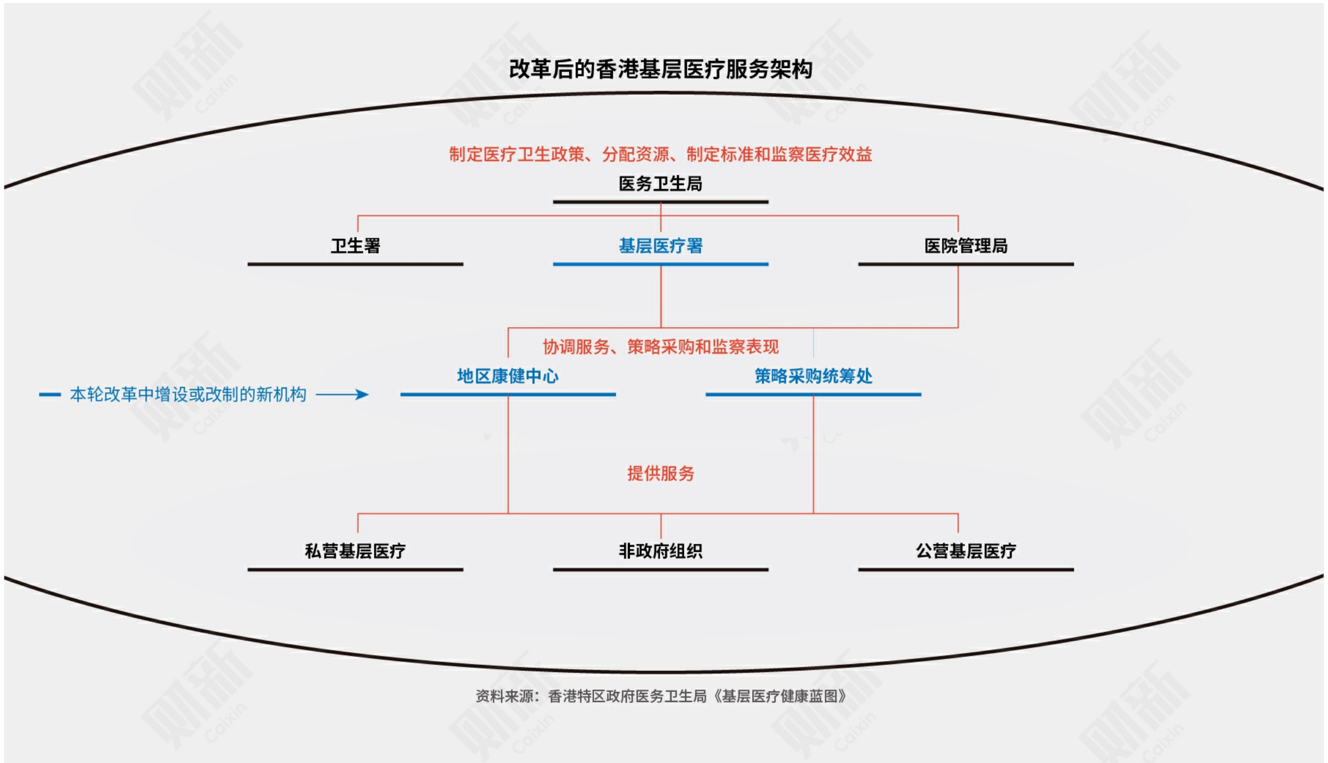
在香港的医疗体系中，公营与私营医疗共同提供基层医疗服务，其中约68%的医生门诊发生在私营医疗系统，医疗开支全部由病人支付。以吴嘉宏挂号的耳鼻喉科为例，如果在政府门诊看病，首次挂号费仅需135港元，每种药物15港元，而他求医的私人诊所，一次看诊的费用高达1200港元，几乎是政府门诊费用的9倍，这还不包括药物费用。

香港政府专科门诊的拥挤与香港日益严重的老龄化直接相关，作为全球最长寿的地区，香港人口老化的速度也位居世界前列。港府预计，到2039年，65岁及以上人口将由2021年的150万上升至252万，占整体人口的比例也将从20%跃升至31%。80岁以上的高龄长者的比例亦将由2021年的5%迅速增至2039年的11.5%。

随着人口老化，慢性病日益普遍，专科门诊的服务需求也与日俱增。香港医院管理局资料显示，2019年，65岁以上长者的住院总天数和急症室入院人次占据总数一半，普通科门诊及专科门诊的患者中，这部分长者的占比也超过了三分之一。

香港现在有大约200万人患有一种或以上的长期病患，大部分的病人都在公立医院接受跟进及治疗，尤以专科门诊为重，如今政府专科门诊每年的服务量已经高达750万人次，且每年增加约80万的新症患者。

另一方面，资金端的紧张也让目光长远的政策制定者看到了改革的迫切性。香港的公营医疗体系全部由政府资助，根据最新发布的2023/24年度财政预算案，公营医疗服务的年度预算达1044亿港元，占政府经常开支约19%。



资料来源：香港特区政府医务卫生局《基层医疗健康蓝图》

与香港公营医疗体系类似的英国国民保健制度（NHS），近年来由于政府投资不足，已出现医护人员、床位、救护车不足等多项问题。从去年底开始，NHS员工陆续发起多次罢工行动要求涨薪，由于通胀高企，NHS的护士过去10年实质薪金减少多达20%，但英国首相苏纳克回应称，政府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因为正在向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其他方面增加资金，例如购买更多的医疗设备和救护车。

设备老化、维护不及时也同样是香港公营医疗系统面临的重大挑战。2月以来，香港多家公立医院还接连发生大型手术灯坠下、天花板掉落等多项事故。其中基督教联合医院一个至少70公斤的大型手术灯突然从天花板上塌下，压在手术床上，冲击力足以击碎头骨。所幸事故发生时并没有手术进行，但一名麻醉助理被手术灯撞伤肩膀。调查报告显示，涉事手术灯主柱内至少四颗螺丝出现金属疲劳，部分螺丝也发现锈蚀，导致螺丝不足以支撑手术灯重量而掉落。

在卢宠茂看来，虽然香港的医疗服务水平很高，但是人口老化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不断提升，加上医学技术的进步，让很多以前没办法治疗的疾病可以有创新性的疗法应对，因此香港医疗的确需要根本性的改革，以防公营医疗服务超负荷所带来的服务轮候时间过长。

此外，公立医院医护人手持续流失。根据最新数据，截至去年10月，医生流失率为8.1%、护士流失率为10.7%。另外，预算案账目资料显示，2022/23年度只有6450名医生，共流失34名医生，其中专科医生同比少105人，护士流失80名。

公立医疗体系的薪金制度或许是医护流失的原因之一，与私人诊所或是私立医院不同的是，香港公立医院的医护人员的薪水是按照职级薪级表发放，一名外科医生直言："在公立医院，只要是同一个职级，外科医生跟内科医生拿的钱是一样的，做10个手术和做20个收入也都是同等收入。"但是，私人执业的医生收费则更加灵活，以妇产科手术为例，产科医生做完一个剖腹产手术，仅仅手术医生费就可以拿到数万港元。

"我觉得公立医院的医生也需要绩效激励，如果能把内地的绩效跟香港的定薪融合起来就更好了。我也准备朝这个方向推进改革。"曾经在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担任6年院长的卢宠茂认为，内地的医疗系统有许多值得香港借鉴的地方，比如说内地医疗服务人数多、效率高，这与医生的绩效工资制度有关，"当时我们在港大深圳医院，给医生的固定工资大概是60%—70%，然后绩效奖金30%—40%，既能保障医生拥有合理的基本工资彰显专业价值，也要有一定的绩效奖励，提升效率。"

完善社区基层医疗网络

过去三年，新冠疫情的暴发不断凸显社区基层医疗健康基建及人手的重要性，亦进一步暴露及加重了慢性疾病的医疗负担及社会成本，"稳健的基层医疗健康系统是抵御一系列潜在公共卫生危机的重要防线，政府将致力提升

以地区为本的基层医疗健康服务，扭转现在‘重治疗，轻预防’的医疗体制和观念。”卢宠茂在《基层医疗健康蓝图》的发布会上表示。香港基层医疗下一步的改革转向“预防”，突破口则是慢性病管理。

基层医疗是个人及家庭在发现健康问题、或是进行疾病预防时的第一个接触点，完善及全面的基层医疗系统可以在社区层面保障及提升全民健康，为第二层的专科及医院服务以及第三层的特殊及复杂治疗把关。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实证数据显示基层医疗健康是提升人口健康最平等、最具效率及成效的策略。

然而，当前香港的基层医疗健康系统仍然是以治疗疾病为中心，而且不同医疗平台之间独立运行，未有统筹合作的机构。在政府资助的机构中，医卫局旗下的卫生署主要负责疫苗接种、产前产后护理、遗传病筛查等疾病预防控制、以及儿童发展康复等医疗服务；医卫局旗下的医院管理局则为所有人士提供普通科门诊、跨专业护理诊所、患者居家康复等一系列医疗服务，此外还有劳工及福利局负责的一部分社区支持服务。

在私营医疗市场，香港有13间私立医院，以及大量私人执业的普通科和专科诊所，由非政府背景的香港医务委员会负责注册及监管西医的专业操守，卫生署则是通过巡查、调查医疗事故及处理公众的投诉来保证私人机构遵守法例。

私营医疗机构主要提供疾病治疗服务，大多数医生仍然采用手写病历，患者的病历由诊所保管，相互之间无法流通，无法保证医疗的连贯性。卢宠茂举例称，全港只有23%的人拥有固定的家庭医生，其他人可能今天找这位医生看病，如果发现自己有高血压，拿了几周的药，之后又没有及时复诊，过了几个月他可能又找另一位医生看病，新的医生又要给他再做一次检查、查问病史，因为病历不流通，既浪费了双方的时间，也可能让患者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跟进治疗。在改革蓝图中，港府希望能强化“一人一家庭医生”的概念，让患者得到长期的跟踪治疗。

不过与中国内地不同，香港缺乏街道办、居委会等政府基层组织机构和能力。“但全港有18区，我们去年利用这个行政区划组建了地区康健中心，来统筹社区基层医疗服务，一方面可以支持基层医疗医生，另一方面作为地区基层医疗健康资源枢纽，连接小区上不同界别的公私营服务。”卢宠茂表示，政府希望通过地区康健中心，全方位地统筹公私营的基层医疗服务，比如建立政府认可的《基层医疗名册》，在名册当中的医生才能参与各类政府资助计划，例如长者医疗券计划（注： 政府向65岁以上长者提供医疗服务补贴的计划）、基层医疗公私营协作计划等，同时要求他们使用港府推出的医疗数据共享平台“医健通”，记录患者的医疗、关键健康及服务数据，保证医疗服务水平，并提高医疗过程的协调及连贯性。

香港医疗开支持续不断增长，且增速非常快。卢宠茂认为，如今超过八成的公共医疗卫生开支都投入在以治疗为主的医疗服务中，仅有不足两成的政府开支投入基层医疗服务，“我们希望能加大投资基层医疗，促进慢性疾病的及早识别和及时介入，减少对专科和医院服务的需求，减少医疗整体开支，同时也能提升市民的健康状况及生活水平。”

为此，政府预计在今年第三季度正式推出“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资助有风险患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的市民在私营医疗机构进行筛查，确诊者将会获得安排家庭医生及专职医护团队的治疗服务，持续管理慢性病和预防并发症。卢宠茂表示，本着医疗健康“共同承担”的原则，政府会资助约一半检查和治疗费用。

为何会以糖尿病、高血压作为主要的筛查疾病呢？卢宠茂表示，这两类疾病的共性是大部分患者在患病早期没有症状，而等到他们出现明显症状时，往往是出现了中风、心脏病、肾衰竭等并发症。今年2月，香港肾脏基金会、香港肾科学会、香港肾科护士学会随机抽查了1661位香港市民，帮他们进行体检，接受检查的市民年龄中位数为65岁。结果发现，有73%的受访者未发现自己患有高血脂，68%的受访者没有发现自己有高血糖，56%的受访者不知道自己有高血压。

医管局数据显示，在普通科门诊、家庭医学专科诊所和专科门诊病人中，约 60%有相关慢性疾病，当中 82%患有糖尿病或者高血压，在2019年患有糖尿病或高血压的患者中，每三个有一个患有并发症，其人均医疗成本比没有并发症的患者高出两倍。

无独有偶，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张文宏也提出要强化中国的基层医疗体系。“我们必须主动在基层医疗体系建设方面再投入力量，无论是提高质量或是优化布局，不仅是为了应对未来不确定的传染病疫情，同时也是为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做准备，慢性病将成为老百姓生活中的常见病，基本上每个人都需要到医院去寻求支持，这也是未来非常广泛的就医需求。”张文宏建议，要打造一个“活跃”的医疗卫生体系，基层医院和三级医院各司其职，分级、分层、分流且上下联动，在必要时可以迅速实现平稳转换。

大湾区医疗融合发展

作为前任港大深圳医院院长，卢宠茂在任内曾推动了“港澳药械通”的首批落地。目前，作为大湾区医疗合作的主要成果，“港澳药械通”的适用范围以及引入的药械数量已经大幅增加，除了港大深圳医院之外，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等多家公立三甲医院也已纳入19间“港澳药械通”指定医疗机构名单。截至2023年2月，‘港澳药械通’政策累计获得批准急需进口药品23个（共46个批次），医疗器械13个（共15个批次），共惠及1789人次。

卢宠茂认为，‘港澳药械通”让大湾区内的内地城市的部分医院可以使用已经在香港和澳门上市的药械，不但解决了香港居民在内地看病时用不上港药的问题，也能提升内地的医疗服务水平，让更多有需要的内地居民可以提前

使用尚未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的药物。

除了“港澳药械通”，大湾区的医疗合作也在不断深化，例如，港人可以在定点医院使用香港特区政府发放的长者医疗券，实现香港医疗异地结算，以及港人的病历跨境到深圳。“你之前吃的什么药，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跟进情况，内地的医生一目了然，这对于提升医疗质量安全非常重要。”卢宠茂坦陈，这些合作都可以让香港居民安心在大湾区养老、工作和生活。

除此之外，大湾区的医疗合作还包括了医学人才的合作培养，卢宠茂表示，要实现医疗领域的人才流通，统一人才培养标准至关重要。2019年，深港医学专科培训中心在港大深圳医院揭牌成立，这是由香港医学专科学院和深圳市医师协会共同成立的机构，借鉴香港医学专科学院的模式和经验，建立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体系。目前，深港医学专科培训中心现在已经建立了4个专科，包括肿瘤科、急诊科、妇产科跟肾科，有十几家医院加入，“预计2025年会有首批毕业生。”

在新冠疫情期间，由于香港往返内地需要较长时间的强制检疫，部分身在广东省的港人无法如常来往香港与内地前往医管局门诊复诊。为了照顾这些患者并监察其健康状况，港府从2020年11月推出了“慢性病患者特别支持计划”，委托港大深圳医院为已预约香港医管局指定专科门诊或普通科门诊复诊的患者提供跟进诊症服务。这部分患者每次在港大深圳医院指定门诊就诊时，只需要缴付100元诊金，余下费用的差额则由支持计划资助。

这项计划此前已四度延长，截至2022年8月31日，港大深圳医院已为4.56万名合资格人士提供诊疗服务。虽然目前香港与内地之间已经实现完全通关，但是港府并未中止该项计划。卢宠茂表示：“这项计划值得我们推动恒常化，适用的医院范围也可能再扩大。”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未来将会有更多港人北上内地工作，卢宠茂希望能推动更多内地医院可以支持使用香港长者医疗券，为香港的慢性病患者提供复诊服务。

港府在选择合作医院时主要考虑哪些因素呢？“首先，要保证相关医疗机构可以提供与香港同等的医疗服务质量，同时要能理解香港医管局的一系列监管制度，包括能看得懂医管局传过去的患者病历，所以我们考虑的是有香港医疗管理经验的机构。”卢宠茂表示，目前医管局的合作医院在深圳，如果未来在中山、广州也有较大的市场，也希望可以在当地找到合作点。

版面编辑：吴秋晗

逝者｜记住大江健三郎记住他深邃、纯真而温暖的目光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3月20日第11期

东京大学前总长莲实重彦：“大江的死，不只是日本，也是世界文学的损失。他是和近年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家品质完全不同的散文家，这样的作家可能再也不会出现了。”



大江健三郎（1935—2023）日本作家、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文丨王中忱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一

这两天，大江健三郎先生的形象占据了我的内心，他那坚毅、深邃、严峻、纯真而充满暖意的目光，他在公众场合说话或演讲时总是略带羞涩的谦谦神情，不时地浮现在我的眼前。尽管各种媒体竞相使用“诺奖作家”这一标签来报道大江先生去世这一事件，但我更认同日本著名文艺评论家、曾担任过东京大学总长的莲实重彦的评价：“大江并不是因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变得伟大，和诺贝尔奖没有关系，他本来就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引自《朝日新闻》2023年3月13日的报道《大江健三郎さんを悼む　蓮實重彦さん「ノーベル賞とったからでない」》）

莲实还说：“大江的死，不只是日本，也是世界文学的损失。他是和近年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家品质完全不同的散文家，这样的作家可能再也不会出现了。”（引自《読売新聞　オンライン》2023年3月13日的报道《長男?光さんとの暮らし「創作の礎」に?大江健三郎さん、人類の倫理と共生を問う作品紡ぐ》）很显然，莲实所强调的，恰恰是大江和那些依赖“诺奖”光环的作家的不同。



1994年12月，大江健三郎夫妇和儿子大江光（中）赴瑞典参加诺贝尔奖颁奖礼。图：Gunnar Ask/视觉中国

我由大江健三郎联想到了两位作家：托尔斯泰和萨特，前者和诺贝尔文学奖无缘，后者则明确拒绝了诺奖。就精神气质而言，大江应该和这两位前辈作家属于同一谱系。他们都自觉地以文学介入社会，勇敢地为底层人、边缘人、被侮辱和被损害者发声，深深关切人类的命运，无论面临怎样的压力，承受怎样的孤独和误解，都坚持为人类的危机提出自己的思考，发出逆耳的警示。

在得知大江健三郎逝世的消息后，著名电影导演山田洋次极为沉痛地表示："在今天，在这个国家乃至世界都处于混沌的状况之中，失去大江是非常巨大的损失。对于有良知的日本人而言，有一种顿失指南针的感觉。"（引自《每日新闻》3月13日的报道《次世代の作家へ期待語った大江健三郎さん　文壇の枠超え届いた声》）可谓是恰切说出大江的社会性意义的至痛之言。但我相信，和山田洋次怀有同感的肯定不限于日本人，肯定远远超出了日本的国界线。

莲实重彦高度评价大江健三郎作为"散文家"的品质，自然特有所指。他说的是与"诗"相对的"散文"，他不赞成像卢卡奇那样把小说的源头追溯到"史诗"，认为现代小说应该放在"散文"的谱系之内。不过，具体到大江，特别是讨论大江对社会公共性事务的参与，在我看来，倒是有必要把"小说"和"散文"再做文类的区分，对他小说之外的随笔、评论、演讲、对谈等"散文"给予更多关注。

这当然不是说大江的小说不应该得到重视，而是因为他作为小说家的业绩遮掩了他的散文写作成就。大江已经出版过多种小说全集，他的散文作品却至今没有得到全面整理，甚至没有见到一份完整的目录。而在大江的散文作

品里，最为重要、值得一读再读的，毫无疑问是《广岛札记》和《冲绳札记》。当然，把这两部作品称为“散文”，其实也是一种笼统的方便说法，但如果再去细分，我确实无法按照既有的文类为其定位。

与小说写作的虚构方式不同，大江如同记者那样深入这两个地域的现场，实地调查访问，但完成的文本，却迥异于报道事件的新闻稿，两部札记里细致的景物描写，浓重的人物刻画，大江自己也不讳言是沿用了“创作小说的技法”。（参见大江为中译本《广岛札记》所写的序言，翁家慧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年，第2页）但是，如果由此联想到当下脉络里的“报告文学”，则近乎是对这两部札记的亵渎。大江深入现场的方式，也许更接近社会学家或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但他没有像一般学者那样，仅仅把“广岛人”和“冲绳人”当作考察对象。他不仅设身处地体会广岛人遭受原子弹爆炸的苦难，更从幸存者们的身上看到承担巨大创痛的坚韧，看到他们超越“受害者”立场进而追问导致原爆灾难的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责任，大江说他由此学到了“新的人生观”。（参见大江为中译本《广岛札记》所写的序言）

而在冲绳，大江的立场和心情更为复杂。从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把“琉球王国”合并为“冲绳县”，冲绳人便一直在日本的“现代化”与“帝国化”的进程中被牺牲，甚至到了战后民主化时期，冲绳仍作为美军基地被放置到“冷战”的最前线。在《冲绳札记》里，记有这样一个令人心惊的情境，一位美国核战略专家在接受访谈时，“他用铅笔描绘出远东地图，然而那地图上日本列岛竟然小到不足冲绳的十分之一。那在核战略专家的头脑中无疑是理所当然的地图。”（参见《冲绳札记》中译本，陈言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第32—33页）作为生活于本岛的日本人，大江是怀着负疚的心情走进冲绳的，并以坚韧诚恳的努力，达成了和冲绳人心灵相通。

《冲绳札记》基于扎实调查记录下的事件，揭露了近代以来日本国家暴力的暴行，也揭露了国家暴力对这些暴行的成功掩饰，同时，还把剖析的刀锋指向包括自己在内的全体日本人。他严峻地追问：“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把自己变成不是那样日本人的日本人？”（参见前引中译本第19—20页）大江重新确认了冲绳的重要性，确认了回避冲绳问题实际上就是回避对“何谓日本人？应该成为怎样的日本人”的追问。在这个意义上，他说：“在我的意识地图里，日本也属于冲绳。”（参见前引中译本第33页）这当然是对美国核战略专家所描画的地图的根本颠覆。

《广岛札记》《冲绳札记》熔调查、评论、人物特写、作者的思考与抒情为一炉，开创了一种跨文类的新体式，而两部作品都题名“札记”（note），表明大江从一开始就没有把当时的写作视为完成时。如前所说，他不同于追求即时报道的新闻记者，更不同于那些受雇写作的报告文学家，甚至也不同于做田野的社会学人类学家，没有外在的指令，不为了学术研究的项目或体验生活的任务，去广岛、去冲绳，都来自大江自己的内心冲动和要求，而他到了这两个地区就结缘终生。他从广岛出发，苦苦思考核与人类的命运，直到晚年，在福岛核事故发生之后，他直接走上街头，发起告别核电的市民签名运动；而为了揭开日本帝国在“二战”末期强制冲绳岛上居民集体自决的真相，面对右翼势力的构陷和以诉讼方式多年纠缠，大江毫不屈服，凛然到法庭答辩。可以说，大江终生都在续写广岛和冲绳。



2014年9月，大江健三郎（前排中）在日本东京参加反对政府重启核反应堆计划的集会。

二

作为小说家的大江健三郎已经被讨论得很多。他的小说作品确如长江大河一般汪洋恣肆，绚丽多彩。如果就和作家生活及思想的关联度而言，当然是那些明显带有自叙传记色彩的作品关联更为密切，其中《个人的体验》是一个显著的标志。

其实，从1957年发表短篇小说《奇妙的工作》算起，至1964年《个人的体验》刊行，大江健三郎这八年间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合计约有十部之多，表现出了相当旺盛的创造力。而这些作品的人物和情节的设定，大都在表现“二战”后成长起来的青年所感受到人生的荒谬和无奈。

在第一部小说集《死者的奢华》（1958年3月）的“后记”里，大江曾用“被监禁状态”“闭锁的高墙”等词语描述这种状态。他的第一部长篇《拔除病芽，掐死坏种》（1958年6月），也同样以一群少年企图逃离被监禁状态的热望不断被粉碎为主题。另外两部长篇——《我们的时代》（1959年7月）和《性的人》（1963年5月），描写青年一代性的欲望和冲动，笔触大胆而放肆，虽用意在表现对社会的愤懑和反抗，但所设定的人物却大都属于孤独无助一型，其反抗方式亦多带着浓厚的颓废色彩。

同样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大江早期小说的叙述者大都设定为第一人称。这些不同类型的“我”，作为文本里的人物虽然和实际作者的关系远近各异，但作者的情绪、态度和观点无疑主要通过这一视角才得以表达。笼罩于大江早期小说里的荒诞情绪，使他的叙述者性情显得颇为单一，同样，单一视点也使他的小说固化为一种稳定的叙述模式。

在此意义上看，《个人的体验》放弃第一人称叙事而采用“非我”的叙述者，使之和文本中生活经历与小说作者最为近似的人物“鸟”拉开一定距离，并使小说情节得以在叙述者和小说主人公“鸟”相互交错的视点中展开，便不仅仅是作家在叙述技巧上的自我突破，更为其拓展新的思想境界提供了叙事学的前提。

《个人的体验》全书十三章，绝大部分篇幅都在描述主人公“鸟”面对脑部患疾的新生儿所产生的内心恐惧、挣扎，以及为逃避责任所做的各种努力，包括和情人火见子一起谋划杀害婴儿的办法，直至最后一章才陡然转折，“鸟”终于想要“结束一直仓皇奔逃的男人的生活”，决定把孩子送到医院接受手术，并决意和因此而“可能智力很低”的孩子共同生活下去。《个人的体验》如此布局，既表现了“鸟”所走过的心灵炼狱之路的漫长，也暗示了长期以“否定性”为文学主题的作家试图转而展现肯定性“希望”主题的艰难。大江曾说《个人的体验》是一部“青春小说”。（参见大江健三郎：《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深重恐惧感笼罩着鸟》，东京新潮社版“新潮文库”，1981年2月，第254—255页）这应该不仅是指小说写了“鸟”度过多感的青春时代而最终走向成熟的过程，其中肯定也寄寓了作家对自身的感慨。

《个人的体验》于1964年出版后即获得新潮文学奖，但针对小说最终的情节设计——“鸟”决意和脑部患疾的婴儿共同生存，却出现了很多批评意见。连新潮奖的评委山本健吉、中岛健藏都认为，小说的结尾处理得过于简单，龟井胜一郎甚至认为，大江以此显露了一种“宗教和道德式的怠慢”。（参见《国文学解积と鑑賞》第36卷《〈個人的な体験〉選評》）作家三岛由纪夫也对这一结局提出过批评，认为大江通过鸟的突然转变，轻易消解了人物认识与行为的二律背反式命题。这些批评当然给大江以强烈刺激，但他认为，小说结尾“鸟”所做的抉择是势在必然。他固执地反驳说：

所谓结尾愚蠢或轻易的大团圆之类的指责，已经成了对我的小说的定评。这再一次告诉我，在现代文学领域，大团圆是怎样被视为应该憎恶的敌人。但我并不认为，鸟夫妇抚育智能指数可能很低的孩子，必须不断地忍耐下去的生活，是包孕在幸福的光芒之中的。我个人从来没有想到把这结尾叫做大团圆。（参见大江健三郎：「もうひとつの『個人的な体験』」，《文艺》第4卷第2号，东京：河出书房1965年2月）

现在已经无须多说，《个人的体验》故事原型即来自大江本人，小说主人公的选择其实也是大江本人在现实中的选择。1963年6月大江的长子出生便患有头盖骨损伤，接受手术后仍带有智力障碍，这使他必须直接面对这样的严峻问题：是否和孩子共同生存下去？作家和他的小说人物一样跨越了现实生活的危机，同时也在文学写作道路上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对大江而言，《个人的体验》无疑是具有多重意义的青春纪念碑，而他和儿子大江光的后续故事现在也广为人知。大江陪伴身有障碍的孩子成长，每个阶段都遭遇困难，那过程，确实如他当年所说，完全不是什么幸福的大团圆，但大江同时也在孩子身上看到美好的品性和特殊的天分。大江光在父母的关爱下，克服身体上的困难成长为作曲家，而光的成长故事也为大江健三郎的系列短篇小说《新人啊，醒来吧》提供了素材。塑造“新人”本是现代世界文学的主题，大江这组短篇不仅艺术精致，其特殊之处还在于没有仅仅把成长的孩子视为新人，也同样描写了父亲的成长，父子都是成长中的“新人”。

三

大江健三郎先生与中国渊源深远，曾明言“我对中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尊敬”。在他早期的随笔和评论里，曾多次引用鲁迅，而在他的小说里，鲁迅更是一个深潜的存在。1994年，大江健三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发表题为《我在暧昧的日本》的演讲，特别提到韩国作家金芝河和中国作家莫言等人的名字，认为自己和这些同处于“蕴含着持久贫困和混沌的富庶的亚洲”土地上的作家心心相连。



《大江健三郎作品集》，光明日报出版社

而在中国，也有众多深爱大江健三郎的读者。自1995年叶渭渠先生主持翻译出版《大江健三郎作品集》（光明日报出版社）以来，大江的主要小说作品都有中文译本出版。2000年以来，大江多次访问中国，与中国作家交流，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发表演讲，也到书店签名售书，和读者亲切交谈。在同时代的世界文学中，大江的作品在中国肯定不是销量最好的，但就和读者的亲近程度而言，大概很少有哪位外国作家能够和他相比。

大江在中国的讲演，每次都盛况空前，可惜还没有结集出版。如果出版《大江健三郎中国讲演集》，让我们重温他的言谈，肯定是很多读者期盼的。而作为中国读者，我们在感知大江先生对中国的敬意和热爱同时，也应该认真体味这位挚友的诤言。

大江健三郎小传

大江健三郎1935年出生于日本四国岛，1954年考入东京大学文科二类，1956年转入文学部法国文学专业，师从日本著名法国文学研究者渡边一夫。1957年，短篇小说《奇妙的工作》获《东京大学新闻刊》五月祭奖。1958年，短篇小说《饲育》获第39届芥川文学奖，以职业作家身份正式进入日本文坛。1965年，《个人的体验》获第11届新潮文学奖。1967年发表《万延元年的足球》获第三届谷崎润一郎文学奖。1989年获欧洲共同体设立的犹罗帕利文学奖，1992年获意大利蒙特罗文学奖。1994年，大江健三郎获诺贝尔文学奖，是继川端康成后第二位获得该奖项的日本作家。2023年3月3日，大江健三郎去世，享年88岁。

版面编辑：吴秋晗

艺术丨第95届奥斯卡颁奖礼当代宇宙启示录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3月20日第11期

霸主倾塌，新秀升起，真正改变的是整个社会的精神：主流观众由婴儿潮世代变为千禧一代，甚至与互联网共同成长起来的Z世代



本届奥斯卡最大赢家《瞬息全宇宙》主创团队在拿下7项大奖后捧杯合影。图：John Angelillo/视觉中国

文丨朱珏瑾
影评人

最佳影片：失落者之歌

在刚结束的第95届奥斯卡电影颁奖礼上，《瞬息全宇宙》包揽了绝大部分最重要的奖项，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原创剧本，最佳剪辑和三个演员奖项，创造了奥斯卡95年之最。

成为首位夺得最佳女演员奖的亚洲女性后，杨紫琼和她的搭档——获得最佳男配角奖的关继威，在获奖致辞中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梦想”这个词。

从21岁被选为“马来西亚小姐”，杨紫琼前20年的星路很难不让人赞叹：22岁即在香港拍摄洪金宝的电影《猫头鹰与小飞象》；29岁离婚后，与成龙合作《警察故事3：超级警察》顺利复出；35岁一跃成为“邦女郎”；40岁时，参演的《卧虎藏龙》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与这份履历相比，关继威的从影之路显然坎坷了许多。从难民营走出来的他，虽然1984年就出演过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夺宝奇兵2》，但过早接触到好莱坞，于他更像是被开了个沉重的玩笑。成年后，他并没有得到多少演艺机会，逐渐把时间更多投入到了幕后工作中。

从40岁到60岁，尽管期望拿掉“武侠打女”这一身份标签，但除了一部2005年的《艺伎回忆录》，杨紫琼在好莱坞能接到的角色，仍多为动作片配角。即便是像她这样的知名女星，同为少数族裔，也一定有过和关继威一样不被重视的失落感。而关继威作为一个连只有两句台词的小角色都拿不到的演员，更是代表了绝大多数亚裔从业者无法接近梦想的真实处境。

《瞬息全宇宙》就是一首符合亚裔自我定位的“失落者之歌”。最近几届奥斯卡最佳影片，都在关注这种“不具备威胁性的边缘人”。你无法在杨紫琼饰演的王秀莲与关继威饰演的威门身上看见所谓伟大的梦想。他们最渴望的，只不过是洗衣店内相亲相爱的家庭生活，以及税务审计能顺利通过。这诉求十分朴实、贴地，有着无意参与社会主流竞争的谦卑感。换言之，这部电影看似奇异诡谲，载满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本质上却并不真的具备“攻击性”。整个舞台囿于这个平凡家庭内部，人物将母女的和解视为成功，情感上以回归亲密为安慰。秀莲有一句台词：“我们都是没用的人。幸好你不是一个人。”是的，它安慰失败者，安慰那些在家庭关系中受挫的人，尤其是个三代之间充斥着高压关系和身份焦虑的东亚移民家庭。但也仅限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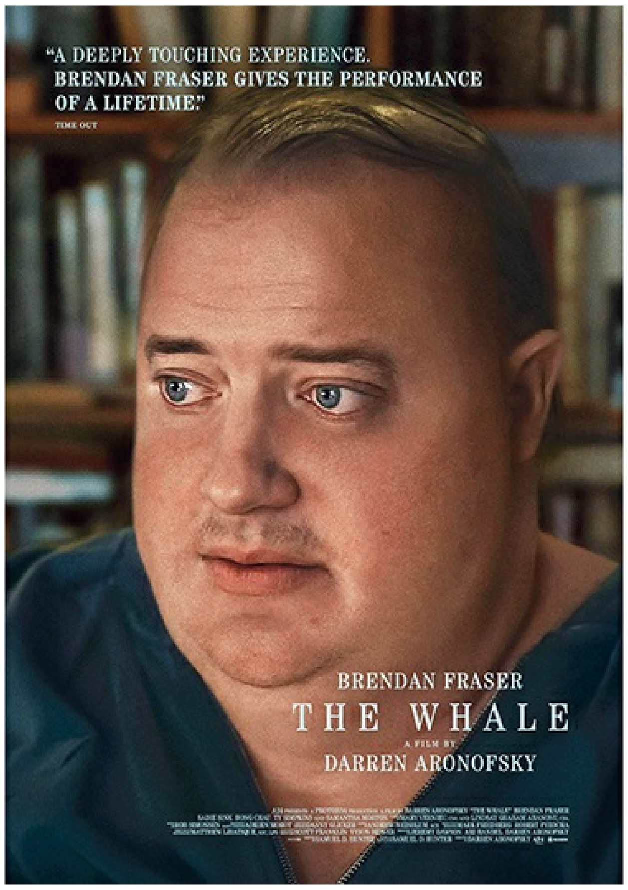
当杨紫琼和关继威光彩照人地站上奥斯卡领奖台，此场景比电影中任何一重宇宙都更为梦幻。关继威说：“人们说这样的故事只会发生在电影里，我不敢相信它真的发生在我身上。”电影中未能实现、甚至电影中都不敢想的梦，竟在现实中得到满足。奥斯卡用“圆梦”之举，完成了一次比主流电影更主流的正面叙事。

A24：纽约曼哈顿的年轻公司

《瞬息全宇宙》与2017年获得最佳影片的《月光男孩》来自同一家电影公司——A24。不同于后者当时叫好不叫座的情形，《瞬息全宇宙》的全球票房现已超过1亿美元，更是A24自成立以来成绩最好的一部电影。

本届获奖名单中，得到最佳男主角奖的《鲸》也由A24参与制作和发行；另一部口碑不俗、提名了最佳影片的《晒后假日》，同样由A24负责北美地区的发行。“亚裔胜利”的幻象背后，是这家位于纽约曼哈顿的年轻公司，获得了绝对胜利。

过去11年，A24在好莱坞异军突起，其参与制作和发行的影片至今已拿到超过30项奥斯卡提名，包括2013年的《皮囊之下》、2015年的《房间》、2017年打败大热门《爱乐之城》夺得最佳影片的《月光男孩》，以及口碑票房双赢的《伯德小姐》。前两年，电影市场因新冠疫情而萧条，对于如何将《瞬息全宇宙》这部怪诞又好玩的影片顺利推向复常后的市场，A24显然做了充分考量。







A24参与制作发行的影片至今已拿到超过30项奥斯卡提名，包括（从上至下）《鲸》《晒后假日》《月光男孩》等。

与《晒后假日》选择在戛纳电影节首映，而《鲸》先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亮相，再转战多伦多电影节的传统路数不同，《瞬息全宇宙》被送到美国本土的西南偏南电影节（SXSW Film）首映。这个包含了电影、音乐和交互媒体等多个板块的艺术节创办于上世纪80年代末，比“三大电影节”年轻得多。它尤其欢迎新锐导演和各类“具有挑衅性”的另类影片，还为各种VR互动实验影片设置了“虚拟影片计划”。

“西南偏南”2020年因新冠而取消，2021年改为线上，2022年终于迎来了重聚于大银幕前心情激动的观众。此时，一部天马行空的《瞬息全宇宙》出现了。这个尖叫时刻，很容易让人回忆起1989年的米拉麦克斯影业公司，当时他们凭着一部《性，谎言与录像带》引爆了圣丹斯电影节。没有哪部电影比《瞬息全宇宙》更契合2022年需要“回归”的热闹气氛了，它混合了因隔离、社交距离产生的多重复杂情绪——自我压抑、渴望释放的欲望和期待狂欢的高涨心情。氛围、情绪与感觉——正是社交媒体时代，我们在一张张精心修饰过的照片中努力寻找的、有时足够代替语言的东西，也是A24在选择影片时很看重的特质。

现如今，米拉麦克斯几经易手，昔日风光早已不再。霸主倾塌，新秀升起，真正改变的是整个社会的精神：主流观众由“二战”后婴儿潮世代，变为他们的孩子千禧一代，甚至更年轻的同互联网共同成长起来的Z世代。A24从未试图复制前辈米拉麦克斯的成功之路——以大量血腥、裸露镜头吸引眼球，制造新闻。这条路在上世纪80年代成功过，但在呼吁平权、任何“政治正确”的议题都能随时在互联网上掀起风波的今日，不可能再获得正面评价。

A24显然是懂得当下年轻人“宇宙”的。从一开始，他们便拥抱来势汹汹的流媒体：与Amazon Prime签订独家流媒体版权协议；和Apple TV+合作发行电影；牵手Netflix与HBO，进军小荧幕剧集行业。他们几乎将所有营销成本都用到了社交媒体上，同时线下与线上配合，包括发售印制精良的已上映电影的剧本、定期做杂志、举办放映会等。此时此刻，A24官方网站上，《瞬息全宇宙》里出现过的热狗手套、悬崖边的石头和杨紫琼眉心上贴的“第三只眼”等周边正在热卖。还有一本由两位丹尼尔导演主编，名为《税收季》（Tax Season）的杂志，被宣传为“对美国税收制度一次非科学探索”，“一本避税指南”。电影中使用过的道具，也在另一个“A24拍卖”板块等待在线出价；主配角穿过的服装，甚至王秀莲的报税单据均为拍卖物。电影海报上，杨紫琼那套花衬衣与红色格子背心的造型组合，最终竞价达到了1.4万美元。

A24用行动印证了如今这个时代的精神——万物皆可以玩味，万物皆是商品。

奥斯卡老去：左右为难的困境

热门提名的最佳影片中，英国导演马丁·麦克唐纳的《伊尼舍林的报丧女妖》，是两个男人在爱尔兰小岛决裂的故事，好似在原始、蛮荒的土地上有一部人类斗争的寓言。瑞典导演鲁本·奥斯特伦德的《悲情三角》，此前已获得过戛纳金棕榈奖。它对准时尚圈和顶级邮轮上的富豪，一场海上事故导致身份改变，暴露出权力关系的真相。

加拿大导演萨拉·波莉的《女人们的谈话》，是一个女性被伤害的故事。而由凯特·布兰切特主演、此前被视为最佳女主角有力竞争者的《塔尔》，无论是其混合了灰度的视觉风格，还是涉及的包括互联网“取消文化”，抑或“后真相”时代如何消解权威等议题，都十分契合当下社交媒体的属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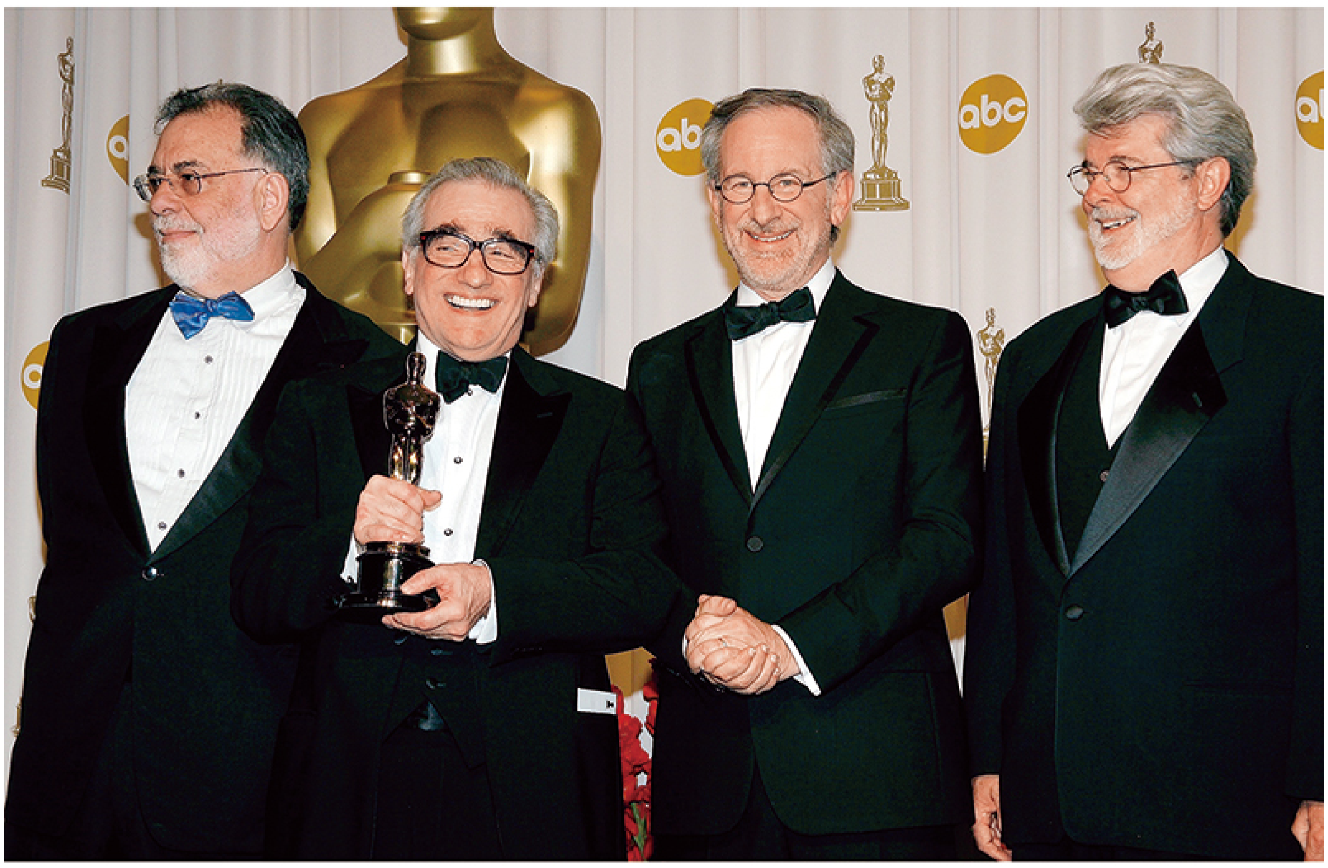
很难想象以上几部票房均未超过5000万美元的小众电影，会和票房超10亿美元的超级大片《壮志凌云：特立独行》《阿凡达：水之道》出现在同一张名单上。除此之外，斯皮尔伯格的《造梦之家》与巴兹·鲁赫曼的音乐传记片《猫王》，以及来自流媒体Netflix的新版《西线无战事》，堪称“情怀”制作。

一方面是提名看似“多元化”，另一方面是《瞬息全宇宙》独揽大奖。就像流媒体影片去年才在奥斯卡上大放异彩，今年的剧情片就只有一部《西线无战事》被选出，似乎表明学院想要“回归传统”的态度。种种前后矛盾的举动，显示出学院内部左右为难的困境。奥斯卡已有近百年历史，虽然至今仍是最受世界瞩目的电影奖项，但从2015年#OscarsSoWhite的抵制运动开始，其收视率就呈直线下降趋势。今年1870万的收视人数比去年略有回升，仍处于历年收视低位。

若我们把时间调回到1998年3月23日，第70届奥斯卡颁奖典礼，那一晚，超过5700万观众见证了导演詹姆斯·卡梅隆的辉煌战绩：《泰坦尼克号》以14项提名和11个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在内的奖项，成为绝对赢家。当晚35%的收视率，也创造了奥斯卡史上最高纪录。对1998年仍有记忆的中国观众，应该不会忘记这部电影当年引进中国上映时的盛况。《泰坦尼克号》也一举打破了另一部由卡梅隆执导、阿诺·施瓦辛格主演的《真实的谎言》在中国的票房纪录。25年后，同样出自卡梅隆之手的《阿凡达·水之道》提名了最佳影片，但在各大媒体前期预测中均榜上无名，最后也的确只拿到一个最佳视觉效果奖。

遭遇同样尴尬的还有斯皮尔伯格。他的自传性电影《造梦之家》获7项提名，最终颗粒无收。回想3年前的颁奖礼，马丁·斯科塞斯的《爱尔兰人》10项提名无一获奖。且就在《爱尔兰人》于上一个10月首映前，斯科塞斯还因为一句“漫威不能称为电影，更像是主题公园产物”的强硬评论惹来争议。提名奥斯卡，无论对76岁的斯皮尔伯格，还是已经80岁的斯科塞斯，都更像一次脱帽致敬，而非真的再把他们看作拿奖的有力竞争者。

奥斯卡在老去，功成名就的大导演也在老去。回望历史，20世纪60年代末期，面对电视机对大银幕的威胁以及受到法国新浪潮影响，斯皮尔伯格、斯科塞斯在后来被称作“好莱坞新浪潮”的电影运动中，还是两位充满了想象力的创新者，也是年轻的领军人物。



2007年第79届奥斯卡颁奖礼，已年过60的四位“新浪潮电影小子”：（从左至右）科波拉、斯科塞斯、斯皮尔伯格和卢卡斯。图：Vince Bucci/视觉中国

那的确是一个激情澎湃的年代。1967年上映的《雌雄大盗》获得了9项奥斯卡提名；同年，另一部电影《毕业生》也得到9项提名。此后，约翰·施莱辛格的《午夜牛仔》摘得第42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奖，彼得·博格丹诺维奇的《最后一场电影》拿到第44届奥斯卡8项提名。1973年，《美国风情画》的成功让导演乔治·卢卡斯开启了最早的“星球大战”系列。另一位“新浪潮”灵魂人物，科波拉的《教父》，令黑帮电影重新流行。1975年，斯皮尔伯格拍出了真正的“好莱坞大片”《大白鲨》。如今，已过将近半个世纪。

今年奥斯卡颁奖礼前一天，美国作家迈克尔·舒尔曼在媒体上写下——“于另一个宇宙中，《造梦之家》正向着第95届奥斯卡金像奖的胜利迈进。这是对史蒂文·斯皮尔伯格职业生涯后期的一次喝彩。继《辛德勒的名单》之后，他将再次获得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的双桂冠。”

版面编辑：吴秋晗

专栏｜划时代的毕业论文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3年03月20日第11期

如此"柳暗花明又一村"或"上帝关了一扇门就会打开另一扇窗"的转折，在默里一生重复上演，其真正原因是她过人的勇气和不屈的精神



保利·默里（Pauli Murray）

文丨蒋金晗
律师

大多数人会纠结于被社会歧视的出身，有些人却因此活成了传奇。保利·默里（Pauli Murray，1910—1985）生为黑人、女性、同性恋，除了诗人、律师、教授、人权活动家这几个身份，更有很多"第一"或"惟一"的殊荣：她是霍华德大学法学院当年惟一的女学生、美国国家律师协会首位女性领导人、美国全国妇女组织创始人、战后第一批黑人女性律师、第一位圣公会黑人女性牧师，耶鲁大学保利·默里学院，则是第一个为纪念她以有色人种名字命名的学院。

默里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每次"失败"的尝试后，常常开启辉煌灿烂的人生。她在弗吉尼亚彼得斯堡巴士事件中，因为反对种族隔离入狱，就此结识了包括瑟古德·马歇尔（Thurgood Marshall，著名人权律师，第一位非裔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在内的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的律师们，从而开启了她的法律生涯；她申请北卡罗来纳大学，因黑人身份被拒绝，不满罗斯福总统在北卡大学的虚伪演讲，直接给总统写抗议信，因而结识了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并且保持持久的通信和友谊；她在霍华德大学法学院成绩优秀，足以攻读哈佛法学院研究生，却因女性身份被拒，便远赴更加自由宽容的伯克利法学院；毕业后回纽约，因为肤色和性别的双重歧视找不到工作，只好自己开律所，却偶然得到机会被大律所青睐，并由此又找到了终身伴侣??如此"柳暗花明又一村"或"上帝关了一扇门就会打开另一扇窗"的转折，在默里一生重复上演，其真正原因是她过人的勇气和不屈的精神。

默里是个天生的律师、战略家和先行者。作为霍华德大学惟一的法学院女生，老师和同学在第一年根本没把她放在眼里，甚至她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但她考试名列第一，到第二年，大家就不得不认真看待这位瘦小的女生了。她的法学院毕业论文——《是否应该推翻普莱西诉弗格森案？》被同学和老师嘲笑。此案是1896年最高法院的判例，承认种族"隔离但平等"。当时，包括马歇尔在内的主流意见都觉得，不大可能推翻隔离制度，退而求其次，要求平等是为黑人争取权利的最佳策略。而默里在她的论文中提出了更加大胆的战略——推翻普莱西案，通过最高法院司法立法来全面结束种族隔离。当她的想法被老师斯波特伍德·罗宾逊（Spottswood Robinson）否定时，默里甚至下注10美元，赌25年内普莱西案将被推翻。事实上，也就10年后，1954年的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马歇尔、罗宾逊和律师团队在最高法院的辩护中完全采纳了默里的战略，真的全面结束了种族隔离。案后多年，老师罗宾逊再次遇到默里："你还记得你的毕业论文么？1953年，我找出了这篇论文，对我们准备布朗案很有帮助。"是的，这个全面结束种族隔离的划时代判决源于默里的毕业论文。

默里的成就在她所处的年代是前所未有的。她创立了美国全国妇女组织（NOW），并且大胆提出使用宪法第14修正案来捍卫女性的权利。作为美国公民自由协会（ACLU）的董事会成员，默里力主年轻的金斯伯格加入ACLU董事会，并成为ACLU女权计划（Women's Rights Project）的第一任理事长。依照默里的战略，金斯伯格在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里德诉里德案（Reed v. Reed，1971）中成功说服最高法院，第一次将宪法第14修正案平等保护条款推及到妇女权益保障。

除了在法律领域的成功，默里的诗歌风采也备受瞩目。面对媒体的采访，她认为自己首先是诗人，其次才是律师。她的《致压迫者》，体现的是被压迫者的高贵和勇气——

现在你们很强大/而我们，像葡萄一样/渴望成熟/碾压我们/从我们完美的外表下/碾压出勇敢的生命/我们的力量很薄弱/蕴含着几个世纪以来的渴望/在冬日忧伤的暮色中/我们将含垢忍辱，让你们万念俱灰

默里一直通过法律捍卫黑人和女性的平等权利，但毕生困扰于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只能求助于心理医生和宗教信仰。默里死于1985年，次年的鲍威尔斯诉哈德威克案（Bowers v. Hardwick）意味着同性恋权益的巨大倒退，直到2003年劳伦斯诉得克萨斯州案（Lawrence v. Texas），最高法院才推翻鲍威尔斯案，第一次将宪法第14修正案平等保护条款推及到同性恋权益保障。再过10年，最高法院在美利坚合众国诉温莎案（United States v. Windsor）宣布，《婚姻保护法》的最重要部分——只有一男一女才可以结婚——违宪，而金斯伯格成为第一位主持同性恋婚礼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到了2015年奥贝格费尔诉霍奇思案（Obergefell v. Hodges），最高法院再次将宪法第14修正案推及到同性恋权益保障，并且宣布同性恋婚姻合法化。默里若地下有知，可以瞑目。是她永远改变了美国和全球的社会和司法制度，引领人们走向更加宽容、平等和公正的未来。□

版面编辑：吴秋晗